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夺权与失权—二十世纪世界政变内幕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20 世纪世界政变大事记

1903 年 6 月 11 日，塞尔维亚发生政变。马斯沁上校等人率兵冲进皇宫，枪杀国王、王后，拥立彼得·卡拉乔尔杰维奇王子为国王。

1903 年 11 月，巴拿马发生政变，成立巴拿马共和国，脱离哥伦比亚。

1909 年 4 月，土耳其发生宫廷政变。苏丹哈米德被废黜，其弟理查德继承王位。

1911 年 12 月，伊朗发生政变，封建专制统治复辟。1913 年 12 月 23 日，土耳其发生政变。青年土耳其党人推翻科·帕夏政府。

1913 年 2 月 9 日，墨西哥发生政变。总统弗朗西斯科·马德罗被费·迪亚斯推翻，不久被谋杀。总司令韦尔塔自任临时总统。

1915 年 1 月 28 日，葡萄牙发生政变。皮·德卡斯特罗将军发动政变，建立独裁政权。5 月 14 日又被民主派领导的起义推翻。1917 年 12 月 5 日，葡萄牙发生政变。亲德的西多尼奥·庞埃斯将军发动政变，逮捕伯·马查多总统，自任独裁总统，次年 12 月 14 日庞埃斯被暗杀。

1918 年 11 月 9 日，德国水兵哗变，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共和国宣告成立。11 日，一战结束。

1920 年 3 月 13 日，德国军官冯·卡普在柏林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恢复帝制，因未得到全军的支持，加上工人的反对，政变失败。

1920 年 7 月 11 日，玻利维亚发生政变，格拉政府被推翻。

1921 年 1 月 21 日，波斯将军礼萨·汗发动军事政变，占领德黑兰，建立新政府。吉雅丁任首相，礼萨·汗自任陆军大臣兼总司令。

1921 年 10 月 20 日，葡萄牙发生一起未遂军事政变，首相格兰卓被暗杀。

1921 年 10 月 21 日，匈牙利前国王及王后发动政变，企图重新获得王权，后被挫败。

1922 年 3 月 3 日，意大利法西斯党人发动政变推翻阜姆政府。

1922 年 10 月 26 日。墨索里尼指挥法西斯党徒向罗马进军，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政权。

1923 年 6 月 9 日，保加利亚发生军事政变，斯塔姆斯基政府被推翻。

1923 年 9 月 13 日，西班牙米·莫·德里维拉将军在国王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除议会，废止宪法。军队控制了西班牙，建立了新政府。

1923 年 11 月 8 日，希特勒率纳粹党徒袭击慕尼黑一家啤酒馆，扣留巴伐利亚州军政首脑，后被政府军镇压。

1924 年 10 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发动政变，迫使北京政府总统曹锟辞职。

1925 年 4 月 18 日，葡萄牙发生一起反对民主政权的未遂军事政变。

1926 年 5 月 12 日，波兰元帅约瑟夫·华苏斯基发动军事政变，进逼华沙，总统维托斯被迫辞职，毕斯基大权独揽。

1926 年 5 月 28 日，戈·达科斯塔将军在葡萄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现政权。42 天后达科斯塔被迫下台，流放至亚速尔群岛。

1926 年 8 月 22 日，希腊乔治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潘加洛斯政权。

1926 年 12 月 17 日，立陶宛发生政变，安·斯梅托纳发动政变，逮捕总统和内阁成员，自任总统。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开

始建立独裁统治。

1930年5月28日，玻利维亚发生政变。西莱斯总统被推翻，以卡·布·加林达将军暂时掌握政权。

1930年8月25日，秘鲁发生政变。路易斯·桑切斯·塞罗上校发动政变，莱吉亚被迫辞职潜逃。塞罗任临时总统。1930年9月6日，阿根廷发生政变。乌里武鲁将军逼迫总统下台。

1930年10月26日，巴西自由党发动政变，普列斯特斯被迫隐退，瓦加斯任临时总统。

1930年12月12日，西班牙哈卡的驻军叛乱，要求成立共和国，后被平息。

1931年1月2日，巴拿马发生政变，阿罗塞门总统被迫辞职，军事政府建立。

1931年2月，秘鲁发生政变，桑切斯被迫让位给戴维·萨·奥坎波。

1931年10月，厄瓜多尔发生政变，临时总统阿尔瓦被迫逃亡。

1932年6月24日，泰国发生政变，军方控制了政权，结束了694年的绝对君主制。

1932年7月20日，普鲁士发生政变，柏林和勃兰登堡实行戒严。1932年8月10日，西班牙何塞·桑胡尔霍将军发动叛乱，占领塞维利亚，后被平息。

1932年9月13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达维拉政府被推翻。

1933年6月20日，泰国披耶拍风上校发动政变，强迫国务委员会辞职，自任总理。

1933年8月12日，古巴发生军事政变，马查多被迫下台，德塞斯佩德斯出任总统。

1933年9月5日，古巴发生军事政变，推翻德塞斯佩德斯，政变领导人巴蒂斯塔成为实际的独裁者。

1933年10月11日，泰国发生以波翁德亲王为首的若干王公贵族的政变流产。

1934年5月15日，拉脱维亚总理乌尔曼尼斯在巴洛蒂斯将军支持下发动政变。

1934年5月19日，保加利亚基蒙·格奥尔吉耶夫将军率陆军军官发动政变，建立独裁政权。

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镇压冲锋队企图发动的政变，罗姆被处死。法西斯独裁进一步巩固。

1934年7月25日，奥地利发生政变。纳粹分子占领电台，枪杀陶尔弗斯总理，后被平息。

1934年12月，玻利维亚发生军事政变，推翻萨拉曼卡总统。

1935年1月22日，保加利亚发生政变，格奥尔吉耶夫被撵下台，兹拉特夫将军继任首相。

1935年10月10日，希腊发生政变。查尔达里斯政府被推翻。

1936年2月17日，巴拉圭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阿亚拉总统的政府。拉斐尔·佛朗哥出任临时总统，实行军事独裁。1936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军官发动政变，袭击首相官邸，枪杀几位政府要员，后被镇压。

1936年5月17日，玻利维亚发生政变，索尔萨诺政府被推翻，代之以

戴维·托罗领导下的军人文官联合统治。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发生政变，佛朗哥在西属摩洛哥的梅利利亚发动叛乱，从此西班牙内战爆发。

1936年8月4日，希腊发生政变。米塔克萨斯发动政变，自任独裁者，实行戒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变，在西安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1937年8月5日，巴拉圭发生不流血政变，佛朗哥被迫辞职，帕维亚任临时总统。

1938年1月29日，泰国披耶颂苏拉发动政变失败。1943年7月25日，意大利法西斯头子、首相墨索里尼被软禁，国王命令组织新政府，主张与盟军和谈。

1944年7月20日，德国发生一起企图刺杀希特勒、另组政府的未遂军事政变。

1946年1月11日，海地发生军事政变。以马格卢瓦尔上校为首的军人集团推翻莱斯科总统，把埃斯蒂梅扶立为总统。1947年5月26日，尼加拉瓜发生政变，阿·索摩查将军发动政变，推翻阿圭略总统。

1948年2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组成新政府。1949年3月30日，叙利亚发生不流血政变，军队参谋长胡·扎伊姆推翻政府，并于6月23日当选总统。

1949年8月14日，胡·扎伊姆总统被推翻。

1951年11月29日，波·奎披汶在曼谷发动政变，推翻原政府。

1952年3月10日，古巴发生军事政变。巴蒂斯塔将军发动闪电般政变，推翻卡·普·苏卡罗斯总统政权。

1952年7月23日，埃及军队纳赛尔将军领导下，发动政变，废黜国王法鲁克二世。

1953年6月13日，哥伦比亚发生不流血政变，罗·波尼利亚将军就任总统。

1953年8月20日，伊朗发生政变，摩萨台首相被赶下台，外逃的国王巴列维回国。

1954年5月，巴拉圭发生军事政变，推翻查维斯政府，斯特罗斯纳任总统。

1954年6月28日，危地马拉发生军事政变，以卡·阿里斯上校为首的军人推翻阿文斯政府，将政权移交给埃·蒙松上校。1954年8月24日，巴西总统瓦加斯被军队逼迫辞职，让位给副总统卡费，后自杀。

1955年6月18日，阿根廷总统庇隆挫败一起由海军军官发动的军事政变，350多人在政变中丧生。

1955年9月24日，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庇隆总统流亡海外，政变首领洛纳迪将军任临时总统。

1955年11月13日，阿根廷再次发生军事政变，推翻洛纳迪政府，佩·阿兰布鲁将军被任命为总统。

1956年11月4日，苏联红军进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囚禁政府总理纳吉，后被处死。匈牙利宣布组成新政府。1957年3月2日，印度尼西亚东部四省发生军事政变，叛乱者要求该地区完全自治。

1957年3月9日，印度尼西亚发生军事政变，巴里安中将夺取南苏门答腊的控制权。

1957年6月29日，苏联发生一起宫廷政变，企图罢免赫鲁晓夫，后被挫败。

1957年9月17日，泰国发生一起不流血政变，沙立·他纳叻总司令夺取国家权力。

1958年1月23日，委内瑞拉发生政变，希门尼斯将军的独裁统治被推翻。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发生政变。以阿·卡·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费萨尔王朝，处死国王、太子和政府总理，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1958年11月17日，苏丹发生政变，阿布德军人集团夺取国家最高权力。

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发生一起不流血的军事政变，逮捕总理阿·曼德列斯，解散议会，成立“全国团结委员会”接管政权。

1960年8月9日，老挝发生政变。贡勒上尉率政变部队推翻昭·松萨尼特政府。

1961年1月26日，萨尔瓦多发生政变，执政3个月的洪达军人政权被推翻。

1961年5月16日，韩国陆军参谋长张都瑛发动军事政变，宣布解散国会，成立军人内阁和“军事革命委员会”。

1961年7月3日，韩国再次发生政变，朴正熙夺取政权。

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发生兵变，宣布叙利亚脱离阿联而独立。

1962年1月18日，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军事政变，存在两天的军人政权被推翻，拉斐尔·邦内利当选总统。

1962年3月2日，缅甸奈温将军发动政变，推翻吴努文官政府，奈温出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1962年3月28日，阿根廷发生政变，弗朗迪西总统被废黜，上院议长何塞·玛丽亚·吉多获得军队的支持出任总统。

1962年9月18日，阿根廷发生兵变，政变军人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1962年12月，塞内加尔总理迪亚发动一次政变未遂，桑戈尔总统攫取了国家全权。

1963年2月8日，伊拉克空军发动政变，推翻卡塞姆总理的政府。阿·萨·阿里夫上校出任临时总统。

1963年9月25日，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一起不流血的政变，推翻博什总统的政府。

1963年11月1日，南越总统吴庭艳在政变中丧生。政变者成立以扬文明少将为首的临时军政府。

1964年1月30日，南越陆军第一军司令阮庆少将发动军事政变，取代扬文明，自任国家领袖，兼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64年4月19日，老挝发生政变，左派力量遭到打击。1964年9月13日，南越发生一起反阮庆的未遂军事政变。1964年10月14日，苏联发生宫廷政变，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任苏共第一书记。

1965年2月25日，南越发生军事政变，青年军官推翻了军事独裁者的阮庆的统治。

1965年4月25日，以卡马诺为首的一批陆军军官发动政变，推翻唐·里·卡布拉尔政府。

1965年5月25日，苏丹尼迈里发动军事政变，改国名为苏丹民主共和国。

1965年6月19日，阿尔及利亚前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布迈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本·贝拉政权，成立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布迈丁任主席。

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纳苏蒂安军人集团发动军事政变，夺取国家权力，苏加诺总统被软禁。1965年10月18日，布隆迪一群军官在胡图族部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袭击王宫，政变失败，领导人被处死。1965年11月24日，扎伊尔陆军参谋长蒙博托发动军事政变，废除总统约瑟夫·卡萨武布，自任总统。

1966年1月1日，中非共和国陆军参谋长让—贝德尔·博卡萨上校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达科政权，解散议会，废除宪法，自任总统兼武装部队司令。

1966年1月15日，尼日利亚伊博族青年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联邦总理巴勒瓦，政权落入陆军总司令伊龙西（伊博族）手里。

1966年2月24日，加纳军警趁恩克鲁玛出国访问，发动政变，拥立约瑟夫·安克拉将军为国家元首。

1966年6月28日，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伊利亚政府被推翻，前陆军司令翁加尼亚出任总统。

1966年7月28日，尼日利亚北区豪族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杀死伊龙西和大批伊博族官兵，推选陆军参谋长戈翁掌权。

1966年11月28日，布隆迪总理米孔贝罗发动一次不流血政变，废黜国王，建立共和国，自任总统。

1967年1月13日，多哥陆军参谋长艾蒂安·埃亚德马中校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格鲁尼茨基总统，废止宪法，建立军事独裁。

1967年3月23日，塞拉利昂青年军人发动政变，推翻史蒂文斯政府。

1967年11月5日，也门发生政变，总统萨拉勒被推翻，政变者成立了以阿·拉·埃里亚尼为主席的共和国委员会。

1967年12月17日，达荷美（贝宁）发生军事政变，索格洛总统被推翻，建立以库昂德特少校为首的临时政府，阿莱中校任总统。

1968年4月18日，塞拉利昂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恢复文官统治，史蒂文斯复任总理。

1968年8月3日，刚果伞兵营营长恩古瓦比为首的一部分军官联合以努马扎莱为首的民族主义左派发动政变，推翻马桑巴一代巴政权，恩古瓦比任国家元首，拉乌尔任总理。1968年11月19日，马里卡蒂军官学校副校长特拉奥雷中尉为首的一批青年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凯塔政权，建立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特拉奥雷任该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

1968年10月3日，秘鲁军人发动政变推翻贝朗德政权，成立军政府，阿尔瓦拉多任总统。

1969年5月25日，苏丹军官尼迈里上校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建立革命委员会，解散议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1969年9月1日，以卡扎菲为首的一批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建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1969年9月26日，玻利维亚发生军事政变，西莱斯总统被推翻，武装部队司令坎迪亚任总统，实行较开明的政策。1969年12月10日，达荷美发生军事政变，津苏政权被推翻，保罗·德苏泽任军人政府首脑。

1969年12月15日，巴拿马发生一起未遂政变。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军人朗诺、施里玛达在西哈努克亲王出访期间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国家元首之职。1970年6月8日，阿根廷发生政变，军方首脑废黜翁加尼亚总统，任命莱文斯顿准将为总统。

1970年7月23日，阿曼的泰穆尔素丹被其子卡·本·赛义德发动的宫廷政变推翻。卡·本·赛义德曾在牛津留学，主张进行现代化改革。

1970年10月4日，玻利维亚发生政变，奥万多总统被迫下台。

1970年11月13日，叙利亚国防部长兼空军司令哈·阿萨德发动政变，取得政权。哈提卜任国家元首，阿萨德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1971年1月25日，乌干达军队总司令阿明趁总统奥博特出访时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进行血腥大屠杀。

1971年3月，塞拉利昂军队总司令邦古拉发动反对总统史蒂文斯的军事政变。次日，陆军中校萨姆·金发动反政变，逮捕邦古拉，控制了局势，宣布军队效忠史蒂文斯合法政府。

1971年7月10日，摩洛哥发生一起未遂军事政变。政变领导人是王宫军事办公室主任马德布赫将军和阿赫穆士官学校校长阿巴布上校，政变军人在进攻王宫时，遭到王宫卫队的顽强抵抗而失败。

1971年9月13日，中国前国防部长林彪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后，乘飞机出逃，在蒙古温都尔罕机毁人灭。

1971年11月17日，泰国他依·吉滴卡宗陆军元帅发动军事政变，夺取国家权力。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政变，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

1973年11月25日，希腊陆军中校吉齐基斯发动军事政变，总统乔治·帕帕多普洛斯被迫下台。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推翻卡埃塔诺政府，40年之久的独裁统治结束。

1974年9月12日，埃塞俄比亚发生一场不流血政变，统治该国58年之久的海尔·塞拉西皇帝被推翻。

1975年8月15日，孟加拉国发生政变，总统拉赫曼被杀，其好友艾哈迈德就任总统。

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发生不流血政变，推翻总统庇隆政权，威德拉陆军少将当选为军政府总统。

1976年10月6日，泰国海军上将差罗如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吉滴卡宗政府，自任总统。

1977年7月5日，巴基斯坦总参谋长齐亚·哈克发动一次不流血军事政变，逮捕总理布托（后被绞死），齐亚·哈克组成军政府。

1978年4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发动政变，枪杀达乌德总统，阮国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1978年7月10日，西非国家毛里塔尼亚发生军事政变，达达赫政权被推翻。

1979年1月15日，伊朗发生政变，国王巴列维被推翻，结束了他37年的统治。

1979年3月19日，乌干达反政府力量和坦桑尼亚军队围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3天后，乌干达总统阿明逃出首都，卢莱就任政府首脑。

1979年6月4日，加纳空军部队发动政变。

1979年8月3日，赤道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马西埃政权被推翻。

1979年9月20日，中非帝国发生政变，博卡萨皇帝被废黜，前总统戴维·达科宣布恢复共和制，出任总统。

1979年10月12日，玻利维亚发生军事政变，要求解散议会，恢复军人执政。

1979年10月15日，萨尔瓦多军事领导人发动政变，废黜卡洛斯·罗梅罗总统，并建立有文官参与的国家军事执政团。1979年10月26日，韩国总统朴正熙遇刺，政变未遂。1979年11月7日，玻利维亚发生政变，推翻阿泽政府。1979年12月，韩国发生政变，崔圭夏政权被推翻，金斗焕自任总统。

1980年4月12日，28岁的军士长多伊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利比里亚托尔伯特政府，总统被杀。多伊变成五星将军自任总统。

1980年5月2日，萨尔瓦多挫败一起军事政变。1980年9月11日，土耳其发生一起不流血政变，罢黜德米雷尔总理，解散议会。萨尔特克将军组成新政府。

1980年11月15日，几内亚比绍部长会议主席若·贝·维埃拉发动军事政变，成立新政府。

1980年11月20日，尼加拉瓜挫败一起政变阴谋。

1981年2月23日，西班牙发生一起未遂政变。政变领导人是莫利诺中校，政变部队冲击议院，扣押议员，后被击败。1981年5月8日，孟加拉发生政变，总统拉赫曼遇害，副总统萨埃尔任代总统。

1981年6月10日，伊朗发生政变。宗教领袖霍梅尼逮捕总统巴巴萨德尔，控制了政权。

1981年7月29日，冈比亚发生一起未遂军事政变。

1981年8月4日，玻利维亚发生政变。总统梅萨被迫辞职，将权力移交给三军司令委员会。

1981年9月1日，中非共和国发生政变。达科总统被迫辞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科林巴接管政权，任国家复兴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1981年12月14日，巴林当局粉碎总部设在德黑兰的“解放巴林伊斯兰阵线”发动的政变阴谋。

1981年12月31日，加纳发生政变，军人领袖罗林斯宣布接管政权，利曼总统被解职。

1982年3月1日，苏里南发生一起未遂政变。政变领导人霍克被处决。

1982年3月23日，危地马拉发生军事政变，卢卡斯政府被推翻，文人和军人委员会接管政权。

1982年8月1日，肯尼亚总统挫败一起由空军发动的政变。1982年9月14日，黎巴嫩发生政变，总统杰马耶勒身亡。1982年10月2日，西班牙破获一起策划在27日大选前发动政变的阴谋。

1983年1月30日，苏里南军队司令鲍特瑟挫败一起未遂政变。

1983年10月25日，格林纳达政府军司令奥斯汀发动政变，推翻毕晓普政府，毕晓普遭枪杀。

1984年3月3日，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成立“军事复兴委员会”组成新政府。

1984年4月6日，喀麦隆发生一起未遂政变。忠于前总统阿希乔的萨利赫上校发动军事政变，但政变被忠于总统比亚的军队挫败。

1984年12月31日，尼日利亚陆军第三师师长布哈里少将发动军事政变，总统沙加里被捕，布哈里宣布行使国家元首权力。1985年4月5日，苏丹国防部长苏瓦尔·达哈卜趁总统尼迈里出访发动政变，推翻尼迈里政府。

1986年1月13日，民主也门发生政变，总理阿里·纳赛尔逃亡。政变引起内战。

1986年1月20日，莱索托准军事部队推翻乔纳森政府。该部队司令莱哈尼耶接管政权。

1986年2月7日，海地发生政变，终身总统杜瓦利埃逃亡法国。

1986年2月15日，菲律宾发生政变，总统马科斯流亡美国，科拉松·阿基诺组成新政府。

1986年9月7日，智利发生政变，总统皮诺切特死里逃生，政变失败。

1987年6月1日，黎巴嫩发生政变，总统卡拉米身亡，胡斯出任总理。

1987年8月28日，菲律宾发生军事政变，奥纳桑率政变部队攻打总统府未获成功，在军队的支持下，科拉松·阿基诺挫败了这次政变。

1989年11月26日，科摩罗发生政变，总统阿卜杜拉曼被打死。

1989年11月22日，黎巴嫩发生政变，总统穆阿瓦德被炸死。

1989年12月22日，罗马尼亚发生政变，总统齐奥塞斯库被处决。

1991年2月23日，泰国顺通·空颂蓬将军发动政变，推翻差猜·春哈旺的民选政府。

1991年1月26日，索马里发生政变，巴雷政府被推翻。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政变，戈尔巴乔夫总统被软禁，3天后政变失败，随后苏联解体。

1991年9月30日，海地军队临时总司令塞德拉斯发动政变，总统阿里斯蒂德流亡国外。

小 序

政变，是一种凭借暴力使国家最高权力发生转移的方式。

自从人类社会结束自然状态而组成国家以来，政变就象幽灵一般伴随着文明前进的脚步，从远古走来，走到近代、走到现代。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一方面是人类文明的突飞猛进和世界潮流的和平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发生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愈加频繁、惨烈的政变。几乎每一个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都发生过政变，现代文明人正越来越野蛮地制造流血动荡和痛苦。

政变，这一带有世界性的普遍政治现象不能不引起从政治家到平民百姓、从学者教授到粗通文墨者的关注和兴趣。有的人从中获得经验伺机效法；有的人从中吸取教训以防不测；有的人从中发现惊奇以图消遣。所以从政变中，政治家看到了追逐权力的成败得失；学者看到了政变发生的前因后果；慈善家看到了流血痛苦。通览政变，各有所得。

为追逐权力，人们失去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性，骨肉相残，亲朋不认。作为权力斗争的最高形式的政变，尽管大大小小，各不相同，但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军队和政府矛盾重重无法调和；二、军队内部派系林立、互争政权，大动干戈；三、部族不一，利益不同，世仇未泯，为争夺最高权力导致政变；四、统治集团最高层决策分歧难以弥合；五、政府软弱无力，难以控制局势，军队收拾残局；六、最高统治者残暴专制，民不聊生，政变者为民请命；七、翦除对手，以独揽大权；八、少数人为权欲所驱，铤而走险。

世界政变，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我们注意到，在人类历史上，政变并非是某一个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同时，也并非在任何政治体制下都会发生。政变的发生离不开个人的行为动机，但是政变的深刻根源则是隐藏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下。认识到这一点，将是避免和防止政变发生的开始。

“政变研究”应当成为 20 世纪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共同领域。这本小册子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政变事件介绍给读者，但这仅仅是数百次政变中的一小部分，由于受到所掌握的资料的限制，这本书难免有疏漏和错误，欢迎批评指正。借此机会，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周乾先生对我的鼓励和关心。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疏子平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写作条件。最后我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中，引用了一些报刊、杂志上的有关资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由于篇幅所限，所用资料难以一一注明出处，敬请谅解。

徐希罕

1994 年元月于宣城

夺权与失权

——二十世纪世界政变内幕——

下克上（1936年2月26日日本）

15世纪的日本，政局动荡，秩序混乱。地方豪强拒不服从将军，而将军又不服从天皇。他们割据一方，称王称霸。日本人给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起了一个专门名词——下克上。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5个世纪以后，在日本又演出了一幕惊心动魄的“下克上”的闹剧。

平静祥和的冬日

1936年2月25日，傍晚。

东京上空，鹅毛大雪飘飘扬扬，帝都一片银装素裹。人们为54年不遇的大雪感到十分高兴，瑞雪兆丰年嘛！

一排排艺妓馆、一家家店铺的门上悬挂着五颜六色的灯笼，散射出柔和、迷人的彩光，各式暖帘随风扑动。

寻欢作乐的人们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大街小巷闲逛逍遥。咖啡馆、电影院、西式舞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严寒中的东京似乎已有几分春意了。

首相官邸灯火通明，高朋满座。冈田启介首相这位已退役的海军提督正在他的官邸举行盛大晚宴，庆祝民政党在大选中再次获胜。冈田频频举杯。

这位比较开明的老军人已经厌倦了官场的勾心斗角。宦海沉浮几十年，太累。他想激流勇退，颐养天年。冈田似乎有点醉意。

离首相官邸不远的美国大使馆也是热热闹闹。宫内大臣斋藤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正出席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举行的36人晚宴。酒足饭饱之后，格鲁为他的客人专门放映一场由珍妮·麦克唐纳和纳尔逊·埃迪主演的电影《调皮的玛丽埃塔》。影片充满了美妙动听的音乐、美丽精彩的镜头、罗曼蒂克的故事。斋藤、铃木聚精会神，深深被这部爱情故事打动了，况且他们还是第一次看有声电影呢。时至深夜，他们才满意而归。

他们谁也不会想到会大祸临头。

雪夜密谋

皇宫外侧一端的第一师团兵营比以往格外肃静阴森。一批皇道派青年军官正聚集在此秘密策划军事政变，建立以皇道派军人控制的政权，推进国家法西斯化和对外侵略的步伐。

香田清真大尉显得有些激动，从蒲团突然站起来，说：“我们皇军的精英几十年来为了神圣的事业前赴后继，几次起事都不幸失败。但是他们的鲜血却唤醒了民众，激励着我们的斗志。如今，我们的行动已为统制派控制的军部所察觉，随时都有移师满洲甚至关押被杀的可能。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奋起一击，以改造国家、拯救民众，实现皇道。”

安藤辉三大尉慢条斯理而又冷漠严峻地说：“诸位，此次兵变，酝酿已久，我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周密、可行的。各位都是大日本帝国的优秀军人，都是荒木真夫的信徒。此次起事，不成功便成仁。”这位教师的后代表面看上去斯文有礼，却又不失军人的风度，平素在士兵中颇有影响。

香田清真手按指挥刀，宣布了起事的具体行动方案：

“行动时间：昭和11年2月26日凌晨4时。总兵力1474人，还有卫队75人、9个民间志愿者，分8组行动。第一组300人，由栗原中尉指挥，目标是刺杀冈田启介首相；第二组120名，由中桥基明中尉指挥，目标为刺杀高桥是清藏相；第三组150名，由坂井直中尉、高桥太郎少尉指挥，目标为

刺杀斋藤富内大臣，得手后奔袭教育总监的郊区寓所，干掉渡边锭太郎。第四组 150 名，由安藤大尉指挥袭击目标为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第五组 200 人，由河野寿大尉指挥，袭击目标为牧野神显伯爵；第六组 500 人，由野中四郎大尉指挥，目标为占领警视厅；第七组 30 人，由坂垣中尉指挥，目标为刺杀西园寺公望公爵；其余由我指挥，占领陆相官邸。部署完毕。现在是 20 点 43 分，诸位按计划分头准备行动。”

时间静静流过，大雪飘飘而下。

终于到了清晨 4 时，香田清真大尉和其他叛乱领导人的紧急集合的哨声把士兵们从梦中唤起。士兵们对政变阴谋一无所知，有的还以为是搞夜间演习，他们已习惯了这种生活。不到 5 分钟，1400 多名士兵已列队整齐地集合于军营的广场上。

香田清真快步走到队伍前，行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慷慨激昂地说：

“士兵们！我们大和民族最优秀的就是武士道精神。今天我们就要去实现这个精神。”也许是太激动，也许是军人的特性，也许是战前的紧急，香田并没有滔滔不绝地演讲下去，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由野中起草、村中加工润色的《起事旨趣书》，大声宣读道：

“神国日本之国体，体现于天皇陛下万世一系之统帅，其目的系使国家天赋之美传遍八迺一字，使普天之下人类尽情享受其生活。近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无视天皇尊严。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呻吟，国家内忧外患，日益激化。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

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奸臣，粉碎重臣集团。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

祈皇祖神保佑我辈成功，拯救祖先国土。”

香田话音未落，士兵中有人小声议论起来。政变来得太突然，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一等兵仓友音吉问身边的票原中尉：“长官，怎么回事？”“我要你同我一起死，”票原回答道。

仓友大吃一惊，但却立刻回答：“是的，长官，我愿意死。”队伍有点骚动起来。

香田大尉见到这种情形，立刻大声喊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违抗命令者，军法处置，各部奔袭目标，出发！”此时，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时针正好指向 5 点。

血洗内阁

票原中尉率部直奔首相官邸的正门。门卫把枪一横，“站住！什么人？”一名士兵答道：“自己人。快开门！”在门卫犹豫之时，票原急步上前一步把他抓住，用手枪抵着他的背心，命令道：“快开门！要不打死你。”

票原和几名士兵闯进大门，解除了警卫的武装，不知是谁用枪击落了大厅的吊灯，顿时首相官邸枪声大作。

住在首相官邸后门对面的首相秘书迫水久常被急骤的枪声惊醒。“不好，有人刺杀首相！”他想。他与首相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的妻子是冈田的女儿，而冈田的妻子又是他的姑妈。迫水敏捷跳下床，立即给警视厅打电话。

“有人刺杀首相，火速派人营救。”电话里回答道：“增援部队已出发。”他轻轻地放下电话，走近窗户一看，他惊呆了。增援的警察在枪声中一个个

倒下，一批军人，端着寒光发亮的刺刀朝首相官邸冲来。他又抓起电话再次给警视厅打电话。“少废话，我们是起义部队！”电话里传来杀气腾腾的声音。原来野中四郎率领的500名士兵已经占领了警视厅大楼。迫水又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宪兵队不安地回答：“局势已失去控制。我们哪是正规军的对手。对不起，秘书先生。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迫水愤然骂了一句“八格牙鲁”，然后把话筒狠狠地摔在桌上，仰天长叹：“没救了！老头子没救了！我们完了，彻底完了！”绝望中的迫水也无可奈何。

也许是酒喝多了，冈田睡得非常沉，激烈的枪声只使他翻了个身。这时，他的妹夫松尾传藏大佐带着两个警官推门而入，看到首相居然还在酣然大睡，便用力推醒了冈田。

“首相，陆军叛乱了。”松尾慌张说道。

“他们终于来了。”冈田似乎有所预料并不惊恐，也不急于逃生。

松尾不管冈田是否愿意，硬拽着穿着一件薄睡衣的冈田穿过走廊朝一个秘密的门走去，企图逃走。还未走到门边便听到砸门声，一个警官机警地把冈田和松尾推进洗澡间，然后把门关上。不一会，门被砸开，接着便是几下枪声，大概是朝那位警官开枪。之后，又是一片寂静。

“呆在这里，别动。”松尾说完便离开洗澡间。冈田不顾妹夫的忠告，也摸了出来，不巧碰倒几个酒瓶，吓得魂飞魄散，只好又退回洗澡间。

松尾刚走进大院，便被士兵发现了。

“快向他开枪！”票原命令道。几位士兵却犹豫不决。“八格牙鲁！连一两个人都不敢杀，到满洲后怎么办？”

士兵们只好瞄准松尾朝他一齐开火。

“天皇万岁！”松尾高喊一声便倒在台阶上，鲜血像泉水般涌出。他痛苦地呻吟起来。

票原中尉和一等兵仓友推开惊恐中的士兵，见松尾还在挣扎，对仓友说：“快，补他一枪！”

仓友好不情愿地举起手枪，朝松尾开火，一枪击中胸膛，另一枪打中鼻梁，松尾抽动了几下，便死去了。鲜血染红了雪地。票原拿出在首相卧室中搜到的一张冈田的照片，跪在尸体前核对。“是冈田。”票原得意地说。

士兵们高呼“万岁！”

在票原袭击首相官邸的同时，安藤辉三率领的150名士兵也冲击了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的官邸。这位年迈的海军提督被女佣人唤醒，明白了将要发生什么。他急忙翻身下床去找剑，想剖腹自杀以谢天皇。还未等他拿到剑，便被团团围住。一位士兵有礼貌地问道，“您就是铃木阁下吗？”

铃木十分坦然地回答：“是的，我就是铃木，请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这样做。”

一位下士有点不耐烦他说：“无可奉告！”

铃木泰然自若地对那个下士说：“开枪吧！打准点！”说完他昂首站在他父母的画像前，真有点视死如归的武士道精神。3支手枪同时开火，一枪打中下腹，一枪穿过心窝，另一枪未打中。又有人打了两枪，但铃木仍未死掉，在痛苦呻吟。

一位士兵准备再补一枪时，铃木的夫人发疯般地扑倒在铃木的身体上，恳求地说：“别再打了！”这时安藤辉三走了进来。他与铃木有一面之交，

很敬佩铃木的为人和品德。安藤目睹血泊中的铃木，料定他必死无疑，再补一枪感到似乎太残忍，于是命令部下向铃木致敬。他转过身对铃木夫人说：“夫人，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请多多原谅。”说完头也不回带着士兵走了。

谁也不会想到，铃木大难不死，尽管身中数弹，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死得最惨的是高桥藏相和渡边教育总监。由中桥基明中尉指挥的士兵冲进藏相宽大的住宅，砸开第二道门，俘获五六个卫兵和佣人，把房门一一踢开，寻找猎物。

此时的高桥藏相正独自躺在自己的卧室内。中尉终于找到猎物。他握着手枪冲进室内，一脚踢掉藏相的被子，喊道：“天诛！”高桥毫无惧色，也恶狠狠地大叫：“白痴！”中尉随即扣动手枪，把6发子弹全部射向高桥，另一名军官也狂叫着，挥起军刀猛力砍去，高桥的右手臂被砍了下来。这位军官觉得还难解心头之恨，又把刀捅进藏相的腹部，并恶狠狠地左右捅了几下，嘴里还振振有词：“老东西，送你这个基督徒去见上帝！”

这时：高桥夫人披头散发冲了出来，一见丈夫倒在血泊之中，便放声痛哭。中桥基明看着一群被吓得魂不附体的仆人时，冷漠地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高桥太郎少尉和他手下30名士兵闯进了教育总监渡边铃太郎的郊区寓所。此时，渡边和他的小女儿还躺在床上。高桥一言不发，拔枪就向他射击，然后又抽出军刀，朝他头上砍去。渡边没吭一声便死去了。

在这场血腥政变中，只有两个人幸免于难，一位是牧野神显伯爵，另一位是西园寺公望公爵。

牧野神显早年留学美国，历任日本外交界之要职，长期担任内大臣和宫内大臣，成为天皇的心腹顾问。当河野寿大尉领兵在他的山区休养地搜捕时，伯爵已闻讯逃到一家旅馆。叛军跟踪而来，放火焚毁旅馆，使伯爵葬身火海，至少逼他出来。这位老人却被他20岁的孙女和子从旅馆后门带走了。一老一少艰难地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爬。叛军紧追不舍，不断开枪射击。纤弱而又坚强的和子不顾一切展开双臂，毅然站在他祖父面前。士兵们深为姑娘的英勇行为所感动，竟然停止追击。年迈的牧野神显伯爵终于幸免于难。

西园寺公望公爵出身于宦宦之家，早年留学法国，历任政府要职，是位德高望重且又开明的政界元老。对于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叛军尽管凶残无比，但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不忍下手，终于放过了西园寺公望。

死里逃生

松尾作了冈田的替死鬼。冈田此时对叛军的大逆不道愤怒至极。他觉得自己必须活下去，为了天皇，为了镇压这帮叛逆。他躲进了壁橱里，伺机逃脱。

迫水返回首相官邸，发现岳父安然无恙，真是转悲为喜。如何把首相营救出来？四周都被叛军包围。多呆一分钟，首相就多一份危险。正在此时，宫内省一名官员打来电话，对首相的不幸遇难表示哀悼。

“对，将计就计，”迫水想，“趁吊唁之际，把首相装入棺材，偷运出走。”

与此同时，一个宪兵曹长在清理尸体时无意发现了躲在壁橱里的冈田，他象一尊佛像似的坐在里边，他告诉冈田，他会想办法营救他。

这位宪兵曹长和另外一个同伴福田计划着如何解救首相。

半个钟头以后，这位足智多谋的曹长和另外两位士兵从卧室皇拿出一套

西服给冈田穿上，并在院子里弄来一辆汽车。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他们准备停当时，有两辆黑色小轿车开了过来，下来十几个人，鱼贯而入走进官邸，他们是来吊唁“遇难”的首相的。如何不让人发现死者不是首相呢？

福田和迫水早就安排好了：由福田派一名从未见过首相的宪兵守在那里，不让吊唁者走近尸体。

在吊唁者烧香祭奠的同时，福田和另外一名宪兵把戴着口罩、身体蜷缩的冈田带到了后面。正当他们通过叛军把守的通道时，福田威风十足地喊道：“快让开！紧急病人！他不能看尸体！”这时，一名宪兵开来一辆车子，福田连忙打开车门，把已经精疲力竭的冈田首相推进 1935 年制造的福特牌轿车。司机开足马力，驶出大门，消失在大街上。

就这样，冈田奇迹般地脱险了。

吊唁人散去后，迫水把真情告诉了松尾大佐夫人：“夫人，松尾大佐为了让首相脱险，牺牲了！”

“如我丈夫能效劳，未亡人非常高兴。”这位武士的女儿十分平静、谦和地回答。

成败之间

香田大尉率领的叛军也顺利地占领了陆相川岛义之的官邸，正威逼他支持叛乱。

香田大尉宣读了《起事旨趣书》，接着又对川岛义之念了早已拟好的八点要求：

1、陆军大臣迅速进行善后，同时，将本事件导向维新之方向。此次行动之宗旨须由陆军大臣上奏天皇。

2、召集警备司令官、近卫、第一、二师团长及宪兵司令官，迅速采取措施，统一其行动，勿使皇军自相攻击。3、立即逮捕侵犯兵权大权的字垣、朝鲜总督小矶中将、建川中将。

4、立即罢免擅专军权之中心人物根本博、大佐、武藤章中佐、片仓衷少佐。

5、为威镇苏联，任命荒木贞夫大将为关东军司令官。6、立即召集各地同志、军官至东京，使之担任善后工作。7、前述各项见诸实施而使事态安定前，须将起事部队改编入警备队，绝对不使之离开当前所占据之位置。

8、将以下诸人招来陆相官邸……

叛军的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要排斥统制派，确立以皇道派为主体的天皇法西斯军事独裁体制。

“川岛阁下，您看如何？”香田大尉盛气凌人地问。川岛陆相当然知道来者不善，八点要求非同小可。“可是你们的要求，不是我一个人所能满足的，如果得不到天皇陛下的批准，我什么也不能说。我所能做的，只是把你们的要求禀报天皇陛下。”川岛茫然、含糊地回答。

政变的成败就要看天皇的态度了。这不仅因为天皇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对于一个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神，每一个日本人都必须对天皇尽忠，天皇的地位和威信不可动摇，这是日本社会和国民道德的基础。

川岛陆相迫于叛军的压力，进宫参见了裕仁天皇。川岛向天皇念了叛军的《起事旨趣书》和他们的八点要求，并汇报了几位政界元老被杀的情况。天皇听后，怒不可遏。

“传我的旨意：对叛军迅速予以镇压，决不留情！”川岛陆相诚惶诚恐，

“是！”说着便退了回来。

然而，陆军上层人物中的皇道派都动摇不定，对天皇的命令执行不力。他们只是向叛军发出了一份措词含糊的呼吁书——训诫：

- 1、天皇已悉起事之目的。
- 2、承认诸位行动之动机系出于真诚谋求显现国体。
- 3、目前显现国体之形式，我等望而生畏。
- 4、各军事参议官一致同意努力实现上述目的。
- 5、其余一切均按天皇旨意裁定。同时，真崎大将和荒木大将也与叛军对话敦劝他们结束叛乱。

安抚，使叛军的气焰更加嚣张，香田大尉代表叛军的回答是：“如果我们最初提出的要求得到同意，我们就服从你们的命令，否则，我们不能撤离我们已经占领的地段。”

军部的拖延、敷衍，使天皇非常生气。“杀戮朕之股肱老臣。如此凶暴军官，其精神有何可恕！”他大声训斥陆军参谋总长。“哼，自从戒严以来，陆军部为什么迟迟按兵不动？为什么不迅速解决事端？”天皇再次责问。

“如果陆军不能镇压叛军，我将亲自劝阻他们。”裕仁天皇说完，怒气冲冲，拂袖而去。

看来，政变的结局已定。

兵不血刃

在天皇的坚决敦促下，陆军于2月28日早晨5时零6分发出敕令，这道以天皇名义发出的敕令，命令叛军“迅速撤离”所占领区（约1平方公里），回到各自的部队去。如果叛军在次日早晨8时前还不撤离，将对他们开火。

这道敕令使叛军分化为两派：一派要服从天皇，另一派则认为：此道敕令系伪造，应抗争到底。

局势仍僵持不下。

军部立即从外围城市向东京大量增兵。同时，联合舰队也开进了东京湾，陆战队开始布防，进入战斗状态，特别是其中的少壮官兵巴不得立刻行动，为3名被叛军杀害的海军老前辈报仇雪恨。他们把军舰上的炮口对准国会大厦，只要一声令下，就会把大厦夷为平地，把叛军轰成碎片。

2月29日上午6时，陆军本部宣布：“本军将断然镇压帝都僭町一带制造骚乱的叛军。”这是自政变以来第一次使用“叛军”一词。

东京城内一片死寂，学校停课，交通中断，电讯断绝。坦克开进阵地待命，它的两侧还挂着标语，要求叛军“谨从敕令，立即撤退”。满载炸弹的轰炸机在乌云密布的天空盘旋。还有飞机撒传单，随鹅毛大雪飘然而下，题为《告下土官兵》：1、速回原部队，为时未晚。

2、抗拒者为叛匪，将予枪杀。

3、汝等父母兄弟皆因各位成为国贼而哭泣。

航空大楼上空升起一个大气球，下边挂着一幅大字标语：敕令已颁，勿抗军旗。高音喇叭、广播电台反复播送致叛军士兵的呼吁书：

你们真心诚意地服从你们的长官，相信他们的命令是正义的。但是，现在天皇命令你们归队。如果继续顽抗，你们就成了违抗敕令的国贼。你们曾相信自己做得对。现在，你们既然知道错了，就不该继续背叛陛下，成为国贼，遗臭万年。回头是岸，为时不晚。你们过去犯的罪行会得到赦免。你们的父母兄弟，全国的男女老少都真诚希望你们回头。立刻离开现在的阵地，回原部队。

强大的心理战和政治攻势，叛军开始瓦解了。他们以疑惑的目光面面相觑，他们不想成为国贼，不想违背天皇陛下的旨意。可谁都等待别人先行动。

到上午 10 点左右，有 35 名下士官兵带着武器离开了阵地。中午时分，除了在首相官邸和山王旅馆的几个小分队外，几乎所有士兵都回到所属部队。下午 2 时，飘扬在首相官邸的旗帜落了下来。1 小时后，军部通过电台宣布，叛军已投降。

叛军首领 18 人仍在陆军省和山王旅馆。皇军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去攻打或逮捕他们，目的是给这些人一个机会来表现武士道精神。荒木贞夫大将要求他们切腹自杀以谢罪天皇。准备了 18 口棺材，准备收尸。

求生的欲望终于战胜了武士道精神，他们决定让军事法庭审判。只有野中四郎大尉拒绝投降，切腹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

皇军圣战，流血牺牲。而我等无用武之地闲居国内。

如果我今后碌碌无为地在帝都苟且偷生，何以对得起那些人的英灵？我的出路只有一条：切腹。

这场历经 86 小时的皇道派军人的政变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被平息了。

4 天后，河野寿大尉切腹自杀，7 月 12 日，香田清真、安藤辉三、村中孝次、高桥太郎等 13 名军官和包括北一辉在内的 4 名文官，被绑在东京代代木卫戍监狱的一隅的刑柱上，蒙住眼睛，前额画了靶标，由刑警队执行枪决。

“2·26”军事政变虽然失败了，但它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军事独裁的最终确立和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大。

尼罗河的怒吼 (1952年7月22日埃及)

悲哀的远航

1951年暮春的一天。埃及，这个以金字塔而闻名于世的文明古国到处歌舞升平，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之中。已过而立之年的国王法鲁克同他芳龄17岁的新娘纳丽曼举行了隆重豪华的婚礼。新郎新娘摆好姿势，摄影记者按下快门，拍下了法鲁克的第二次结婚照。接着，他们夫妇二人坐上王室豪华的游艇，前往威尼斯、卡普里岛和戛纳，开始了英国人称之为“当代最奢侈的蜜月旅行”。宜人的风光、新婚的甜蜜，法鲁克夫妇陶醉了。

春去春又归。一年之后的7月26日，国王夫妇又从埃及启航远行。不过，此次不是去旅行而是流亡。法鲁克从亚历山大港登上轮船。伫立船头，往事不堪回首。昨日还是太阳之神，今日却为失位之君。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顷刻间烟消云散，一切都只能在异国他乡的梦中回想。

年少不知愁滋味

1920年，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新添人丁，国王福阿德老来得子，后嗣有人。这位婴儿就是法鲁克。法鲁克在宫中度过了天真无虑的童年。为了把王子培养成为一个有教养、有知识的王位继承人，法鲁克少年离开祖国，被送到英国留学。1936年福阿德病逝，领导一个内忧外患的文明古国的重担就落在一个才16岁的少年法鲁克稚嫩的肩上。法鲁克怀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对国王生活的新鲜感登基了。

埃及虽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宪法赋予国王许多权力。他是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行政权掌管人，神圣不可侵犯。他有权任命五分之二之的议员、宗教领袖、国王卫队长、议会多数党领袖，对总理、外交使节和高级军官有权赦免，有权授予爵位、勋章和荣誉头衔。正值翩翩少年的法鲁克一世，尽管大权在握，但也天真无邪。特别是在二战的艰难岁月，他率领他的臣民协同英国为抗击法西斯的侵略进行了不屈的斗争，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真正虔诚的穆斯林教徒的品德和作为国王的崇高威望，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可悲的是，他把王位当作一把可以睡大觉的安乐椅；他不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正当他高枕无忧、忘乎所以时，一个比他仅年长2岁的年轻人把法鲁克从坐了12年的皇位上拉了下来。

这个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年轻人便是纳赛尔。

要把皇帝拉下马的年轻人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年1月15日出生于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美国的著名政治学家拉斯韦尔说：“寻求权力者”去追求权力是补偿童年时代心理上所受损害的一种手段。纳赛尔家室寒微，祖祖辈辈务农。父亲是个邮局的小职员，母亲是位商人的女儿，温顺贤良。他9岁时，母亲不幸去世。少年失母，乃人生之大不幸。父亲收入菲薄，家中子女又多。但他父亲无论如何要把4个儿子中的长子纳赛尔送去读书，望子成龙。

纳赛尔上小学时，常在假期随家人去祖父家聆听家人讲述埃及灿烂的文明和遭受的屈辱。也许报效祖国的愿望就从此萌生。小学毕业后，他考进了开罗中学，度过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少年时代。在这里，他初露锋芒，表现出众，他好学认真，尤其对历史课程最感兴趣。在这里，他也表现出日后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天赋的组织领导才干。16岁时，他组织同学反对美国人的

统治。17岁时被选为校委会代表，声援支持华夫脱党人恢复政权。由于他思想激进、政治活动积极，被警方列入黑名单。虽然中学毕业成绩优良，但前途渺茫，深造不能。此时，正值丧权辱国的《英埃同盟条约》的签订，他懂得弱国无外交的现实。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靠议会和说教都无济于事，唯有军队才是拯救埃及的力量和希望所在。他决意投笔从戎。开罗军事学院招生委员会主任海里少将慧眼识英才，在他的推荐之下，1937年初，19岁的纳赛尔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军校学生。

在这所培养元帅、将军的埃及最高军事学院，纳赛尔博览群书，拿破仑、阿塔图克、俾斯麦、邱吉尔等人的传记；埃及、阿拉伯各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卢梭、狄更斯、伏尔泰等人的著作，都令他爱不释手。历史告诉他，作为军人不仅要英勇善战、服从命令，更要文韬武略，有理想有抱负。在军校他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和同学，其中许多人成为日后革命的中坚和精英。

严格的一年半军校生活结束了。1938年7月1日，纳赛尔从军校毕业，获得陆军少尉军衔。不久被派到第三步兵旅当了一名排长。就驻扎在他的老家曼卡巴德。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偏僻之乡会成为“自由军官组织”的诞生地。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立意要成为伟人。纳赛尔在少年时代萌发的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和天才的组织能力在这块穷乡僻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深深懂得，改造社会、拯救民族，远非个人的力量所能实现，要有一批志向远大而又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一个严密而又有力的组织，一个切合实际思想和纲领。他坚定而谨慎地朝着这个既定的方向努力，从和他一样的下级军官中严格审查和挑选最可靠的人，其中便有未来的革命战友和接班人萨达特和毛希丁。

萨达特后来曾深情地回忆这一段令人难忘岁月：

我们在阿什·沙里弗山麓，每夜围着篝火而坐，这些佩带着武器的兄弟，是年龄和军衔都差不多的青年，充满着同样的希望，有着同样的热情！我们很快就熟悉和友好，我们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相同地对现实理所当然的否定把我们联结在一起……，这个外表堂堂、性格直爽的年轻人经常和我们接触……，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同我们大家一样，但他表现出愁闷和忧郁、严肃和沉着……，他的道德纯正，他的眼光远大，使我们对他产生爱慕。由于他有着炽热的情、自信和力量，所以凡是同他接近的人，都会受到他强烈的影响。他对未来充满自信，他的热情和对埃及前途的满怀信心感染了我们。他很快成为团结大家的中心，在他的周围聚集了许多热烈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虽然还没有预见到他们的领导者将成为新时代的开拓者，但已认识到他是前途的带路人。

加麦尔把自己在秘密工作中锤炼出来的革命气概和组织工作者的真实才干，献给了解放事业。当我们围坐在阿什·沙里弗山麓篝火旁的时候，他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呢？“我们将同帝国主义斗争，同君主政体和封建主义斗争，所以我们反对不平等、压迫和奴隶制度。所有的爱国者都希望建立一个强盛的和完全独立的自由的民主国家。这个目标将用武装的或别的方法来达到。时不待人，国家正处于现实的混乱中。社会的要求……给我们指出了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革命。”

以纳赛尔、萨达特为首的一批风华正茂的热血军人于1939年初成立了地下革命团体——自由军官组织。

不久，一纸军令把纳赛尔换防到亚历山大。临行，萨达特为他送行。两位战友执手相看。纳赛尔坚定地说：“革命刚刚开始，我就要象孤雁一样离开了各位兄弟，但我们的事业不能半途而废。萨达特，只有你才能肩负起斗争的重担。我也会把点燃于穷乡僻壤的革命之火带到繁华闹市，让它燎原全国，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经过二战血与火的洗礼，1943年纳赛尔升为陆军上尉，回到阔别多年的开罗，在他的母校任战术教官。他的弟子遍布埃及各兵种，他已是军中的知名人物了。这为后来自由军官组织的壮大以及他个人号召力的增大打下了基础。到二战结束时，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已近千人。巴勒斯坦战争使这个青年军人的组织更严密、目标更明确、决心更坚决。

1948年5月巴勒斯坦战争爆发。纳赛尔被派往前线。他的部队同主力失去了联系，被以色列人装进了所谓的“法卢贾口袋”。纳赛尔孤军奋战，决不投降，一直坚持到停战协定的签订。他自己也身负重伤。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埃及的贪官奸商为获得暴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竟然把没用的武器送到前线，大发国难财。现实，打破了军人的幻想，原来对法鲁克的最后一点信任也消失了。很显然，非得用武力推翻腐败的政府，否则埃及永无宁日。

在法卢贾被困期间，纳赛尔在他的掩体和作战室里召开了“自由军官组织”第一次会议。对于许多人，这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领袖。纳赛尔面对着出生入死的战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战友们，我们在巴勒斯坦作战，但是我们的思想仍在埃及，我们的子弹在射向我们面前战壕里的敌人，而我们的心是在遥远的祖国，祖国正受到一群不可靠的人的摧残。我们的主要战场是在埃及。我们要用自己手中的武器推翻颓顶无能、腐朽之极的政府，赶走英国人，为埃及的民主、强盛而斗争。”

在硝烟弥漫的战地，自由军官组织建立了领导核心——创建委员会。其主要成员有：中校纳赛尔、中校萨达特、空军中校萨勒姆、少校赛拉·萨勒姆、少校毛希丁、少校阿密尔、少校侯赛因、空军少校波格达迪、空军少校易卜拉欣。深受众望的纳赛尔当选为委员会主席。

一切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等待着革命时机的来临。

开罗大火

苏伊士运河是用埃及千百万人的尸骨开凿的。然而1922年埃及取得独立时，运河区这一重要的战略地区却为英国人所控制。所有具有民族自尊心的爱国者眼看着埃及作为一个文明古国、阿拉伯世界的一个主要国家却不能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不能制止英国殖民者的奴役占领。整个埃及社会陷入了深深的不安。

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鼓舞了埃及人民为收复运河区的主权而斗争的勇气，强烈要求国王废除丧权辱国的《英埃条约》。英国殖民者无视国际法和他国的领土主权，蛮横地拒绝了埃及人民和政府的正义要求。埃及人民走上了武装反英斗争的道路。埃及各地的工人、学生纷纷组织志愿军和游击队，进入运河区，袭击英国占领军。面对埃及人民的武装反抗，英军进行了武力镇压，企图用血雨腥风来扑灭埃及人民的斗争烈火。从1951年10月15日至12月5日，英军就打死打伤550名埃及群众，把150人关进集中营。

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需要政府的援助。他们要求政府发放重型武器，沉重打击占领军，但埃及王室和政府却畏首畏尾，迟迟不敢采取果断措施，他们虽不满英国人的占领却又不肯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虽同情人民的反抗

却又拒绝以武器援助他们。埃及的统治者害怕人民甚于害怕敌人。当开罗市民在1月中旬举行游行示威，围住英国使馆时，政府竟动用警察用催泪瓦斯驱散人民。

1952年1月25日，英军对参加运河区武装反英的埃及警察采取军事行动。这天，英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运河区重镇伊斯梅利亚埃及警察总部发起进攻。埃及警察奋起反击，经过3个小时的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埃及警察战败，41人阵亡，72人受伤。

埃及的警察竟在“埃及的国土上遭到一个外来大国的屠杀”，开罗举城为之哗然。1月26日清晨6时，开罗大街上500多名神情严肃的埃及警察前往阿比丁王宫前的广场，沉痛地哀悼为国捐躯的同伴。一路上，游行的队伍越来越长，工人、学生、职员都纷纷加入。到中午时刻，悲愤满腔的人群开始涌向西方人奢华的居住区。怒不可遏的人们焚烧了那里的旅馆、饭店、酒吧间、高级商店、影剧院。那是埃及人民的双手所建，为什么被英国人所独享？一时之间，开罗古城火海一片，浓烟滚滚。

此时的法鲁克国王正在王宫里寻欢作乐。当有人报告说牧羊人饭店快要被大火烧毁时，法鲁克稍感震惊，但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区区小事，不值得躬亲处理。熊熊烈火在无情地吞噬着开罗，王宫的宴会却依然觥筹交错。不久，成群结队的人们穿过阿比丁广场朝王宫涌来。法鲁克透过进口的高级窗帘看到这一情景时，原先悠然自得、满不在乎的神情顿时变得惶然不安了。游行群众高声辱骂法鲁克，许多人还唱起了辱骂国王的歌谣。法鲁克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下令开罗警察立即出动，镇压示威。他哪里想到，此时的警察也在游行队伍之中呢？法鲁克只好调遣军队前来镇压。余辉中的开罗终于平息下来，全城实行了宵禁。

开罗大火使700幢建筑物毁于一旦，26人死亡，552人受伤，财产损失达5000万英镑。

开罗大火事件之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下院发表声明，蛮横地向埃及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埃及政府“承担全部责任”，赔偿损失，并重申英国政府“决心维护依据1936年条约所获得的权利”。在英国的压力下，埃及政府屈服了，埃及政府照会英美等国，就开罗大火事件公开表示道歉，并答应赔偿1435万美元。埃及人民的战斗和鲜血，换来的却是耻辱。

在法鲁克王朝统治下，战后埃及依然政治黑暗，经济凋敝，人民生活贫困不堪。据统计，埃及年人均收入若按1913年的价格计算，那么，1913年为12.4埃镑，1935—1939年为9.6埃镑，1940—1949年为9.4埃镑，经济呈负增长。0.01%的大地主却拥有10%的好耕地，广大农户无地可耕。封建地主压迫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全国农村只有800名医生，佃农的平均寿命为27岁，2/3的居民患有疾病，儿童的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文盲约占80%。法鲁克本人则是声色犬马、醉生梦死、远忠臣而近小人。“黑色星期六”之后，内阁成员频繁更迭，如走马灯一般。政府危机已到了顶点。革命时机成熟了。

“为人民，我们必须拔剑”

为了确保起义成功，自由军官组织并未直接参加当时的反英斗争。开罗大火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动荡政局，使“自由军官组织”认识到“国家已为革命准备好了一切条件，因为人民已对各政党失去了信心。至于人们对国王和英国人的感情，则已达到了反对和仇恨的顶峰”。2月10日，“创建委员

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商讨对策。纳赛尔坐在主席位上，深深地吸了口香烟，严肃他说，“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何去何从，请各位发表自己的高见”。

毛希丁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人民群众提出了这样的战斗口号：打倒国王，同英国绝交。但是运动缺乏真正的政治领导。其他的政治力量或组织有的被官方追捕，无力领导这场斗争，更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只有我们军队是唯一没有受到打击的革命力量。是的，我们军队曾经作为工具镇压过人民的革命，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这支力量不用来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不去反对人民的敌人呢？何况这是我们多少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寻求的好时机。”

稳重寡言的萨达特也站起来，显得有些激动。“我同意毛希丁少校的意见。只有军队才能负起实现变革的责任。我们拔剑，快刀斩乱麻，为人民消除痛苦。”

会议主持人纳赛尔坐在主席席上，在听取了各位的意见之后，做出了建议性的决定：“现在的确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刻，原定于1954年起义时间必须提前，时不待我，贻误战机就是犯罪和失败，我们身为军人，都深知这一点。我提议起义时间暂定为8月。”

此次会议草拟了宣告起义的6点宣言：消灭殖民主义，取消封建制度，消灭垄断和资本对政权的控制、树立社会正义、加强军队建设和建立稳定的民主生活。

起义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着手进行。

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加速起义进程的插曲。埃及的军官俱乐部正值重新选举新主任，民族主义军官便推举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作为候选人，同时“自由军官组织”也秘密地推举他担任“创建委员会”主席，作为名义上的领袖。一来可以扩大影响，增强号召力。因为在贪污成风的军界上层，纳吉布素来两袖清风廉洁奉公，为众人尊重；二来可以迷惑国王，隐蔽起事，因为纳吉布被公认是效忠国王的军人。令人不得其解的是法鲁克竟然拒绝接受纳吉布为候选人，而要强迫俱乐部接受同提供无用的武器丑闻有牵连的侯赛因·西里·阿密尔为候选人。军官们认为国王这样亲小人远忠臣的行为是一个挑战，是对他们的污辱。创建委员会认为此时反对腐朽制度的任何起义都会得到所有有正义感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军官们、士兵们的支持与响应。

7月22日，纳赛尔在获悉法鲁克对起义已有所察觉并准备大肆搜捕的情报后，立即召集“创建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提前发动起义。会议决定这次起义的步骤是：（1）确保控制军队；（2）接管政府，任命一名新首相；（3）废黜国王。准备了十几年的起义终于付诸实施了。

战斗，在3小时内结束

7月22日午夜11时，“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开始了。坦克、装甲车和炮车的隆隆声打破了往日开罗军营寂静的夜空。很快，装甲车部队便包围了整个军营区，坦克部队也顺利地占领了各战略要地。开罗驻军大批自愿地加入起义部队。擒贼先擒王，一支特遣分队急速赶返开罗郊区的库巴，攻打那里的埃及陆军总部。在起义部队的猛烈攻击下，总部的守卫部队自知大势已去，只作了象征性的抵抗，即缴械投降，逮捕了埃及武装力量的总指挥。另一支约有一装甲旅兵力的特遣部队为防止英军可能进行的干涉，封锁了通往苏伊士运河的道路，并布置了临时防线。到第二天凌晨2时埃及各兵

种包括 12 名将军在内的高级将领，已分别就擒，被集中到开罗军事学院严加看管起来，以防他们外逃纠集余党伺机反扑。至此，“自由军官组织”掌握了整个开罗地区的军队领导权。为扩大战果，起义部队通过电话联系，得到了西奈、亚历山大、坎塔拉、阿里什和西部沙漠等地驻军表示支持的明确答复。

“创建委员会”初战告捷，便命令部队开入开罗城内。按预定的军事部署，各部分别占领了开罗机场、火车站、重要桥梁、电报电话局和广播电台。拂晓前后，整个首都已在起义部队的牢牢控制之下。

23 日上午 7 时整，“创建委员会”成员萨达特以埃及武装力量总司令纳吉布的名义，向埃及人民发表公告：

公民们，为反对王室的专制暴政和国家的腐败政治，我们埃及军队起义了，并取得了成功，埃及将会从此走上民主、独立、繁荣的道路。我们希望每一位公民拥护我们的正义之举。

开罗市民闻讯，奔走相告，拍手称快。整个开罗一片欢腾。

“陛下，请签字”

萨达特广播讲话以后，埃及政府随即在亚历山大召开紧急会议，被迫宣布全体辞职。当天上午，“创建委员会”指命阿里·马希尔出面组成新内阁。7 月 25 日晨，起义部队开进亚历山大，第二天包围了法鲁克所在的蒂恩角宫。如困兽般的法鲁克正声嘶力竭，大叫“顶住”，“顶住，英国朋友会来救援的。”王宫卫队在稍作抵抗、造成 6 人受伤之后，便放下武器投降。

与此同时，“创建委员会”派出的特使驱车急速赶到了亚历山大内阁大厦，要马希尔将一份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发的最后通牒转交给法鲁克。10 时左右，马希尔匆匆来到王宫，将最后通牒面呈法鲁克，并劝他接受。通牒写道：

法鲁克陛下：由于您的不良行径，玩忽宪法，蔑视人民的意志，使当前国家的一切公共事业已陷入全面混乱之中，甚至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和尊严都无保障。您冥顽不化，使埃及在国际上信誉扫地。卖国贼、贪赃枉法者在您的庇护下，横行不法、大发横财，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埃及却哀鸿遍野、饥寒交迫。这一切现象，在巴勒斯坦战争中和尔后的破烂武器丑闻中，在随后以您赤裸裸的干涉所破坏的审判中都得到了集中表现，影响极为恶劣。真理被颠倒，正义不得申张，卖国贼横行无忌。发财的照样发财，荒淫无耻的照样荒淫无耻。有您撑腰，这些人哪能不这样干呢？因此，代表人民力量的军队授权于我，要求陛下最迟不得晚于公元 1952 年 7 月 26 日中午 12 时逊位于王储艾哈迈德·福阿德亲王殿下，并在当天下午 6 时以前离开埃及。如若陛下拒不照办，军队要您承担由于违背人民的意志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因纵欲过度面色如土的法鲁克看罢通牒，大惊失色，冷汗直冒。他壮着胆，十分胆怯地问马希尔：“我的旨意不是至高无上的吗？”马希尔听了法鲁克可笑的发问，哈哈大笑起来，突然严肃地回答：“陛下，人民的意志才是至高无上的。”法鲁克顿时哑口无言，一屁股坐在椅上，半天不动，呆若木鸡。中午，当副首相带着早已拟就的退位诏书到王宫来要法鲁克签署时，法鲁克下意识地抓住副首相递过来的派克金笔，紧张得不能自己，连自己的名字都签错了，最后只得重签一遍。当天傍晚，在夕阳的余辉下，法鲁克故作镇静地穿上一套白色的海军上将制服，在妻儿的陪伴下，偷偷夹带着早先

从埃及银行库存中提出的黄金，登上“首都号”游艇驶往意大利。伫立船头，回首恨依依。从此，他再没能回到自己的国家。路遥归梦难成。1965年法鲁克在忧郁、绝望中病逝于罗马。

请求辞职 (1964年10月14日苏联)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之日,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在头版刊登了令全世界万分震惊的苏共十月全会的公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今年10月14日举行了全体会议。

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请求。

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的被解职难道真的如公报所说的,是“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而自己提出请求的吗?

凡是熟悉苏共党内几十年来权力斗争内幕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冠冕堂皇、自欺欺人的理由。何况那些耳听八方,眼观六路、消息灵通的无冕之王呢?

路透社报道:“西方观察家们对于官方提到赫鲁晓夫的健康状况不好这一点感到迷惑不解。在赫鲁晓夫两星期前去高加索休假之前看到过他的记者们说,他看来精神很好,而且身体也很健康。”

芬兰电视台评论员说:“如果赫鲁晓夫是自愿辞职的话,在宣布时会庆祝和赞扬他的工作。”

美联社说:“如果年迈和体弱是他退休的唯一原因,或者哪怕是主要原因的话,他完全可以作为领导集团中的一员留下来。”

真正的答案是再也清楚不过了:在非民主的宫廷政变中,赫鲁晓夫,这位苏联的最高掌权者,这位社会主义改革的弄潮儿在变幻莫测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了。

地狱中的幸运儿

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充满了传奇、神秘色彩。他个人的得失荣辱与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尼·谢·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生于苏联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卡村的一个矿工家庭。从出身来看,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后代。青少年时代,当过牧童、钳工。他的这段艰苦生活后来竟然成为人们的笑料。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当时是副总统)在有名的“厨房辩论”中,讥笑赫鲁晓夫贫寒、低微的身世。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他就在自己的故乡担任贫农委员会主席,算是苏俄最基层的干部了。他还是1918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

当西方国家和国内白匪企图把年轻的苏维埃扼杀在摇篮之中时,年轻的赫鲁晓夫毅然扛起枪,积极、英勇地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国内战争,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内战结束后,他脱下军装,复员到顿巴斯煤矿当了一名普通的矿工。后来由于他的勤奋和机灵,被送到顿涅茨工学院工人专修班学习,毕业后,先后在顿巴斯、基辅等地从事党的基层领导工作。

在斯大林自豪地称为“大转变的一年”1929年,赫鲁晓夫被选送到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幸运之神开始特别青睐赫鲁晓夫。

这时的苏联“阶级斗争”异常复杂、激烈,不少的开国元勋布哈林、朱可夫、托姆斯基等都被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认为是“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打倒在地。另一方面,又正值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全面发展的时期。

百废待兴，人才缺乏，像赫鲁晓夫这样的既出身于矿工之家，又粗通科学技术；既有基层领导的经验，又有敏锐的政治意识的人当然会受到重用。就在工学院学习时，他结识了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里露也娃，并成为好朋友。有了这一层关系，在非民主的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就有了保护伞，在以后的政治生涯、宦海沉浮中起了他当初做梦也想不到的作用。也就在他进入大学的第二年，他奇迹般地担任了工学院党委书记。

在斯大林时代，在残酷无情的“肃反”、“清洗”中，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正直的开国元老、功勋卓越的将军、忠诚的党员干部、成就斐然的学者、作家都屈死在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斧头之下。然而，赫鲁晓夫非但没有失去一根毫毛，而且还步步高升，扶摇直上。他以后的履历表就是他官运亨通、飞黄腾达的最好记录：

1931年，任鲍曼区和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第一书记；

1932年，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

1933年，任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

1934年，当选为中央委员；

1935—1938年，任莫斯科省委和市委第一书记；

1938年1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8年3月，担任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兼任基辅省委和市委第一书记；

1939年3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1—1945年，任西南、斯大林格勒等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获中将军衔、二级苏沃洛夫勋章、一级库图佐夫勋章；

1949年12月，任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兼莫斯科省委、市委第一书记；

1952年10月，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中央书记；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这个短暂的权力真空中，他又左右逢源，力挫群雄。解除了秘书出身的马林科夫的中央书记的职务，清除了恶魔贝利亚。在同年9月的中央全会上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3月又“接替”布尔加宁，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从而正式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也许人们要问：在人人的性命朝不保夕的斯大林年代，赫鲁晓夫为何如此幸运呢？

青年学者秦晓鹰评论道：“他用东方式农民的智慧、敏锐甚至胆怯，去了解迎合斯大林；又用官场娴熟的法术讨得他（指斯大林——引者）莫大的欢欣。”

苏联学术界总结得更具体、更全面：

“首先，在吹捧斯大林、搞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也是很突出的一个。在斯大林生前，他曾肉麻地吹捧斯大林就像生身的父母一样，是最伟大的思想家等等。事实表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是别人，正是赫鲁晓夫一伙搞起来的。也正因为 he 不断吹捧斯大林，赢得了斯大林的欢心，引起了斯大林对他的好感。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赫鲁晓夫也是斯大林意志的一位忠实能干的贯彻者。他在乌克兰和莫斯科主持党的工作期间，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斯大林的路线，不知道害了多少好干部。唯其如此，他才能得到斯大林的赏识和器重，才能步步高升。第三，在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采取了韬晦的政策，装成一个没有任何野心、十分驯服的人。斯大林在一生最后的30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孔策沃近郊的别墅里。最高领导者们几乎天

天彻夜长谈。赫鲁晓夫则为斯大林和其他领导者们跳乌克兰民间舞蹈。当时他穿着乌克兰斜领衫，装扮成热情奔放的哥萨克，显示出没有任何权力欲的样子，尽量讨斯大林的欢心，使斯大林对他放心。第四，赫鲁晓夫也是一个为了自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得以成功地躲过了许多危机。如，在斯大林搞清洗的时代，有一个时期赫鲁晓夫到莫斯科学习，他正好与斯大林的夫人分在一个党支部，他是这个支部的负责人。当时肃反活动甚嚣尘上，人们互相告发，而且每个人都必须对斯大林的罪恶做法公开表示拥护，而斯大林的夫人又是坚决反对斯大林这种野蛮行径的。面对这种情况，赫鲁晓夫很伤脑筋：不衷心拥护斯大林的路线和政策，凭良心对斯大林夫人的意见表示赞同吧，立即就会引来杀身之祸；衷心拥护斯大林的路线和政策吧，得罪了斯大林夫人，如果她回家在斯大林面前说几句坏话，自己也完了。他想来想去，觉得左右为难，为了避开危机，于是就装病躲进了医院。”

然而，这并不是赫鲁晓夫面貌的全部。在近乎庸俗，甚至卑鄙的外壳包裹里，赫鲁晓夫还保留了某种共产党人的心胆；在曲折的人生和无情的政治里，他还懂得什么是起码的正直。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过去的不光彩历史而讳莫如深；也没有因为对权力的追求而丧失一个人的良心。正是他在成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后，大胆阔斧地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

如果说斯大林时代的赫鲁晓夫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把自己的良心和思想暂时掩埋起来的话，那么，当他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时他那颗冬眠的心终于苏醒、跳动，为了神圣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把生活在斯大林恐怖之下的人民解放出来，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识，掀开了苏联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新的一页。

赫鲁晓夫执政的第一个深得人心的政策便是为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平反昭雪。

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在苏共十七大选举中得票超过斯大林的基洛夫被暗杀而引发的持续3年之久并波及全国的血腥大清洗运动，使一大批党、政、军的杰出领导人惨遭迫害：有的被枪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几百万人。下列一连串的统计数字会使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感到触目惊心、悲愤不已：

139名苏共中央委员中有90名被逮捕、枪毙；

1966年出席十七大的代表被枪杀、监禁的有1108名；

6名在十四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成为“人民的敌人”被处决。

5个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指挥员中3人、12名二级集团军军长的全部、67名军团长中的60人……几乎全部的师长、旅长约35000名优秀指挥官被枪毙或者送劳改。

“列宁格勒反党集团案”、“医生谋杀案”又使劫后余生的一大批干部乃至普通人受尽迫害。有人说，当时斯大林可以因为某人走错一步路、一个动作或一个眼神不对而断送他的性命。

在这样的“红色”恐怖——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下，人们最大的幸福就是早上上班晚上能平安回来。

日积月累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并没有随斯大林的死而消失。相反，它极其严重地窒息了苏联的民主。

任何改革，如果不去解答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那就失去人心。

为了顺利地展开平反工作，1953年6月26日以赫鲁晓夫为主的新的苏

联领导人以宫廷密谋的形式逮捕并处决了制造大清洗的恶魔、杀人狂内务部长贝利亚。

斯大林死后才一个月，赫鲁晓夫就为“医生谋杀案”和“列宁格勒反革命集团案”平反，释放所有的受害者。据一材料透露，从1953—1956年光苏联最高法院和军事法院就恢复了37000多人的名誉。再加上1956—1961年期间恢复的，以及大量由地方法院处理的人，在他那个时代得到平反昭雪的人数之多就不难想象了。正是由于赫鲁晓夫的努力和解救，千百万被关押或流放的人回到家园与亲人团聚，恢复了党籍、工作和名誉。一些被迫害致死的，得到了昭雪，他们的家人得到了政府的照顾。

直到今天，那些在斯大林时代受到残酷迫害的人能够劫后余生，无不感激赫鲁晓夫的救命之恩。正如一位受“医生谋杀案”牵连的眼科医生费奥多罗夫所说的：“如果不是二十次代表大会，大部分像我这样的人，好像已经到了生命道路的尽头。”

赫鲁晓夫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掀起了本世纪共运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高潮。

对于像中国和俄国这样封建宗法制残存较多的国家，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是个难以驱散的幽灵，难以治愈的顽症和难以摆脱的苦难。人民大多文化水平低下，缺乏最基本的民主意识，他们习惯于有一个“救世主”，心甘情愿地崇拜。而当权者则把自己看作是普度众生的神，心安理得地接受、欣赏个人崇拜。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全智全能的“神”的地位。在他的名字前，总会有几个乃至十几个修饰语。这不仅是别有用心的人作这样肉麻的吹捧，而且可悲的是，不少善良的人从大肆宣传的斯大林的“丰功伟绩”中也真心相信了斯大林是神，是“救世主”。更可悲的是，斯大林默认、纵容，甚至授意他人对自己搞个人崇拜，他自己也在一片颂歌声中飘飘然，认为自己是超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天才，可以为所欲为。在神圣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大搞封建家长式的专制独裁乃至法西斯统治，终于酿成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大清洗”，使千百万党的优秀儿女牺牲在自己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

这是人性的悲剧！

这是苏联党和人民的悲剧：这是国际共运的悲剧！

反对个人迷信也是苏联党和人民强烈呼吁。前苏联的一位老新闻工作者曾这样分析：

快到1956年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最有名的党的工

作者、军事活动家、外交家、作家、科学家平了反，从死者身上撤销了错误的指控，澄清了对他们的野蛮的诬蔑和诽谤。活着的人们要的不只是同情、道歉、恢复名誉和尊严。虽然给他们发还了身份证，发给了经济赔偿，帮助他们安顿了住处，寻找适当的工作，但这还是不够的：要求公开说出那些具有群众性的悲剧的过程。按照赫鲁晓夫的指示，中央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搜集、整理30年代“大清洗”的材料。铁的事实证明，大悲剧的总导演竟然是“列宁的学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当赫鲁晓夫在一遍遍地翻阅这浸透了血和泪、也充满了残酷、卑鄙的材料时，他仿佛听见了冤死者的呼声。他的良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他决心不顾一切在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公开地向全体代表披露“大清洗”悲剧的内幕，这就是震惊全世界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秘密报告通过大量历史资料，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滥用职权、独断专行、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滥杀无辜，并鼓动和实行个人崇拜的严重错误。报告还分析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原因和根源，提出了肃清个人崇拜的措施。

《秘密报告》虽然冗长，达4个多小时，但仍旧被几十次的“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剥掉了把斯大林神化的外衣，敲碎了被神化多年的斯大林偶像；

《秘密报告》给沉闷几十年的苏联社会生活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长期“用引语取代思维”、“用注释代替研究”的萧条荒芜的理论界开始复苏，重新探讨阶级斗争、重新评价利润、价格、市场；科学界也摘掉了套在控制论、信息论上的伪科学的罪名。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欲望再也不被日丹诺夫的文化专制主义所压抑，写出了大批充满真正的人性与人道的优秀作品，如《解冻》、《不是单靠面包》、《日瓦戈医生》。

《秘密报告》还有力地推动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不少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许会在斯大林模式和阴影下生活更长的时间。

赫鲁晓夫来自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深知普通群众生活的艰难。他执政后，不停地深入农村、工厂，了解人民的疾苦。当他看到社会主义建设了40年，人民还在为衣食住行发愁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到内疚。据说，他访问美国时向主人自豪地宣称苏联没有失业者时，一向高傲的美国人则挖苦他说，的确，美国有不少的失业者，但是，主席先生，您要知道，美国的失业者的救济金也比贵国的就业者的收入还高。这句话，无疑使好胜的赫鲁晓夫无地自容，他不止一次他说他的使命就是要给苏联人民以和平与福利。

为了解决粮食不足问题，赫鲁晓夫领导苏联人民大规模开垦荒地，种植玉米，多少个世纪以来的处女地得到了开垦，获得了好的收成。农民的家庭副业也大有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地提高。到1957年，粮食问题基本得以解决。许多副食品，首先是面包、牛奶、肉类的匮乏实际上不存在了。

在过去几十年，苏联的日用品相当匮乏，赫鲁晓夫深切地感到，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是头等大事。下面的几件小事也许会生动地说明这个大问题。

在赫鲁晓夫坚持下生产出了电动剃须刀、电子表（他把一个美国客人赠送给他作为礼物的自己的手表交给了莫斯科第二钟表厂）还有打火机，尽管他自己从不吸烟。再稍晚一些时候则生产了人造毛皮。赫鲁晓夫为“国货”高兴。他故意引人注目地戴上人造毛皮的帽子，他的同事也有同样的帽子，但那是天然毛皮的。他悄悄地把自己的换了，戴上了别人的来开玩笑，主人并未立即觉察出来，于是赫鲁晓夫把帽子归还主人的时候得意地说：“瞧，你甚至没有发现这顶帽子是人造毛皮的。”

合成纤维的生产也是在他的直接监督下进行的。赫鲁晓夫说，没有合成纤维材料生产的发展，穿衣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他开始积极地接见急于赶到莫斯科的西方商人，希望借助他们的技术和设备为自己服务。一位意大利的大企业家马里诺季为苏联建立了第一批人造纤维工厂。就这样，“锦纶防水布”织物进入了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

如今，苏联无数的录音机、电子表的使用者并不知道，是由于谁的努力才开始生产这些东西，但在莫斯科第二钟表厂内至今还有人记得那块电子表是赫鲁晓夫交出来的。有一次，一位老新闻工作者把这块美国商标的旧表带给这家工厂副总经理的时候，他立刻就认识出来了。他说：“我们的生产就

是从这块表开始向新的方向发展的。”

赫鲁晓夫那样热衷于一切新鲜事物，以及由于生产出录音机、手表、刮胡刀而表现出来的孩子般的欢快，证明了他渴望改善人民生活的强烈愿望，体现了一个大国的领袖把人民的疾苦时刻挂在心上的一片真情实意。

斯大林模式的苏联政治体制，僵化、专政、效率低下，已经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为挽救社会主义事业，赫鲁晓夫以大无畏的气魄和超人的胆识在苏联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创造性尝试：

改变干部结构，限制干部特权。赫鲁晓夫力主所有干部都要熟悉科学，要干练、内行、有才能，而不是“没有学识的草包”。执政仅10年，全国区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已有85%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同时他还规定了干部的任期制和换届选举制，各级党、政组织每年更新其中的1/4—1/2，彻底废除了干部的终身制和变相终身制。他还废除了中央委员、州委书记等高级干部的“津贴”；撤销了秘密疗养院和休养所，限制了高干动用公车公款旅游等特权。

扩大地方权限。赫鲁晓夫把原属中央部委的企业70%交给各加盟共和国，批准盟拥有对基建、物资供应、劳动生产率、财政资金、银行信贷、工资、产品价格、运输、劳务标准的决策权。

为发展生产，改组政府机构。赫鲁晓夫主张根据内容和距离产地远近，决定或废或立行政机构。

加强法制，扩大民主，赫鲁晓夫一上台，就撤除了斯大林个人专政的执行工具“内务部办公室”和“特工局”，重建公检法机构，健全法律体系，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权。为人民创造一个气氛和缓、宽松的社会环境。赫鲁晓夫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兄弟党关系的国际事务上体现了他的真知灼见。

赫鲁晓夫坚决地摒弃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僵硬、对抗的外交路线，从世界格局的演变和现实出发，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以及“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思想。他还第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务活动中独创、鲜明阐述了战争可以避免的理论，修正了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理论观点。

赫鲁晓夫承认并清晰阐述了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道路的多洋性，批判了必须遵循单一苏联模式否则就是“修正主义”而要被革出“教门”的看法。不言而喻，他的这种表述意味着肯定包括西欧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党的自主原则，他对南斯拉夫的访问主动和解苏南关系也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这比我们终于承认“铁托比铁还硬”早了二三十年。

赫鲁晓夫的改革使死气沉沉的苏联有了活力，使国际共运走出了低谷，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赫鲁晓夫本人及其改革，但这一点是无法抹杀的。谁也难以料到他的改革功勋却正把他引向死亡的深渊。

引向死亡的功勋

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访问英国。英国首相邱吉尔——一位冷战的鼓吹者在苏联使馆举行的宴会上曾对赫鲁晓夫讲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赫鲁晓夫先生，你想搞大规模的改革，这很好，我只要劝你不要过于匆忙。过深渊不那么容易，不是身子一纵就可以跳过去的，搞不好会掉进深渊。”

赫鲁晓夫及其改革的命运不幸被这位宦海沉浮半个世纪的政治家、精通文学和历史的学者所言中。由于改革的失误，由于他个人的性格，由于反对

者的反对，赫鲁晓夫最后从权力的顶峰上跌进了痛苦的深渊。

对于公开地向党、向人民揭露斯大林的黑暗、平反冤假错案、反对个人迷信和专制，赫鲁晓夫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他认为，如果通过一个不彻底地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决定，不陈述大规模镇压和详细情形，就意味着欺骗党，愧对后人。他说：“以后青年人来了，他们会问，你们当时为什么沉默？我们怎么回答他们？他们会怎样对待我们？只求保护自己，不想负责任？不为同志们的牺牲感到痛心？！”尽管他自己也有污点，也有可能（实际上以后发生了）受到指责，但是他能正视这一切，能胸怀坦白地承认过去。

然而，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斯大林个人迷信和专制的揭露，必然要牵涉到那些曾经是斯大林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而现在仍居高位的人，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他们把揭露斯大林的短处和丑行看作是在他们一生的名誉上抹黑，看作是一笔勾销党和人民所做的一切。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将会受到责难！党有权要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事情负责！我们那时也处在领导地位，即使我们并不知道，那只是活该——我们仍旧要为此受到惩罚的！”

这种害怕受到惩罚的心理，这种对自己的不光彩历史讳莫如深的态度，这种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立场和保护自己特权的习惯，使他们反对向全党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反对进一步清算 30 年代的暴行，从而也反对采取拨乱反正、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措施，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抵制的情绪。

因此，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时，便有人站起来激烈地质问他：从前你是斯大林最信任的人，现在你又来控诉，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吗？赫鲁晓夫的回答是：“我已经醒来了，还能再昏睡吗？”

他的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失调失衡。在改革中，忽而急速推进，草率出击；忽而又全面后退，失去驾驭。朝令暮改，反复无常，使下面的人无所适从，厌倦情绪上升。例如：在一些适宜的地区垦荒种植玉米获得丰收后，赫鲁晓夫头脑发热，指示到处“垦荒”，结果破坏了生态平衡，玉米和草都未能生长出来。为了显示垦荒的巨大成就，曾经让所有的公共食堂免费供应面包和做好的新鲜白菜，农民们可以放开肚皮吃，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例如，在改革过程中被取得的一点成绩冲昏了头脑，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目标，许下了难以兑现的诺言。赫鲁晓夫声称在 1961—1970 年间，苏联在“创造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时，将在社会居民的产品生产方面超过最强大和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到 1980 年，“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尽管他的主观动机是好的，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好心办成了坏事，笑话百出，他别出心裁地把州和区党委按工业和农业分开，变成管工业的党委和管农业的党委。结果呢，是机构重叠、膨胀，办事拖拉，互相扯皮，效率低，官僚主义反而进一步严重了。

虽然赫鲁晓夫为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种种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总的看来，这是他领袖生涯中最薄弱的环节。

在科学文化方面，赫鲁晓夫为数以万计的科学家、理论家、学者平反昭雪，以朋友的身份邀请各界知识分子来家便宴，十分关心教育和科技事业，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文化专制也相对消失了，起初他得到知识分子衷心拥护，但是后来却在某些人的别有用心“劝导”下加上他本人的性格，逐渐地疏远了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不可靠，不能始终如一地以谅解、友谊、宽容的心态，与思想文化界水乳交融，相反，关系越来越紧张，他还喜欢自充内

行，以为自己有了地位也就有了知识，时常对作家、艺术家的作品评头论足。比如，他看不懂抽象派雕塑家涅伊韦斯特内的作品时，竟然粗暴地吼叫道：“这是什么东西，还不统统扔到茅坑里去！”。再如，他对一本他从未翻阅过的小说《生存与命运》，只是听了别人的评论便主观、蛮横地宣布这部小说再有 250 年也不能出版。

就这样，赫鲁晓夫在他下台前几乎跟苏联的知识分子差不多吵翻，完全失去了知识分子对他的支持。

在军队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欠妥做法，遭到了军方的反对。

军队是斯大林生前控制得最严的一个部门，许多斯大林的亲信仍执掌军权，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没有在部队进行必要准备宣传。未取得全体官兵的支持。

为了实现战略重点的转移，赫鲁晓夫提出了全面裁军、削减军费。这本来是对的。可是他操之过急，未能照顾到官兵的情绪和接受程度。例如，一次访问美国，在参观美国的航空母舰时说：“军舰只是在用来进行政府访问的访问时才有用，而从军事观点来看，它们只是不错的火箭靶子。我们今天允许拆毁了许多装备完善的巡洋舰。”当时苏军根据赫鲁晓夫的这一随口而出的指示，真的把许多大型军舰废置一边，变成了一堆破铜烂铁。

为了控制军队，他竟然撤销了曾把他从政治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朱可夫元帅的国防部长的职务，又把斯大林时代几乎全部的老元帅解职，安插自己的亲信。

诸如此类的事引起了部队的反感。

他的某些合理的改革，触犯了当权者或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招致了某些阶层尤其是干部阶层的不满。例如，他所提出的干部轮换制和限制特权，是对苏联以往的终身制的巨大冲击，有利于大量提拔青年干部，防止干部队伍老化，有利于防止个人专权和腐败的滋长。但是，赫鲁晓夫在实施这一改革的过程中，低估了干部阶层因以往实行终身制而形成的顽强惰性，低估了这种惰性所产生的反抗力量，忽视了社会心理承受力问题，贸然推行，结果触犯和得罪了大多数干部。无怪乎赫鲁晓夫无限感慨而又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的党已经老了，许多东西在党内已经根深蒂固，你推不动了……”

伏尔泰说过：“造就政治家的，决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性格。”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赫鲁晓夫的上台与下台与他的性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性格中的优点是天生具有敏锐的头脑，敢作敢为，雷厉风行，有能力，肯实干。缺点是太自信，刚愎自用。“职位”是一个“放大器”，它既可以把担任这一职位的人的优点加以放大，也可以把缺点、弱点加以放大。赫鲁晓夫的性格中的弱点早在基辅和莫斯科就有所暴露，但那时这些弱点还不能影响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决策。当他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他的这些缺点进一步被“放大”、暴露，给他的改革事业和他个人的政治生涯带来了悲剧。

赫鲁晓夫被身边一群既自私又无能的小人包围。这些人想要得到常人得不到的东西，自己又没有特殊的才干，就只有依靠掌握着最高权力的赫鲁晓夫，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相反，那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人，一个有才华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不可能认为领导的话句句正确，当他发现某项政策、决定有可能对事业会造成危害时，他不可能不讲真话，全力劝阻。而刚愎自用的赫鲁晓夫总是本能地讨厌这种有

独立人格、有不同意见的刚直不阿的人，喜欢那些曲意奉承的人。他宁肯轻信献媚者的谎言，也不肯依靠有真知灼见的、对他的改革意图的真正拥护者。例如，作为知识分子的谢皮洛夫虽然是赫鲁晓夫亲自提拔的中央书记和外交部长，但他不因为这一点而曲意奉承，迎合赫鲁晓夫，而是公开批评他的某些错误作法，仗义直言。赫鲁晓夫非但没有认识到谢皮洛夫的这一点可贵品质，反而认为知识分子不可靠，永远不再亲近知识分子。这就使他逐渐失去了广大人民和好干部的支持。

再如，赫鲁晓夫虽然猛烈地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他自己后来欣赏这一套，抵御不了别人对他自己的吹捧。当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用“列宁格勒人的灵魂”、“活着的列宁”等这些最美好、最亲切的话语包围他时，他听到后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感到舒服。这就难免重蹈覆辙。

赫鲁晓夫性格中的这些弱点，人们开始是容忍，而后是不满，最后是提出公开的抗议进而撵其下台。这就是赫鲁晓夫的悲剧所在

“紧急会议”

早在1957年，赫鲁晓夫的改革就遭到党内一批保守势力的反对，是年6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中央主席团的骨干分子也是保守分子像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等就企图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只是由于这时广大党员、群众、绝大部分中央委员和军权在握的朱可夫元帅的坚决反对，赫鲁晓夫才得以化险为夷。

为了维护、巩固自己的权力，全力推行改革，赫鲁晓夫也毫不手软地将反对他的人扣上了“反党集团”的大帽子，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判了他们的“政治死刑”，但是他没有效法斯大林那一套近乎法西斯的做法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的“政敌”，而是给这些人生存下去的条件和权利。正如他在回答反对他的卡冈诺维奇的希望免于死、手下留情的请求时所说：

卡冈诺维奇同志！你的话再一次证实，你们曾经想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你们曾经想把国家拉回到个人迷信时存在的秩序上去，你们想镇压人们。你们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别人。可是你们错了。我们坚定地遵守并将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如果你们能够象全体苏维埃人那样诚实劳动的话，你们将得到工作，你们可以安心地工作和生活。

赫鲁晓夫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仅就这一点而言，他比斯大林高尚、民主得多。

赫鲁晓夫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反省改革，检查自己，反而一意孤行，最终导致众叛亲离，被撵下政治舞台。

1964年4月17日，赫鲁晓夫带着乐观主义的精神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70个生日。中央委员会发表贺词，各报纸杂志纷纷刊登照片，授予赫鲁晓夫“苏联英雄”称号，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会见厅举行了隆重的宴会，列宁格勒大街尽头的金属架上已经高高地竖起了赫鲁晓夫的一幅举手致意的全身肖像。赫鲁晓夫陶醉在全国一片赞颂之中。

1964年9月30日，生性好动的赫鲁晓夫忙里偷闲在米高扬的陪同下离开政治权力中心莫斯科去黑海之滨度假。

他的政治对手趁此加紧策划和实施让赫鲁晓夫下台的事宜。

早在年初，苏共中央和中央主席团的不少人就开始酝酿此事。其中，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伊格那托夫就很活跃。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周游全国，到处游说，组织反赫鲁晓夫联盟，并与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

苏斯洛夫等人勾结串连策划搞掉赫鲁晓夫。当伊格那托夫的贴身警卫戈柳科夫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一绝密情报透露给赫鲁晓夫，并告诉他反对他的人也包括克格勃首脑谢米恰斯内时，赫鲁晓夫还不以为然，认为谢米恰斯内和波德戈尔内是绝对可靠的，不会干这种事的。他太自信，太大意了。

赫鲁晓夫一离开，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和谢列平公开提出要赶赫鲁晓夫下台的问题，并详细地商讨了具体做法：

监视赫鲁晓夫的行动。赫鲁晓夫所有的通讯都被窃听，他以及家属、亲信的行动被跟踪，以防走漏风声，打草惊蛇。

不愧为久经官场的政客，他们吸取了 1957 年的教训。首先，争取了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克格勃首脑谢米恰斯内的支持，防止出现第二个“朱可夫”。密谋者吸取的另一个教训是：搞垮赫鲁晓夫不仅要依靠主席团，而且更要依靠人多势众的中央委员会，以免出现 1957 年的赫鲁晓夫利用中央委员会反败为胜的意外事件的发生。为此，他们趁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将各地的中央委员召集，向个人或小组了解情况，传达让赫鲁晓夫下台的理由、步骤和作法。

控制舆论宣传工具。1957 年 6 月事件中，莫洛托夫等人要把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撤销赫鲁晓夫一切职务的决定在《真理报》刊登、在塔斯社广播，但主管宣传的官员却根本不买帐，拒不执行命令，他们根据上下级关系体制回敬莫洛托夫说：我们不归中央主席团管，而归第一书记及其机关管。要发表、广播你们的决定，请拿出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的亲笔指示来！这一次，密谋者当然变聪明了，他们事先把《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和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哈尔拉莫夫打发到国外出差。《消息报》总编辑、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以及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伊利切夫也被“安排”到他地出差。

另外，所有不大可靠的中央委员、元帅，及赫鲁晓夫的亲信因各种各样的公务而离开了莫斯科，有的是去各地参加五花八门的庆祝活动，有的是到其他地方视察，有的则被关心去医院、疗养院。

10 月 12 日，主席团召开了预备会议。克里姆林宫戒备森严，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主席团会议一致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并决定，将来在中央全会上由苏斯洛夫作中心发言，声讨赫鲁晓夫，内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

一切已准备就绪，只等赫鲁晓夫回来，自投罗网。

10 月 13 日，上午，赫鲁晓夫正在黑海的度假别墅里准备设宴招待法国国务部长帕列夫斯基。这时，赫鲁晓夫接到苏斯洛夫打来的电话，通知他立刻赶回莫斯科，参加中央委员会，讨论农业问题，并声称：“在这个问题上领导层已出现了分歧，不能再拖了。”赫鲁晓夫有点不高兴地说：“这个问题不急于讨论，此外，我在度假，而且我也需要休息。我是第一书记，不开会怎么不征得我的同意！”

苏斯洛夫不软不硬地说：“书记同志，如果您不回来，我们也会在您缺席的情况下照常举行中央全会。这是列宁的个人服从集体的原则。”

隔一会儿，勃列日涅夫也来电话催促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

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只得愤怒地回答说：“那好吧，派飞机来接我。”

派来接赫鲁晓夫的是一架军用飞机，而不是他的私人专机。到机场“迎

接”他们的只有克格勃首脑谢米恰斯内。赫鲁晓夫要求送他回家，但警卫拒绝服从，并告诉他，事先已接到命令，让他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

敏感而又不乏政治权力斗争经验的赫鲁晓夫一下子全明白了：全会将讨论的绝非是苏斯洛夫在电话中所说的“农业问题”。

赫鲁晓夫一走进会场，就感到气氛不正常。出席这次主席团会议的除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会，还有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几位州委书记。列席会议的人都是反对赫鲁晓夫的。

会议由赫鲁晓夫主持。会议开得非常坦率、激烈、粗野。与会者除米高扬一人外，其余的人都向赫鲁晓夫发起了进攻，历数他的罪状。

赫鲁晓夫立即站起来，一一反驳对他的指控，并反过来指责他们。只有米高扬一个人支持他，说：“赫鲁晓夫和他所奉行的和平政策对党来说都是重要的财富。如果不经过周密的考虑就抛弃它，那将是不明智的。”但没有一个附合他的意见。赫鲁晓夫起初还要召开中央全会，幻想能像1957年那样得到中央全会的支持，反败为胜，出现奇迹。然而，今非昔比。过去的支持者已寥寥无几了，他自己已失去人心。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仍然不同意“自愿”退休。激烈的争论毫无结果，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继续进行。

休会后回到家中的赫鲁晓夫感到极端的痛苦。这事来得太突然了，他自己从没想到会被“废黜”，会被抛弃。虽然时至深夜，但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已经明白，任何抗争都无济于事，再也没有回天之力了。他终于打电话给米高扬，凄然而痛苦地告诉他：“既然他们不要我了，那我也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随即，赫鲁晓夫咬牙狠心地写了一份“自愿”辞职书。

第二天上午，会议又开了一个半小时，建议选举勃列日涅夫为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下午，经过充分准备的苏共中央全会召开。会议由米高扬主持，勃列日涅夫致开幕词。赫鲁晓夫也出席了大会，但他始终保持沉默，一言不发。苏斯洛夫在会上作了报告，列举了赫鲁晓夫的六大罪状。第一，搞个人崇拜。证据是仅1963年一年，他的照片上中央报刊多达120次，1964年头9个月，达140次。而斯大林在世时，搞个人崇拜的斯大林一年上报的照片也不过10—15次。第二，自充内行，到处训人。第三，说话随便，态度固执，独断专行。第四，搞乱了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下降。第五，制定和推行了错误的价格政策和畜牧业政策。第六，农业上瞎指挥，反对轮作制，命令解散农庄，成立农场。第七，任人唯亲，等等。一共有25条，可谓罄竹难书。

对于苏斯洛夫的指控，赫鲁晓夫气得满脸通红，双拳紧握，但他克制住了自己。他十分明白，任何辩解只能招致更猛烈的责骂，甚至残酷的迫害。

随后，全会根本未经讨论就一致通过了赫鲁晓夫“因年事已高和健康欠佳离职”的决定。

历史上善于玩弄“宫廷政变”的俄国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又一次成功了。

苏联人对赫鲁晓夫被解职，一些人感到恐惧，不少人幸灾乐祸，大多数人则是漠不关心。然而与国内平静、冷漠相反的是，世界舆论都是一片震惊，尤其是欧洲共产党对此感到遗憾和意外。

千秋功罪后人评说

赫鲁晓夫在被废黜的当天晚上回到家里以后，把公文包扔到拐角里，似

乎很坦然地说：“好吧，就这样，我现在退休了。”是的，赫鲁晓夫“退休”了。然而，在最初的日子，一个从权力顶峰跌下来的人是何等的痛苦，总有一种失落感，没有了前呼后拥，没有了赞美之声，没有了指示训人的权力。赫鲁晓夫一直处于震惊、愤怒、痛心之中，在最初一段时间，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不动，眼含泪水，若有所思。他的小孙子所在学校的校长曾好奇地问这个孩子：“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现在在于什么？”小孩诚实地回答：“校长，我爷爷天天都在哭。”时间，消磨了赫鲁晓夫的痛楚，越来越平静，过着一个普通退休老人的生活：看报、读书、种花、写回忆录，与妻子、儿女、小孙子共享天伦之乐。当有人问起他对当前政策的看法时，他总是淡淡地回答说：“我已经退休了。”他自我感到一生中唯一的遗憾是自己在在职时没能为布哈林、加米涅夫平反昭雪。

然而，不管赫鲁晓夫如何隐居自己，不管苏联官方如何淡化他，但他毕竟曾是一位世界的风云人物，仍然吸引着不少的人来关心他。

1965年，尼克松访问苏联时曾去看望他这位已“退休”的政治对手。虽然由于官方的阻挠未能相见，但是赫鲁晓夫对尼克松能在他“退休”后来看望他表示感谢，他认为这是表示了真正的人的礼节。

1969年4月，赫鲁晓夫75岁生日时，收到了全世界许多著名人物的贺电。法国总统戴高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匈牙利党的领导人卡达尔都向他表示生日的祝贺，对此，赫鲁晓夫感到十分高兴。

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了，终年78岁。当时守候在他身边的有他的妻子尼娜和女儿拉达。

苏联官方在赫鲁晓夫逝世后的第三天发布了一条简短的公告：

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悲痛地宣告，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个人退休金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长期重病后于1971年9月11日逝世，终年78岁。

赫鲁晓夫逝世后，他的家人就被告之，葬礼必须严格按家庭丧事性质办，不得举行任何官方性质的葬仪。“你们要像安葬一个普通公民那样举行安葬仪式。”

1971年9月13日，阴雨绵绵。一代风云人物的葬礼在新圣母公墓举行。

葬礼是简单地。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送了一个大花圈，但没有一个政府或党的领导人参加葬礼。只有他的战友、当年主席团的唯一支持者、现已退休的米高扬送了一个花圈。然而，葬礼又是隆重的。尽管官方没有宣布葬礼的时间和地点，尽管警方设置了警戒线，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人冒雨前来与死者告别。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站在坑边刚挖出的土堆上，用颤抖的声音向前来送葬的人群发表讲话：

“对于我们现在在安葬并为他而哭泣的这个人，我们只想说几句话。”他悲痛地望了望父亲的遗体，继续说道：“我所能说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没有一个人对他漠不关心。爱他的人也有，恨他的人也有，但是谁也不会不再回顾就把他遗忘了。一个有权利作人的人离开了我们。但不幸的是，像这样真正的人太少了……”

在一片哭泣声中，赫鲁晓夫的棺柩慢慢地被他曾热爱的这片沃土掩埋了。

该是盖棺定论的时候了。

当人们冷静、客观地反思历史时，得出的结论也许会更公正、更贴近历史。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苏联共产党，而且对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所作的《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中这样评价：

50年代中期，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变革之风席卷全国，人民振作奋发，变得比较大胆和有信心。在批判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恢复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党和以尼·谢·赫鲁晓夫为首的党的领导表现出不小的勇气。这时开始否弃以前的内外政策模式，曾试图杜绝30—40年代确立的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赋予社会主义更大的活力，强调人道主义的理想和价值，在理论与实践恢复列宁的创造精神。……但是，这个时期也犯了不少主观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给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制造了困难，并在很多方面败坏了进步创举的威信。

前苏联著名史学家费·布尔拉茨基以一个学者的深沉和严肃，指出：“赫鲁晓夫是一位经过种种磨难、在关键时刻能扭转乾坤的出色的政治家。……尽管赫鲁晓夫时代带有明显的过去时代的印痕：矛盾重重，有时效率很低，但仍不愧为精神复兴的时代！……赫鲁晓夫被免职，与其说是由于他的唯意志论，不如说他渴望改革，急于求成。”

前苏联的一位在大清洗年代蒙受不白之冤的妇女在赫鲁晓夫的葬礼上致词，她说：“我以几百万无辜受害者的名义向您深深地鞠躬，请接受我们真诚的谢意。我们知道，您为恢复历史的公正付出了怎样坚毅勇敢的努力。对此我们将永志不忘，我们的子孙也将千秋万代地记住您的恩德。”

我国青年学者秦晓鹰则以史诗般的语言作了这样的富有哲理的评价：“总之，赫鲁晓夫执政10年，是努力使社会主义走出低谷摆脱困境的10年，是一代正直的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出现危机时开始了伟大觉悟的象征。……从人格上讲，赫鲁晓夫在最后政治旅途中，作为历尽沧桑的政治家、作为一位从大劫大难带着惶惑走过来的人，他并没有变得怯懦与油滑，没有那种满腹经纶的世故，也没有让弯下的腰再曲下去，而是重新伸直了脊梁。尽管这么做有骨裂骨折的危险，但他还是挺立起来。虽然这多少有些半是悲壮、半是可爱的味道，但唯此，才显出了他的人格魅力和可爱的晚节。”

当你走近赫鲁晓夫的墓地，就会看见一尊安落在一半是白色一半是黑色的大理石组成的底座上的赫鲁晓夫铜质头像。由此，你不得不惊叹这位受到过墓的主人的不公正批判的雕塑家涅伊韦斯特内的独具匠心：

黑白相间的墓碑
功过参半的人物。

民主橱窗里的硝烟 (1966年2月24日加纳)

悲惨的历史

在非洲地图上，有一个国家的国土版图像是一个直立着的长方形，它那较短的底边沿着大西洋。这便是黄金海岸。

一个多么美丽、诱人的地名，然而正是她的美丽和诱人给她带来了不幸。

15世纪初新航路的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世界探险的进行，既给那些还处于人类文明门槛之外的绝大多数非洲人带去近代西方的文明，同时，更多的是带去了灭顶之灾。

黄金海岸因为她南临几内亚湾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丰富的黄金宝石，引来了无数的贪婪者：淘金人、奴隶贩子、探险家、传教士。因此，她遭受的掠夺也更为残酷，她遭受的灾难也更为深重。

从15世纪开始，远在另一个大陆的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手持近代的火药枪先后在黄金海岸建立殖民地，进行疯狂的劫夺。仅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每年在黄金海岸所掠夺的黄金就相当于当时世界黄金产量的十分之一。

更惨无人道的是，西方殖民者还从事灭绝人性的奴隶贩运，把世代在这里生活的非洲人当作牲口一样贩运到世界各地，获取暴利。也许，今天大多数美国黑人的根就在黄金海岸。肆无忌惮的奴隶贩运，使黄金海岸的文明进一步衰落，人口骤减，几乎到了种族灭绝的地步。

持续600多年的掠夺，黄金海岸已变得满目凄凉。她的人民只是因为像猪、狗一样生活才得以生存、繁衍下来。

苦难深重的黄金海岸人民盼望着—位救民于水火的人间耶稣。

他们等待了几个世纪的救世主终于降临了。

他便是克瓦米·恩克鲁玛。

从穷学生到总统

1909年9月18日，恩克鲁玛出生于黄金海岸的西南端阿克西姆镇附近的恩克罗伏耳村一个阿肯族的金匠家庭。

在小学读了8年书以后，恩克鲁玛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但他并不满足。1927年，他进入阿克拉国立师范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受到了第一个非洲人校长助理克维吉尔·阿克雷博士的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的民族主义启蒙教育。1930年毕业后，几经周折，转到阿米萨诺的天主教神学院教书。

或许，就一般人来讲，通过自己的奋斗，能有这样一个体面的工作也就知足了。但恩克鲁玛决心为民族独立去寻求真理，去更广阔的天地磨练自己。

1935年，恩克鲁玛在亲友的资助下，毅然横渡大西洋，到那时被人们称为“民主”、“自由”的乐土美国留学、深造。

在美7年，他发奋学习，有朝一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1939年他从以一位以解放黑人奴隶而闻名于世的伟人而命名的林肯大学毕业，获文科学士学位，并以优秀的成绩留校当哲学助教。

也就在这一年，他又进入林肯大学的神学院，同时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哲学。1942年获林肯大学神学院学士学位，第二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文科硕士学位。

恩克鲁玛在美国求学期间经受了人间各种艰苦生活的磨难。他经常处于

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工作的十分困难状态。他去费城——美利坚合众国的摇篮，因为没有钱住旅馆，晚上不得不睡在火车站的板凳上。在纽约，为了解决晚上住宿问题，恩克鲁玛用剩下的最后一枚硬币买了一张地铁的车票，整夜来回坐在火车上以度过漫漫长夜。为了便于找到工作，他加入美国的海员工会，在克莱德·朱洛里航运公司的轮船上做索然无味且报酬低下的洗瓶罐工作。

回想起自己的祖国还在殖民者的铁蹄践踏之下，自己的同胞还在痛苦的呻吟、挣扎，他并没有被西化，而是竭力寻求民族独立解放的方案，积极投身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事业。

斯丹达尔有句名言：“伟大的热情能战胜一切。一个人只要强烈地坚持不懈地追求，他就能达到目的。”恩克鲁玛正是凭借着他执着的信念、远大的抱负、极大的热情和不懈的追求，朝着争取黄金海岸乃至整个非洲的独立与解放的伟大目标迈进。

恩克鲁玛在美求学期间，组织了非洲学生协会。有不少的非洲酋长和其他殷实上流阶层的子弟在美求学。这些人可以说是非洲的精英分子。他们有知识、有地位、有影响。他们是非洲未来的希望，是非洲独立和建设的栋梁。虽然他们受的是西方教育，但他们的根仍在非洲。因此，恩克鲁玛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点，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分散在全美各地的非洲留学生组织起来，共同担负起民族独立的重任。

由于恩克鲁玛出色的工作和非凡的组织能力，他被选为该协会的主席，从此，他开始踏入政界，逐渐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

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恩克鲁玛离开了他学习、工作了10年的美国，决定会“日不落帝国”英国——也是黄金海岸的宗主国。他来到英国政治文化中心伦敦，同那里的几乎所有政治团体和非洲学生发生联系。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加入西非学生联合会，后来成为该会的副主席。他被以争取非洲独立为主旨的泛非主义热潮吸引住了。他积极参与筹备并出席了1945年10月在曼彻斯特召开的第五届泛非大会，并担任大会秘书长。恩克鲁玛为大会起草了《告殖民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书》，号召组织群众运动来反对殖民主义。

1947年11月，已有一定知名度的恩克鲁玛被邀请回国，两个月之后便被任命为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总书记。

由于党内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方式与进程上存在严重分歧，1949年6月12日，恩克鲁玛只得从统一大会党分裂出来，另成立了人民大会党，他担任新党的主席。有这样深负众望的领袖，原来统一大会党的党员大部分都加入了人民大会党，重新聚集在恩克鲁玛的旗帜之下。

这个新党是黄金海岸有史以来第一个领导人民争取国家独立的政党。党的纲领不仅旗帜鲜明地要求实现“自治”、“独立”、“统一”和消灭帝国主义以及“废除一切形式的压迫”，而且还要求“改善就业条件”，建立一个“人民将有权作为自由的人民生活和管理他们自己”的新国家。

人民大会党以其激进的纲领和鲜明的旗帜获得了广大劳动者，首先是有工会组织的工人的拥护。

1950年1月，人民大会党号召总罢工，采取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的反抗策略，企图使殖民地政府陷入瘫痪。但结果与30年代的印度一样，遭到了殖民当局的暴力镇压。恩克鲁玛和其他领导人被捕入狱。

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种政治迫害提高了恩克鲁玛和人民

大会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越是被官方压抑、贬低的东西，就越为人民群众所称赞、拥护。这似乎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则。1952年2月举行新议会选举时，人民大会党获得了连自己都感到震惊的胜利。尚在监狱中的恩克鲁玛也因他的知名度而当选。殖民地当局慑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和顺应战后历史发展的潮流，释放了恩克鲁玛及其同僚，并指令他们担任新政府的重要职位。1952年3月5日，恩克鲁玛担任内阁总理。1954和1956年的议会选举中，人民大会党赢得了70%的席位，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1957年3月6日，黄金海岸在经历了600多年的殖民统治后终于取得了独立。他们抛弃了象征着屈辱和灾难、为西方殖民者命名的黄金海岸，而定国名为加纳。

1960年7月1日，加纳共和国成立，恩克鲁玛任总统兼总理。此外，他还是人民大会党的终身主席和总书记，有权取消特别法庭的判决，有权任命和罢免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开始运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影响去实践他的理想——恩克鲁玛主义。正如他自己经常所说的：“你要首先取得政治王国，其余一切便迎刃而解。”

什么是恩克鲁玛主义

恩克鲁玛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非洲国家的应用。也许，原人民大会党的新闻广播部长阿曼奎赫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讲更有代表性：

“恩克鲁玛主义”就是以泛非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哲学，而恩克鲁玛本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强的马克

思哲学的代表者。“恩克鲁玛”把科学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克服作为每一个人生活合法权利的粮食、住宅、衣服和基本生活资料的不公道分配的原理。“恩克鲁玛主义”是把重点放在这样一个科学前提上的，即社会主义不是教条，社会主义的目的只有一个，但是，达到目的手段则由于现产的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恩克鲁玛主义”保卫一切享有不受外国控制和干涉的自由权利，而且它的目的是彻底消灭帝国主义。“恩克鲁玛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并且深信有充分力量来消除资本主义，同时还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特点。强调非洲的特点，作为泛非主义的原则之一，并不是种族的沙文主义，而是用现实的态度来看待达到人类平等的信念……。

这位部长先生的概括性的说明，从形式上看，可以说大体上反映了“恩克鲁玛主义”所具有的外貌。至于“恩克鲁玛主义”到底是不是正宗或者说科学的社会主义，我们无须去评说，因为既然允许自己具有什么特色，当然就应该允许别的国家和政党也有结合自己国情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恩克鲁玛的治国方针是按他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来制定的。二是，在加纳这个部落势力还相当强大的国家，毕竟建立了共和国，毕竟建立了一种非洲的民主模式。正是因为这一点，加纳被西方世界称为非洲的“民主橱窗”。

走向深渊

国家的独立，共和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加纳从此走上了和平、稳定、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相反，从它实行“恩克鲁玛主义”的那天起，人民大会党和它的领袖恩克鲁玛就在不自觉地为自己挖掘坟墓，走向死亡的深渊。

人民大会党在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赶走殖民者的同时，也打败了一切反对党独霸政治舞台，终于成为加纳的唯一合法的政党，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共和国。

那么，国家政权就是否掌握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党的手中呢？

人民大会党是一个拥有“两百万党员”的政党。这在小小的加纳，无疑是个庞然大物，似乎没有任何政治力量与它抗衡。但是，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党的骨干，从中央到地方，基本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过去的年代，争取独立的民族意识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现在，他们中的不少人已习惯于“西方的生活方式”，从价值观念到行为规范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恩克鲁玛为了壮大党的力量，扩大其势力，煞费苦心，他鼓吹党应向所有的人开放，不问其信仰如何。他亲自发指示，把工会、农民联合会、青年和妇女组织都合并到党内来，宣称自己的党是如何壮大、发展。这是何等的自欺欺人？这样的一个政党，确切地说一群乌合之众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起什么“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恰恰相反，是加速党的灭亡。

由于什么人都可以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大会党的党员，在党的上层和基层领导中就很快出现了贪污腐化、投机倒把、追逐名利、任人唯亲和目无法律的现象。

早在1961年，恩克鲁玛就撤换了6名贪污腐败的部长，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格贝德马。他有一座带花园的豪华住宅、两辆美国汽车、五座别墅、商店、餐厅、汽油库等等。内务部长埃杜西在国外的6个城市有存款。他的妻子去伦敦休假、观光，向一个古董商买了一张纯金的床。贪污腐化就像瘟疫一样在加纳的党政机关中漫延而无法控制。加纳和世界上不少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难以避免这样的灾难。

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争权夺利在加纳更是司空见惯。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塔威亚·阿达马菲奥。

阿达马菲奥是一个加族人。他善于雄辩，是位天才的演说家和野心勃勃的人。1960年当他还在伦敦学习法律时就被恩克鲁玛召回加纳委以人民大会党的总书记。在位期间，他竭力笼络各方“人才”，工人大会的特蒂加、农民联合会的阿皮亚一夸丹，都成为他的密友。60年代中期，他们几位不仅都是人民大会党的中央委员，而且都做了“特命部长”，后来，阿达马菲奥受任总统办公厅的部长职务，掌握了党政实际大权。他们以党内激进分子的面目出现，猛烈地挟击保守派——大批忠诚于恩克鲁玛的老资格的部长和国民议会议员。阿达马菲奥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一打一拉。他处心积虑地将恩克鲁玛长期以来的主要副手博西奥和柏伯迪马降级打入冷宫，排挤和打击反对派，同时他又广罗党羽，建立起一个以加族为主的派系来支持他自己的领导。只是由于与1962年中期暗杀恩克鲁玛未遂的事件上有牵连而被捕。从此以后，恩克鲁玛对任何一位有才干的副手备存戒心，用而不信。

恩克鲁玛本人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越来越脱离人民，他甚至将个人崇拜当作团结的法宝而在全国大搞个人迷信。

1965年也就是他被废黜的前一年，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公告说：党的组织力量和宗旨这一坚如磐石的基础，可以最适当地用党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创立者本人的品格两者的融合来表达。……所有党的干部都一致认为需要用个人崇拜来表达人民大会党的意识形态，因为每一个同志都体会到：在我们的情况下，人民需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物，作为引导他们前进的一盏明灯。

阿达马菲奥这样的野心家正是利用恩克鲁玛欣赏个人崇拜而步步高升的。他曾多次肉麻地吹捧恩克鲁玛：“我们必须把奥萨吉也夫（即胜利的领袖，指恩克鲁玛——引者）当作耶稣基督和救世主来看待。”

这样一个腐败的没有战斗力的政党，这样一个日益脱离群众和神秘化的领袖，当真正考验来临时，就顷刻瓦解了。

一个社会的稳定、一个政权的维持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取决于经济。

恩克鲁玛政府在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几十家工厂的兴建，大规模国营农场的建立，几千所中小学的开办，但是，从整体上看，恩克鲁玛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

——恩克鲁玛政府从不切实际的主观空想出发，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贪多求大，不顾国力，盲目地发展工业。因为资金匮乏，不得不靠举借外债和搜刮民财。政府要求人民节衣缩食，强制他们捐助国家建设。结果是债台高筑、怨声载道，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下降。

——“宏伟”的发展计划和政府庞大机构的开支，耗尽了外汇储备，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象脱缰的野马无法遏制。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效益低下，经营亏本，失业人数激进。工人不得不起来罢工，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

——忽视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农业。农业生产仍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即使已“机械化”的地区也正在衰退。因为政府几度压低主要农产品的价格。经营农业，收不足支。生产越多损失越重。

加纳人民的生活水准在降低，甚至不如殖民地时期。

就恩克鲁玛个人而言，他真诚地希望鼓动起群众的热情，并依靠他们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加纳，但是其他的党政领导人的腐败堕落，使他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

于是，群众和领导阶层之间就产生了“信任危机”。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使得所有的漂亮口号和理想的纲领都失去了国内人民的信任。热情消失了，信誉破坏了，群众处于被动状态，根本谈不上为未来而自愿牺牲和勤奋劳动，因为他们耳闻目睹的是贫穷，所有的重担和苦难都落在普通人身上，他们看不见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看不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意义。

当最高统治层内部矛盾尖锐化，政府中贪污舞弊和各种不公正现象普遍化，经济产生危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人民对最高统治层和政府表现出强烈怨愤情绪，产生大规模抗议活动时，这个社会就处于五级社会病状态。

60年代的加纳正处于这样一个危急社会之中。

恩克鲁玛与军队的矛盾与冲突，直接加速了他的政权的垮

谁能容忍他这样做？

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什么样的体制下，军队总是政权最主要的支柱。

加纳独立时，大约有4000人的军队。按传统，大约60%的士兵是从落后部族中募集的，而军官一般都是黄金海岸殖民地军队原来的中士，他们都被派往英国学习过，或者是在英国人开办的军事学院如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和蒙斯以及伊顿·霍尔中等军官学校接受英国人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因此，亲英思想就必然会渗入到加纳的军官阶层和普通士兵中。他们按英国社会的标准和根据英国军官的尺度来判断自己国家的事务，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当然是格格不入的。

恩克鲁玛为了希望保持军队的忠诚、军官的忠心，他可谓用心良苦：

——提高军人的物质待遇。一个普通士兵的薪水超过国家平均工资的一倍。至于一般军官，其生活条件就更为优越。军费开支从立国之初的 4% 增加到 1966 年的 8%。这在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贫穷国家的确是不容易的。

——虽然加纳是一党制，但是在军队里没有建立鉴定政治忠诚的制度，也没有检查政治上是否可靠的考核制度。恩克鲁玛天真地认为，如果对军队实行带刺激性的“可靠性审查”会触怒军人。所以恩克鲁玛不得不保留原来那些按英国方式培养的军官。

但是，恩克鲁玛的优惠政策并没有取得成功。对于他来说，军队仍然是离心离德的。

1961 年，加纳派一支武装部队到刚果参加联合国的部队作战，指挥加纳这支部队的是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他极力反对恩克鲁玛所奉行的反帝反殖、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指望一个外国军官去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恩克鲁玛意识到必须拥有一支忠于党、忠于他以及他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的军队时，已经来不及了。

1961 年恩克鲁玛决定派送军事学校的学生到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去学习，希望他们在社会主义的教育下学成归来，逐步取代军队中的亲英和反党的军官。这一举措就触动了军官们敏感的神经，与恩克鲁玛的分歧尖锐化了。

不久，恩克鲁玛解除了亚历山大和其他几个英国军官在加纳军队中担任的职务。但是，代替亚历山大的是他的亲信安克拉将军。安克拉生于 1915 年，加族人，中学毕业后当了一名教员，后来他投笔从戎，经历了从行伍列兵晋升到将军的历程，深得亚历山大的赏识，称赞他是加纳最能打仗和最顽强的士兵，是一名非凡坚决和果断的指挥官。

1965 年，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恩克鲁玛决定削减军队所需要的拨款。这就引起了老军官的不满。

当恩克鲁玛察觉到安克拉也不可靠时，又解决了他的职务，并进一步设想加强党对军队的政治监督和引导、教育，同时逐步解散职业性的军队，用民兵来代替。这无疑捅了个“马蜂窝。”政变首领之一科托卡上校后来宣称：“恩克鲁玛组织民兵，谁能容忍他这样做？”

1966 年 2 月 24 日，当恩克鲁玛访问中国时，国内乘机发生军事政变，“民主橱窗”里硝烟滚滚。

政变的直接组织者是第二步兵旅的旅长科托卡上校。科托卡带领自己的部队从兵营开往首都，于早上 5 点到达。整个战斗参加的人数最多大约 1500 人，20 辆坦克。参与策划这次政变的还有阿弗里法上校，警察局长哈里立。到上午 10 点，守卫恩克鲁玛官邸的私人近卫军基本上已被击溃。下午 6 点，科托卡上校通过阿克拉在中央电台宣布克瓦米·恩克鲁玛政权和人民大会党已被推翻。政权由军人机构——民族解放委员会接管，领导人是被恩克鲁玛赶出军界后又担任非重要文官职务的安克拉。

信任哈里立的恩克鲁玛在北京得知政变的消息后还说：“啊，哈里立一定会把一切镇压下去的。”

他估计错了，太自信。他的亲信正是他的敌人。

人们不禁要问：在危急时刻，党哪里去了？他们难道会袖手旁观吗？群众哪里去了？他们愿意抛弃社会主义吗？

拥有两百万党员的大党在需要他们挺身而出，为保卫自己的政权流血牺牲时，他们却对政变采取了容忍甚至欢迎的态度，国家和党的机关大部分领导人都立刻承认新政权。这样一个庞大队伍的政党顷刻就土崩瓦解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恩克鲁玛当选为总统时、当他过去出现在群众中时，他受到了手持鲜花和标语的群众的热烈欢迎。今天，当恩克鲁玛被废黜，当政变者上台时，又是这些群众，又是同样手持鲜花、标语，又是同样的热烈走上街头兴高采烈地为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举行葬礼。

党员、群众、军队，谁也没有反抗。政变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支持和拥护，至少是默认和容忍。

这难道不值得人们去深思么？

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恩克鲁玛的被推翻引起了各方面的评论，人们似乎想从中找出恩克鲁玛失败的真正原因和惨痛的教训。

以极左的观点著称的《游击队》杂志曾对加纳的政变评论说：

事件发生的决定性原因，是加纳的资产阶级没有消灭。在唯一的一个党内，他们有很大的势力，他们代表加纳的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经济权力，而且利用这一点保住了受恩克鲁玛限制的政治权力，但暂时没有反击……。恩克鲁玛发展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不必进行强制的改革，不要先锋队的党……不用发挥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巨大作用，不必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利……，而且还给资产阶级过多的自由，恩克鲁玛为自己创造了垮台的条件……。因为恩克鲁玛不赞成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利图摆脱他的统治。

英国工党党员勃朗库埃在《论坛》周刊上写道：

恩克鲁玛的垮台是因为最后两年他脱离了人民，甚至脱离了他的党。他的政策上的错误在于他未能把人民群众引导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埃及进步杂志《先锋》周刊评论说：

（在加纳），“国家机器依然操纵在反革命分子和殖民主义者的傀儡手里，殖民主义者培养这些人就是为了在加纳独立之后充当他的代理人。

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季贾尼·巴比克 1966 年 10 月在开罗的讨论会上发言说：

处于慌乱中的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是抗拒不了国家政变发动者的。对于他们来说，必须要有一个革命的先锋党，恩克鲁玛企图把人民大会党变成先锋党的设想没有成功。在党的建设方面和工作中存在着很多缺点。当考验来临的时候，甚至于党员本身都不团结，没有起来保卫革命。

另一位进步人士柳特费·霍利在他的《和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指出这次政变必然发生的道理：

党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党的领导人只是从自己的地位出发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以党和干部对人民群众的实际影响为立足点，事实上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力量的源泉。党的影响主要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中，它未能深入到广大的农民群众中去教育和发动群众，使他们投身到为真正的革命利益服务。……表面上有一个庞大的革命机构，但内部空虚和缺乏效率，它没有实际效能，脱离群众，经不起真正的考验。

恩克鲁玛在被推翻后，痛定思痛。他说：“只要新政府取得政权，不论是和平的还是武装的革命，都应该撤换所有旧政权的主要官员。我个人的经

验教训教育了我，忽视这个问题就会给政府造成致命的结果。”

不论这些对政变发生原因的分析 and 评论是否全面、衷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在加纳只进行了不到 6 年的时间便以失败而告终；人民群众从热情地拥护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到毅然抛弃，证明了一个古老的命题：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被推翻的恩克鲁玛无法回到自己亲手缔造的共和国，他只能流亡国外，怀着十分惆怅和悲伤的心情于 1972 年病逝于几内亚。

这样一位在非洲实践社会主义的政治家、加纳独立的领袖、“民主橱窗”的制造者就这样悄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亲王殿下，您被废黜了”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

访问变成了流亡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在“元老政治家”宾努亲王夫妇的陪同下，在法国里维埃拉的格拉斯静心疗养了60多天之后正启程乘飞机访问莫斯科。

“亲王殿下，您今天不应该动身。今天是1970年3月13日。既是星期五又是13号。”在去机场的路上，西哈努克的一位助手半开玩笑地说了这句话。

西哈努克虽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但并不迷信。然而，在西方人看来，这毕竟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

飞机徐徐降落在莫斯科机场。在欢迎仪式之后，波德戈尔内主席却一反常规，迫不及待地跟西哈努克说：

“如果您愿意，可以在莫斯科休息一夜，然后就在第二天早上飞往金边。我们已准备好了一架飞机。西哈努克亲王，我们信任您。您确实是贵国人民不可缺少的领袖。但重要的是，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您得直接飞回柬埔寨去掌管国家事务，不要让它落入朗诺和施里玛达手中。您必须采取断然有力的措施，保护自己的权力，挫败他们的阴谋，不让柬埔寨逐渐陷入被美国人接管的局面。我们苏联共产党愿意为您和您的祖国提供所需的一切，为世界人民的解放和独立做出贡献。”

不知是因为西哈努克太自信还是因为不相信苏联这位社会主义老大哥，或者有其他难以相告的原因，总之，他没有立即返回金边，而是按照事先的安排，在结束了对莫斯科的5天政治访问后，于18日下午离开莫斯科动身去北京访问。

在乘汽车去机场的途中，柯西金总理转身面对西哈努克说：“亲王殿下，您的国民议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

西哈努克一听震惊起来，好久才平静下来，似乎早有预感，回答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已被废黜了吗？金边发生了政变！”

“小羊羔”变成了“铁老虎”

1941年4月25日，西哈努克的祖父西索瓦·莫尼旺国王逝世的第二天，当时年仅18岁，还是一个在西贡的莎士克鲁—洛巴特公立学校专攻修辞学的学生西哈努克出乎意料地被殖民者法国人挑选出来继承王位。按照柬埔寨长子继承王位的传统和规定，继承王位的应该是西哈努克的父亲诺罗敦·苏拉玛里特亲王或者他的伯父西索瓦·莫尼勒亲王。

法国为什么偏要选择西哈努克呢？就因为西哈努克的父亲是诺罗敦家族的成员而他母亲则是西索瓦家族的成员，西哈努克作为这两大皇室家族的共同成员就可能为双方接受。这样一来这两个皇室家族本已存在的纷争就会和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西哈努克很年轻，而且以有些腼腆和好学而闻名。法国人挑选王位继承人的出发点当然不是去寻找一位真正能担负起国家社稷的国王，一位铁腕政治家，而是去造就一位温顺、听话、不谙世事傀儡皇帝，一只“小羊羔”。

此时的西哈努克从表面看来似乎符合法国人的口味。毕竟只有18岁，阅历不深；同时，西哈努克对政治也不感兴趣，甚至把政治和权力看成是一种

可怕的东西，他生来就是个艺术家，喜欢从事戏剧、电影、音乐和文学。当别的皇室成员的子弟在国内外的军校深造锻炼为将来取得权力和高官厚禄做准备时，西哈努克却选择了只有文人雅士才学的修辞学。

西哈努克即位后，似乎热衷于那些政治家所不耻也有失身份的事。例如，他创作歌曲，指挥爵士乐团。他拍摄可笑的电影，并在电影中充当男主角，由他的夫人充当女主角。

西哈努克的私生活也更让人觉得他是一位轻浮的子弟，荒淫的君主。在1941年至1955年当国王期间，就有了5位年轻美貌、倾国倾城的宠妃。当有的记者向他提出这样那样的私生活方面的问题时，西哈努克竟然十分坦然地回答：“我的祖父有60个妃子，我的曾祖父有300个妃子。与他们相比，我有5个妃子不算多。假若我效仿他们的话，我不会感到遗憾和难堪。记者先生，假如你现在是我，也许，不，你的妃子一定比我多！”

谁会把这样一位风流国王同领导柬埔寨人民取得独立的政治家联系在一起呢？

在年轻的西哈努克国王的领导下，经过近10年的努力，柬埔寨于1953年11月9日脱离法国而宣告独立，并进而于次年在日内瓦协议中得到正式的确认和国际社会的承认。因为西哈努克铭记他母亲的教诲：“在法国或其它列强的胯下，当国王是一种耻辱。”

的确，到此时，人们对西哈努克这位而立之年的君主刮目相看了，在国内人的眼中，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政治家，一位受人爱戴的君主，一位让法国殖民者失望的“铁老虎”。

然而，更令世人举目、震惊的所做所为还在后头。

1955年3月2日，西哈努克亲自的把一封信送到金边广播电台，并附了以下的亲笔指示：

中午时刻把信拆开：把信内装的录音带在广播中午新闻时予以播放。

这便是圣旨，不得违抗。

录音带在缓缓地转动，一个惊人的消息通过电台和广播传遍了国内外。

“我亲爱的臣民们：

我决定我决不谋求也不再接受王位。

当我为了反对外国控制而同各大国打交道时，我拥有王室权威是很重要的……我需要拥有作为我国合法的、有资格的代表称号……要是不以国王的名义讲话，那么他们总会说我并不代表整个柬埔寨讲话，今天，情况不一样了，我们的祖国已经获得了独立，君主的使命已经完成。

要是我继续当国王，有悖于民主、共和的世界潮流，成为社会进步的落伍者。

要是我继续当国王，在我的王宫里深居简出……那末我永远也无法了解真实情况，永远也不会知道人民遭受到哪些虐待，永远也不会成为人民亲密的朋友。

主动逊位，把君主制度抛弃掉，沿着其他道路来领导这个国家，帮助她和平地、不流血地完成她自己所选择的革命。

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定放弃王位、抛弃一切豪华盛典的理由，以便把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人民并为人民谋福利。”

西哈努克的逊位声明震惊了朝野上下。忠诚者扼腕叹息；反对派兴高采烈。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西哈努克此举之目的在于向人民表明，世界上并不

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圣权的东西，谁都不是由上天派来统治人民的。他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来取得权力而不是靠世袭。

在发表逊位声明讲话后一个月左右，西哈努克就已着手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其目的是通过这个新的政治组织在普选中获得政权，“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的柬埔寨，恢复我们祖国过去的伟绩。”

奇迹出现了。一大批真诚的拥护者和居心叵测的投机者都聚集在西哈努克的旗帜之下。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下，于1955年9月11日举行的选举中，民社同盟获得了总选票的83%，赢得了91席的全部，组成了以西哈努克亲王本人为首相的王国政府。

此时的西哈努克已作为一个拥有国民议会全部席位的政治组织的首相，又重新站在柬埔寨政治舞台的前列。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领导人。

1960年4月3日，接替儿子王位的66岁的老国王苏拉玛里特去逝。这一个民主意识低下、封建传统悠久的国度不可一日无君。于是西哈努克的母亲西索瓦·哥沙曼王太后继位担任象征性的君主。西哈努克亲王被由民社同盟控制的国民议会任命为拥有“君主权力和特权”、其“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中国的一位哲人说过，一国家，一政党、一集团，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西哈努克的政治命运似乎印证了这位哲人的耐人寻味的论断。

手足无情，恩将仇报

60年代末，柬埔寨国内外局势动荡不安。领导层在一系列大政方针上的意见分歧逐渐发展成为权力的争夺，而变得日益表面化和白热化。尤其是几个核心实权人物与西哈努克发生了严重的对抗，伺机发动政变。

这些核心实权人物是：

71

西索瓦·施里玛达，生于1914年，皇室成员，西哈努克的表兄，西哈努克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个聪明人，是个阴险毒辣、不守信义、嫉妒成性的恶棍，但是个聪明人。”官场上的权术他运用得得心应手。正是凭借着家庭背景和个人的钻营，在柬埔寨独立不久，他即被任命为国防大臣兼外交大臣，后任国防及教育大臣。再后他觉得当外交官很风光气派，又有丰厚的报酬，于是又当过驻华、驻日大使。而此时的西哈努克欢天喜地，顺水推舟，同意了施里玛达的要求，把他打发到国外，免得在国内碍手碍脚，制造事端。1969年8月，施里玛达被任命为副首相，兼任内政、安全、国民教育与宗教事务大臣，权倾朝野。

聪明才智一旦与卑鄙相结合，这便是人类的不幸。施里玛达和西哈努克曾为亲戚，但因家族的旧怨、权力的争夺，两人积怨根深，早已没有了什么手足之情、兄弟之谊，他是政变的主要策划者。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朗诺，1913年生。在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与西哈努克风雨同舟、并肩战斗，深得西哈努克的赏识。柬埔寨独立后，西哈努克把他当成自己最亲信的人而委以重任。所以，他官运通亨，青云直上。1955年任柬埔寨陆军总参谋长，1960年任国防大臣，1966年至1967年以及1969年先后两次担任首相。就是这样一位深为西哈努克信赖的人，对西哈努克的知遇之恩非但不报，而且发动政变，企图置西哈努克于死地。

朗农，朗诺之弟，陆军上校，柬埔寨武装力量中最强大的陆军的直接指挥官，以有“铁腕”手段著称。在整个政变过程中，他是最主要的帮凶和打手。

山玉成，南越裔柬埔寨人。1937年任佛教协会秘书长。二战期间担任日本在金边建立的傀儡政府首相。1945年法军重新占领柬埔寨后以叛国罪被捕并判处死刑。由于西哈努克亲自干预得免一死，但被流放在外。后来获准返回柬埔寨。山玉成不报救命之恩，利用自己的宗教势力发动了一场名为反法实为反西哈努克的右派武装运动。失败后逃到泰国。几年后以自由高棉首领身份重新出现。自由高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组织，以泰国和南越为基地，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以推翻西哈努克为目标。

西哈努克的权力危机是从1969年8月开始的。

1969年8月，柬埔寨组成了以朗诺、施里玛达为首的新内阁。这个内阁代表了柬埔寨的买办、封建地主以及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朗诺一上任就宣布不再把私人工业收归国有而且还要把一些国营企业改归私营。经济部长屋金安和商业部长波隆托提出了把进出口贸易改为私营的措施，结束了国家对生产烈性酒、饮料、药品和其他商品的垄断，并且允许私人银行和外国银行进行经营活动。一批政府官员在非国有化的政策掩盖下，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甚至与不法分子勾结起来。由吴松山这个华人的败类创办的金边银行大量贿赂施里玛达等高级官员，吸收巨额资金，然后携带一千多万美元潜逃，致使柬埔寨这个本已十分贫穷的国家蒙受巨大损失。

西哈努克极力反对这种例行逆施的政策，在亲王的呼吁和反对下，朗诺、施里玛达的政策未能付诸实行。

在对外政策上，西哈努克奉行独立自主的中立外交政策，发展包括中国、越南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决不以国家的主权来换取美援，尽管他们十分需要。同时，他也与西方大国如美国、法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以朗诺、施里玛达为首的反派则主张全部接受美援，哪怕以牺牲国家主权为条件；积极反共亲美，尤其反对同中国、越南发展友好关系。

政见的分歧，最终演变成为血腥的决斗。朗诺、施里玛达一伙进一步勾结起来，密谋策划政变，推翻西哈努克。

密谋，在悄悄地进行

1969年9月1日，一辆黑色的高级防弹轿车沿柬埔寨边界附近的二号公路急速行驶，然后在南越的靖边村悄然停下，走出一位身材肥胖、迈着军人步伐的人，朝几间吊脚楼走去。这个非同寻常的人是谁？又为什么驱车来到这柬埔寨边界的小村？

此人正是朗诺。那几间吊脚楼却是山玉成的野战司令部。朗诺此行目的之一就是寻求山玉成的自由高棉武装的支持。此时的山玉成已是重兵在手，一共有8个营的由美国人训练过的武装，还有专以杀人、吃人肝为乐事的一伙土匪——KKK突击队。

朗诺屈尊光临，使山玉成的复仇之火变得更加炽热。在推翻西哈努克的问题上，双方一拍即合。

“尊敬的首相阁下，我的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都是美国货，只要您一声令下，我就会踏平金边。”山玉成拍着胸脯狂妄地说，“不过……”

说到这，山玉成故意停顿了下来，看看这位草包首相作何反应。

朗诺倒也十分爽快，“有条件就提，只要成功，一切都好说。”

山玉成会意地笑了：“将军不愧为军中豪杰。老实告诉您，我们的行动得征得美国朋友的同意。我想他们一定支持的，否则我山玉成哪能有今天，哪会有存在的价值。这第二点嘛……”

山玉成顺手从用子弹箱垒成的桌上拿起一根地道的美国雪茄，掏出美国产的精巧的打火机点燃了雪茄，猛吸一口，随着一缕清清的青烟从他满口黑牙的嘴里吐出，山玉成得意地朝朗诺一笑，接着说道：

“这第二点吗？就明说吧，免得以后不快。先小人后君子，大功告成，您可得论功行赏。国防大臣或总理都可以，不可过河拆桥哦，首相阁下！我的美国朋友是不会答应的。我手中的家伙可不信佛，更不是吃素的。”

朗诺一听，觉得山玉成太狡猾，要价太高。不过考虑到必须借助他的力量，便答应了。

“我们一定满足您的要求。”朗诺用手指着站在他身后的几名穿便衣的军人说：“这是我的几位特使，有什么事，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取得联系，交换情报。”

“拿酒来！”

山玉成和朗诺十分高兴地从小侍的银托盘里端起法国白兰地。

“为我们的成功，干杯！”

随着两个杯子的碰击，一桩罪恶的交易完成了。

此后，一件件“偶然”的事不断发生；一套套政变方案逐渐形成实施。

1969年9月3日，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一位真正的反帝爱国的革命家胡志明主席逝世。西哈努克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去河内参加他的葬礼。

在机场送行的施里玛达在西哈努克的专机刚起飞时就转过身对他的追随者——其中当然包括朗诺——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越盟和越共的军队非法占领我国神圣的领土的时刻，“卖国贼”西哈努克却飞去参加他们的头子的葬礼，而且竟敢下令在金边举行正式的仪式悼念这位该死的老头子。我们此时动手，一定会得到支持。西哈努克我量他也不敢回到柬埔寨来。”

这个时候的朗诺思考了好一会，才说：

“我们准备尚不充分，我不同意贸然行事。弄不好，我们自己会成为阶下囚。我想，还是周密、谨慎为好。”

朗诺此次没有发动政变的原因当然主要是准备不充分。还有一个原因是，朗诺是极其迷信的。就连擤鼻涕之前，他都求签问卜，看星相是否吉利。这次，他的妻子刚死不久，他正忙于按佛教的规矩来办丧事。他知道没有一个圣人会同意他中断妻子的丧事来发动政变。因此，他想等到一个更吉利的时间、更合适的时机。

也许，正是这一偶然的因素，才使政变推迟了半年多。

在朗诺的亡妻的葬仪结束后。朗诺突然提出他必须到法国去养伤。

于是小病大养的朗诺便住进了巴黎郊区塞纳河畔纳依的美国医院里。

真是奇怪的巧合。有几个身穿病号服的美国“病人”也和朗诺同时住进了这家医院。从举止和神态看，这几位“病人”似乎没有任何生病或受伤的迹象。

原来，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病人”，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顾问”，制造政变的专家，他们受命来为朗诺发动政变出谋划策，充当军师。

有了“专家”们的锦囊妙计，朗诺每天从这个伪装得很巧妙的大本营用电话向远在金边的施里玛达和其他同谋者发出指示。

于是，一件件“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了：

——以泰国为基地的自由高棉军中发生了大规模的“开小差逃跑”事件。这是一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武装，由山玉成指挥的军队，起先是个别人，接着是成排的以至于到最后是成连的和更大单位的部队越过边界向柬埔寨投诚。声称他们是“出于爱国的理由而逃跑”。柬埔寨的军方认为这是政治宣传的伟大胜利，把这些“投降”的部队按原编制原封不动地驻扎在马德望省。其中的“优秀”者还被吸收到金边卫戍部队和宪兵里来。

——对国家元首实行消息封锁。朗诺去法国“治病”，作为他的副手——施里玛达就是理所当然的代理首相。他通知各大臣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禁止他们直接送任何文件给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切文件都得先送到首相办公室，而国家元首只能收到代理首相认为可以给他看的东西。理由是，国家元首的身体健康是柬埔寨人民的伟大幸福，亲王殿下日理万机，首相应该为他分忧。任何人违犯这一指令就要受到“严厉的处分”。

多么堂而皇之的理由！

——一家以“民主、自由、公正”为宗旨的报纸，连篇累牍发表文章，猛烈抨击西哈努克的“独裁”，指责他已经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党专政”，“扼杀了柬埔寨的民主”，揭露君主的腐败，渲染西哈努克的私生活。把西哈努克描绘成一个野蛮的独裁者，一个荒淫无度的纨绔子弟，一个无能的统治者，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叛国者。一时间谣言四起，颇能迷惑一批不明真相的群众。

正当国家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关键时刻，西哈努克夫妇不可思议地于1970年1月7日在宾努夫妇陪同下前往法国疗养。

天赐良机！

1970年2月18日，朗诺返回金边。一下飞机，便与施里玛达召开了一系列高级秘密会议，进一步具体策划政变的计划。

密谋者为了避免被西哈努克的秘密警察发现，他们不断地变换会议地点，有时在朗诺和施里玛达的家中；有时是在行驶中的小汽车里。

经过一系列的密谋策划，政变的计划已经形成：

第一步，让教育部长巧索康负责组织安排反对越共的示威游行。先是在受到共产党人渗入的柴桢省，随后扩展到首都金边。借助民众的民族情绪和对共产主义的误解，制造动乱。

第二步，加强金边的卫戍力量。把从“自由高棉”“投诚”过来的骨干分子和完全听命于朗农上校指挥的陆军调入金边，集结待命。

第三步，肃清军队、警察中的西哈努克的支持者，使西哈努克及其追随者失去反抗的能力。

第四步，以“民主”的形式，要求国会大会投票废黜西哈努克。

第五步，取得美国道义和物力上的支持，赢得国际社会对政变政府的承认。

真不愧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制造政变专家的得意门生。政变计划制订得如此严密，简直是万无一失，可谓政变计划的上乘之作。

与此同时，朗诺再次与山玉成取得了联系。山玉成答应为他提供物质援助。他的自由高棉和 kkk 突击队会为政变大开杀戒。

政变者们开始按既定的部署去实施、完成罪恶的政变计划。

枪口下“合法”的废黜

3月8日，在靠近越南边境的柴桢市举行了部分学生和教师的小规模游行示威。他们高喊：“越南人滚开”的口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发表演说，借口柬埔寨境内存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庇护所、基地和供应线，煽动民族仇恨。有的宣传品则含沙射影地指责西哈努克是卖国贼。在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煽动下，不明真相的群众、市民也参加游行示威。

时隔3天，即3月11日，金边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反越游行示威活动。在教育部的印刷厂早已印好的传单和宣传画像雪片一样满天飞，政府不是阻止、平息事态的扩大，而是推波助澜。政府的广播以最大的音量反复催促学生们去参加游行，加入“爱国主义”的行列。

官方的青年大会的工作人员则布置学生在中越大使馆前集合。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不顾国际法，指使穿便衣的军人洗劫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在金边的大使馆。

在政变者的操纵下，整个金边处于一种混乱、动荡的状态。

此时，尚在法国的西哈努克亲王获悉国内发生大规模的骚乱和暴力事件，进行了严厉谴责，决定3月18日回国，亲自平定动乱。

朗诺一施里玛达集团闻讯，立即加快了政变步伐。

3月16日，他们决定提前召开国会大会，企图迫使通过废除西哈努克亲王的决议。

然而，西哈努克亲王在金边的势力很大。一批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警察大量拘捕了议会大厦前的暴乱者，国会大会被迫休会。

在此存亡之秋，当晚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金边警察局长布奥少校和刚被解职的国防部长翁·马诺林上校的一些副官和助手秘密集会，企图立即逮捕朗诺及施里玛达等人，以制止一场即将发生的政变阴谋。

但是，为时已晚。朗诺利用陆军、自由高棉的冲锋队，就在他们散会以后和次日，不但逮捕了马诺林上校和布奥少校，而且还逮捕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基里隆省省长胡笃上校，王国参谋部的彭潘伊上校，伞兵司令欣桑拉上校，邻近金边的干丹省省长，还有大约15名其他高级军官。陆军通讯兵司令在政变中被杀害。

忠于西哈努克的主要军政官员无一逃脱，全部落入政变者的魔掌。

到3月18日，支持政变的军队和山玉成的自由高棉以及KKK突击队已控制了首都金边及其周围地区，政府的主要机构也被军队控制。

这时，在有坦克、装甲车和荷枪实弹的军人“保护”下的国民议会大厦内，那些曾经宣誓效忠“国家元首”的议员们开始以“民主”的方式举行废黜西哈努克的“秘密投票”。投票的人们必须先选票上签名然后再投入投票箱内。

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死亡与偷生、忠诚与背叛、反抗与迎合中作出选择。

想起昨天的大逮捕、想起吃人肝的KKK突击队，想起阴险毒辣的施里玛达，想起大厦外正对准自己的黑洞洞的枪口，想想自己的高官厚禄，议员们投票的结果是：

——一致同意取消对西哈努克亲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的信任。

——一致同意选举议会议长郑兴接替西哈努克任国家元首。——一致同意中止行使宪法规定的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等六项自由。

紧接着，朗诺首相签署政府公告：

从即日起，诺罗敦·西哈努克不再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对他及其追随者将依法制裁。

西哈努克亲王就这样被“民主”、“合法”地废黜了。政变虽然大功告成，可是朗诺和施里玛达却提心吊胆，他们担心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因为德高望重、深受人民爱戴的亲王一旦回来，就可能把整个国家团结在他的周围，重新执掌大权。为了阻止西哈努克返回，朗诺和施里玛达一伙竟然无视国际法，对外公然宣称，将没收敢于将西哈努克送回柬埔寨的任何外国飞机，并扣押机务人员。同时，他们还派重兵封锁了金边国际机场，让西哈努克永远流亡在外，有家难回。

实际上，早在3月8日，当他们制造的洗劫大使馆的暴力事件发生后，西哈努克准备18日返回时，他们就作好了谋杀亲王的准备：

西哈努克返回金边，在机场上他会受到假王家卫队和外交使团的欢迎，在外交使团在场的情况下，他们还不敢下毒手。当西哈努克乘上官方的汽车，汽车将不是开往金边，而是把他带到离金边300公里的一个山区。然后，假王家卫队在那里秘密把他处死再把他的尸体埋在人迹罕至的森林里。让一位国家元首消失得无影无踪。

多么毒辣、周密的计谋！

如果这时西哈努克返回金边，无疑是自投罗网，必死无疑。

福人命大。正当西哈努克启程之时，他收到了他母亲的一份紧急电报：

我的儿子，你千万别回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朗诺已经用那些突击队中的假柬埔寨人取代了王家卫队，他们将会杀害你。

母亲的一纸电文，救了儿子的一条性命。

西哈努克遵照他母亲的嘱托，只得前往苏联和中国访问。

于是，访问变成了流亡。

佛教徒的真面目

如何维持通过政变夺取的政权？朗诺和施里玛达首先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一艘艘美国军舰在泰国湾游弋，为他们壮胆；一件件美制武器源源不断送来，装备他们的军队。一纸纸电文、函件正式承认伪政府；一笔笔美元不断地汇入柬埔寨的银行，一位位“顾问”进出于柬埔寨的军政大门。

当有人问美国这样一个以“保护”民主和人权而著称的大国为什么不运用它的力量去制止一场反民主、违反国际法的政变反而还予以支持呢？

尼克松总统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如下：

朗诺政府是一个主权政府。柬埔寨是个独立的国家。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我们过问了，那就会被认为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的不可容忍的干涉。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为虚伪的说法了。

的确，朗诺、施里玛达用国家的主权、独立换来了美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

一个依靠政变上台的政府，必然会百倍地依仗疯狂的政治迫害、血腥的镇压和其他法西斯的手段才能生存下来。

朗诺、施里玛达一上台便立即实行法西斯式的专制统治：

3月18日，颁布“紧急状态法”。在“紧急”时期，政府有权“在有关警察和法律、报刊和舆论、集会和私人通信等方面采取非常措施。”

5月30日，宣布无限期延长实行“紧急状态”，并颁布“戒严法”：

凡有以下行为者一律枪决：

参加或公开煽动反对政府的叛乱或暴动的；用口头或书面或用任何看得见或说得出的方式，故意进行颠覆宣传的；在陆军或国防部队中散播谣言惑众的。

凡收听北京、河内、越共或其他敌台广播者，处以5—20年苦役。

1971年10月18日；下令解散曾投票废黜西哈努克的国民议会和政府机关。对此，朗诺的解释是：“我们对那些骗人的自由民主领袖教够了。”

1971年12月17日：授予警察以下权力：

不受限制的权利去盘询和拘留有颠覆活动的嫌疑分子……随时搜查和拘捕嫌疑分子……无需许可证，不论白天还是晚上均可搜查私人住宅。

更为荒唐的是，一个学生要想获得奖学金、出国签证和一张飞机票，就得高声大喊侮辱西哈努克的语言，来证明自己与西哈努克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然后朗诺又怎么会想到这些被他派到国外学习的人就是日后西哈努克的最好朋友和坚定的追随者呢？”

朗诺、施里玛达一伙政变者发动政变当然不是为了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更不是去实行民主共和。

施里玛达是西索瓦王族的一员，早有攫取王位的野心。

政变初成，他们企图盗用西哈努克的母亲——西索瓦·哥沙曼王太后的名义，打电报给全世界说王太后批准了此次政变，从而使政变合法化。

这位非凡的老人任凭政变者的威胁，坚决拒绝了他们的无耻要求。

“不行！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是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人把他废黜掉的。你们对他进行了诽谤，把他的名声糟蹋得不成样子。他专心致志地为国家和人民的幸福服务了30年，你们不该这样对待他。我根本不想同你们打交道。”

王太后的拒绝，把他们企图利用君主的延续性作为他们政权的合法外衣的阴谋挫败了。

气急败坏的朗诺、施里玛达就开始毫无人性地残酷地迫害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迫害手无寸铁的西哈努克的子女。

在印尼心理专家的帮助下，朗诺和施里玛达掀起了一场反对君主制的运动。他们指使年轻的知识分子和陆军军官“代表人民采取行动”，递交要求废除君主制的请愿书，把王太后和亲王的画像从所有公共建筑物上取了下来，挂上了诸如“君主往往都是卖国贼”之类的标语牌，焚烧西哈努克的模拟像。

一群群不明身份的人不断涌进王宫，勒令王太后搬出王宫。这些无耻之徒把腐臭的尸体放在她的窗下，让臭气把她熏出来。

无法忍受的王太后只好搬回原来的住所。这里以前曾是一所国家博物馆。政变发生后，这里的珍贵文物被洗劫一空。

朗诺对这位70多岁的老人仍不放过。在王太后新居的周围布满了宪兵进行监视；指使青年学生在周围游行，用最粗俗、最无礼的语言来侮辱她。

可怜这位王太后，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侮辱。

朗诺、施里玛达还要斩草除根，株连九族。

西哈努克的女儿波东帕尼和两个儿子纳拉迪波与拉那烈也得为他们的父亲的“罪行”受苦，都以“叛国罪”或“政治杀人犯”被逮捕。

波东帕尼的真正“罪行”只是在她特别喜欢的一个叔叔的葬礼上控诉：

这是什么共和国？这是个匪徒的共和国，军官们可以这样随便杀人！法律哪里去？在这个共和国还有点正义吗？是公主的表叔施里玛达下令把她抓起来的。

纳拉迪则是西哈努克特别钟爱的儿子，曾被选为亲王的“政治接班人”。正因为这一点，他被指控“把情报给了敌人”而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指控拉那烈的罪名之一是他私藏了颠覆性的材料——从在柬埔寨广为发行的法国晚报《世界报》上剪下来的文章。当然，对于朗诺，施里玛达来说，西哈努克是“首犯”，决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1970年7月7日，特别法庭对西哈努克作出缺席审判：罪行之一：实行专制独裁，扼杀民主；

罪行之二：未能使柬埔寨保持和平；

罪行之三：出卖国家领土；

罪行之四：侵吞国家财产，贪污腐化。

依照法律，判处西哈努克死刑。

法国的《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滑稽的审判”的文章，作了典型的报道：

对西哈努克的起诉进行了3天。其结果成了通常预先写好了台词式的审判；整场闹剧的必然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当局指定的律师拿被告寻开心，使得庄严的法庭哄堂大笑。起诉方面的证人在大约150人的面前鱼贯出场。政府召集不到多少群众来为这次审判增添一些真正的份量’。……被B—52轰炸机、毒气、美国与南越（现在又加上泰国）军队的军事行动所蹂躏的农村居民，在法庭上没有发言权。他们都知道，随着西哈努克的解职，和平在3月18日就宣告结束了。

在北京的西哈努克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后，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他慷慨陈词，揭露政变者对他的侮辱和攻击。他最后说：

朗诺—施里玛达和其他阴谋家用这类捏造出来的罪名判处我死刑，等于准备好了绞索，到时候就会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就在他们为了定我罪而列举的几条罪状范围以内，在所有罪名上都加倍有罪的正是他们一伙。等时候一到，还得给他们增加好几条严重得多的罪名。将把那些捏造罪名的家伙判处死刑，而原来宣判我的也正是死刑。同他们对整个国家犯下的罪行相比，他们对我本人和我的家属所犯下的罪行则算不得什么。对于他们犯下的罪行，我们的人民一定会要求严加惩处的。我可不是一个伪善的人，因此我要明确宣布，3月18日政变的主犯将会有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奎士林、赖伐尔式的人物一样的下场，因为他们对国家造成了如此不可估量的损失，使我们的人民遭受了如此残暴的苦难。经过两年的苦心准备，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终于粉墨登场。

1972年3月11日，柬埔寨共和国成立。朗诺宣布自己为共和国总统，废黜于1970年3月18日取代西哈努克为国家元首的郑兴，任命施里玛达为总理。

2天之后，施里玛达被免去总理职务。这个政变的主谋现在成为一个多余的人，被朗诺一脚踢开。朗诺自己兼任总理。为了兑现政变前对山玉成许

下的诺言，不几天便把总理让给为政变立下汗马功劳的山玉成这个土匪、流氓。

3个月之后的6月4日，在一场选举总统的闹剧中，朗诺“当选”为“高棉共和国总统”。

朗诺的权力欲终于得到了满足。

然后，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抵抗斗争和国际社会的谴责，使坐在总统宝座上的朗诺日夜不得安宁。

重整旗鼓，不当流亡的花花公子

刚被废黜的西哈努克，怀着十分愤慨的心情登上了飞往北京的专机。

“真没想到，我一手栽培的朗诺竟然与我的宿敌施里玛达勾结起来。我为我们的民族感到羞耻，因为它产生了像朗诺那样的白痴。但比白痴还要白痴的不是朗诺，而是选择了朗诺的西哈努克。”

他对依偎在自己身边的妻子莫尼克公主说。

莫尼克公主只好尽力安慰自己的丈夫：

“殿下，别自责！我和您一样太难过了。您做了那么多工作，您已把您的一生贡献给您的国家，而现在他们却废黜了您，这太令人寒心了，或许，我们应该退休到法国去住会更好些。”往日温文尔雅的西哈努克勃然大怒。

“不！这绝对不是我们隐退的时刻。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听之任之，柬埔寨不仅变成一个军事独裁的国家，而且将会再次沦为殖民地，那历史将会谴责我们。夫人，我无意作为一个流亡的花花公子而告终而愿意重返金边，了却我绞死朗诺的夙愿，作为有德之士而告终。”

当西哈努克的专机在西伯利亚荒野的一万公尺上空飞行时，他、莫尼克公主、宾努亲王正起草号召进行抵抗的宣言和告人民书。和戴高乐将军在伦敦点燃了法国抗击纳粹入侵的抵抗运动的著名的6·18《告人民书》一样，1970年3月23日通过北京中央电台广播。中国几乎所有的大报都发表了西哈努克的《告人民书》。

——西哈努克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和权力解散违宪的、被政变分子操纵的国民议会，罢免朗诺、施里玛达、郑兴等政变者的一切权力。

——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它的成员包括一切爱国、进步的力量。

——建立一支民族解放军，把祖国从政变者的独裁和压迫下解放出来。

——号召柬埔寨人民以各种方式抵制和反抗政变政府。

5月5日，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联合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等爱国力量在北京组成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西哈努克担任国家元首，宾努任首相、共产党人乔森潘任副首相兼国防大臣。

无私慷慨的援助

在西哈努克最困难的时刻，中国人民伸出了同情、支援的双手。

87政变的第二天，即3月19日，西哈努克走下飞机，受到中国政府的十分热烈欢迎。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亲临并有目的地组织了41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到机场欢迎这位被“废黜”的柬埔寨国家元首。

当周恩来总理与西哈努克亲王热情拥抱时，周总理即对期待中的西哈努克说：

“您仍然是国家元首，而且是柬埔寨唯一的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别人。”

中国政府作为亚洲乃至世界大国，在道义上的支持和同情给了身处绝境

的西哈努克以极大的安慰和振奋。

此时的西哈努克是一贫如洗，身无分文。他的全部财产甚至个人用品都被政变分子没收了，甚至把莫尼克公主留在国内的首饰和一条爱犬也都拍卖了。

又是中国政府在他自己的人民的生活还仍然十分艰苦的时候，给了西哈努克慷慨、无私的援助：

——一幢漂亮、宽敞的大楼腾空，交给西哈努克及其随行人员住居。

——两架豪华的进口飞机和一个汽车队以及全部的中国工作人员归西哈努克派遣、使用。

——民族解放军的全套装备基本由中国供给。

——西哈努克的外交活动费用全部由中国政府承担。——西哈努克及其随行人员的衣食住行、生活日用品——从服装到信笺也全部由中国政府提供。

——为了避免给人恩赐的印象，中国政府同流亡在外的民族团结政府签订了明确的财政协议，规定向他们提供长期无息贷款，偿还期为柬埔寨取得彻底胜利后再过 30 年。

对于牺牲自己的利益给他人的援助而不要求回报的中国，西哈努克发自内心的由衷的赞叹：

啊，中国是个非凡的国家，谁是亚洲人，谁就不能不为它而感到骄傲。中国不输出坦克和士兵，而是输出尊严和对别人的尊重。

路正长，愿未了

正是由于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柬埔寨人民的不懈斗争，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慷慨、无私的援助，正是由于有中国这样一个辽阔、巩固的后方和坚强的后盾，正是由于国际社会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和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同情与支持，1975 年 4 月 17 日推翻了朗诺的高棉共和国，西哈努克重返金边，回到阔别 3 年的祖国。

然而，这一切对于西哈努克亲王来讲，远不意味着他的政治流亡生涯的结束，他和他的人民将面临更为残酷、严峻的现实，要走的路更曲折、更坎坷。

朴正熙命丧宫井洞 (1979年10月26日韩国)

一具被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尸体送到了汉城地区军医院。在特工人员严密监视下，医院院长和几名医生揭开白布验尸，惊恐地发现死者竟是刚才还在电视中露面的总统朴正熙。尸体报告很快出来了：

死者：朴正熙。性别：男。年龄：62岁。死因：太阳穴受枪击。死亡时间：1979年10月26日19时至20时。

堂堂一国之总统为何死于非命？谋杀者是谁？谋杀的背景又是什么？……

一个农家子弟的发迹

朝鲜庆尚北道善山郡龟尾面上毛里，自古以来被称为“名胜之地”。金乌山苍松林立、山势险峻、洛东江曲曲弯弯，奔腾不息，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风水圣地。

这又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居住在这里的山民世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作，勉强糊口。

年过半百的朴成彬正愁眉不展。他44岁的妻子白南仪又怀孕了。已经养育了6个孩子，够艰难的了。多一个孩子多一张嘴，况且家里生活本来就不富裕，夫妇俩决心打掉这个“多余的孩子”。于是，白南仪每天喝下两大碗又苦又咸的酱油，想靠这个民间土方让胎儿流产，可是都无济于事，肚子还是一天天大起来。她又不顾性命爬到柴禾堆上，一次又一次地往下跳，跳得她双腿发软，眼冒金星，她肚子里的这块肉还是掉不下来。

瓜熟蒂落。1917年11月14日，朴成彬的破泥屋里，白南仪在经历了数小时阵痛的煎熬之后，终于生下了她第七个孩子，还是一个儿子。他的父亲为他取名为正熙，意为正义之光。

他们夫妇哪里想得到，他们不想要的这个顽强的小生命将会登上韩国的总统宝座呢？

农家生活的艰辛，磨练了朴正熙。孩童时期，朴正熙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性格。无论是小学老师严厉的训斥还是被桦木条抽打，朴正熙总是保持沉默，不喊不叫，从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回答责问，这种性格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占了相当大的成份：忍受痛苦、忍受羞辱，只要你忠实于你的信念和你所珍视的东西，一切都是无所谓。也正是这种顽强、执拗的性格，使他在学习上出人头地。毕业时，除了体育，其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最优秀的。

由于先天不足、生活的艰难，少年的朴正熙长得又矮又小，尽管已经十三四岁了，但看起来还像十来岁的小孩。人们只从他那高颧骨和凶狠的目光中，感到了他已经不是天真、单纯的儿童。朴正熙过早地成熟了。

1932年，朴正熙小学毕业，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进入大邱师范学校学习。这是一所日本人开办的学校，80%的学生是日本人。在这里他受到了爱国教师的爱国主义的教育，阅读了《拿破仑传》和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传》。

1937年，朴正熙从师范毕业，回到他的家乡，在国庆公立小学担任教师，尽管他以教书为乐，但平凡的教员生活苦恼着他：身处穷乡僻壤，一个教书匠无法发挥在贫苦的儿童时代就培养起来的战斗性格，去完成他的抱负，去实现他的梦想。吃了3年的粉笔灰之后，他毅然辞去教职，准备到军队“去寻找前途”。

1940年春，朴正熙考入“伪满（即我国长春）陆军士官学校”。他从凶狠、顽固而又严厉的日本教官那里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进一步造成了朴正熙在成为军人政治家过程中的某些特性——说一不二、斩钉截铁的纪律。

由于其刻苦、顽强，朴正熙很快成了军校的佼佼者，深受日本教官的称赞，并以优异的成绩受到“新京官校”的嘉奖和伪满皇帝溥仪的接见。随后他被保送到日本“东京军事学院”深造，1944年以全校第三名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朴正熙被编入伪满第六方面军第八联队任陆军少尉，率领“讨伐队”疯狂地围剿东北抗日游击队。由于他的“战功”，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中尉。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朴正熙转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此时的朝鲜却因为苏、美两国的争斗而被分裂成两个国家。赶走了日本人，南朝鲜又被“山姆大叔”控制。朴正熙面对破碎的山河，悲愤满腔。他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具有辉煌文化的祖国会落至如此境地？也许是我国所处的战略位置而成了那些强大邻国的猎物，而不是像同盟国领导人在雅尔塔和开罗许诺的那样，让我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朴正熙决心重新拿起枪，为自己刚刚获得解放的祖国服务。1946年9月，他进入汉城陆军士官学校受训。同年12月毕业，同时被授予上尉军衔并留校任教官。

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军人，面对破碎的山河，受难的人民，朴正熙在受训期间，在南朝鲜劳动党负责人之一、他的胞兄朴东熙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劳动党。

为了反抗美国和李承晚政府制造南北朝鲜分裂的丑恶行径，1948年10月20日，时任韩国十四团作战参谋长的朴正熙在南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毅然率领全体官兵举行了武装起义，但遭到了残酷镇压，朴正熙也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

此时，摆在朴正熙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要么宁死不屈、坚持革命；要么，叛变投降，苟且偷生。一向“坚强”的朴正熙令人遗憾地选择了“生”，成了可耻的叛徒，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地下党党员和参与策划武装起义的全部成员，其中包括他的哥哥朴东熙。由于朴正熙的叛变，该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400多名地下党员和爱国官兵惨遭杀害。他的哥哥也是其中之一。

烈士的鲜血，换来了朴正熙的“好运”。南朝鲜陆军情报局的一个处长表扬他是“第一个无名的有功者”。没过多久，果然加官晋爵，出任南朝鲜陆军本部作战情报室室长兼陆军情报局第一科中校科长。

朴正熙不仅官运亨通，而且情场得意，1950年8月，经过陆军情报局下属宋在干的介绍，朴正熙认识了宋的表妹，当时的中学教师，一位富豪的千金陆英修。陆英修对这位其貌不扬、出身寒微的丘八一见钟情，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心嫁给朴正熙。相识不到4个月，这对青年人在朴正熙的家乡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对于陆英修——后来的韩国第一夫人，美籍朝鲜人，中国人民的朋友玄雄先生在其《朴正熙》一书中做了这样的评述：

从传统上讲，朝鲜人的妻子的责任是，呆在家里照看孩子，料理家务，不得抛头露面。像那些大多数男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一样，妇女参与、甚至是对政治感兴趣，在朝鲜都是极为罕见的。但朴夫人陆英修却是个例外。作

为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的母亲，这位第一夫人在保持朝鲜妇女美德的同时，还腾出时间积极参与与她丈夫的工作，在多方面协助他，她的温顺贤达和富有人性味的性格，深受新闻记者、许多朴总统的共事者以及各个不同政治派别人士的爱戴。

在青瓦台，许多医院和孤儿院，时常可以看到她穿着新浆过的朝鲜传统的长裙悄然走过的的身影，她总是毫不声张地做一些不起眼的善事。陆英修在为改善朝鲜妇女地位、下层人民子弟的教育和麻疯病人的治疗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她对朴总统来说，是宝贵的政治财富。她的热情、善良和为民服务的诚意补偿了总统的严厉，并促进了总统与人民之间富有人情味的联系。

在朴将军 1963 年当上总统后，朴夫人也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主见的人。她对本书作者说：“在家里，我打算扮演反对派角色。我的家门尽量经常性地向公众开放，我想听听他们的抱怨和建议。我相信，用这种方式，可以为总统和我们的国家提供最佳服务。”

朴夫人还相信，人的真正价值来自于他自己的基本观点，她的责任是作为一个母亲，把正确的观点逐步向她的孩子们灌输。“我们让孩子们坐普通的公共汽车上学。我经常提醒他们，他们不是贵族而仅仅是普通人。再说，我们还应该为不当总统的日子作准备。”她希望孩子们认识到：“他们是一个农民的后代”，他们应该“根据自己的个人爱好来发展自己的才能。”

对于孩子们来说，第一夫人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母亲”。无论是幕后为郁闷的人们提供援助和安慰，在公开场合的慈善行为，私下或是秘密地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还是在远处偷偷地欣赏着自己的丈夫，朴夫人在整个婚姻生活中，给了总统难以估量的道德支持。虽然玄雄先生的评价不免有些溢美之词，但基本上还是可信的。不幸的是，这位第一位夫人于 1974 年 8 月 15 日在一次庆典仪式上被一名年轻人暗杀了。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朴正熙开始了他官运亨通的军旅生涯。从师参谋长一直晋升到陆军本部作战参谋次长，第二军副司令。其间还被送往美国俄克拉荷马陆军炮兵学校深造，后来从陆军大学毕业。

然而，对于像朴正熙这样雄心勃勃、权力欲极强的人来说，一军的司令并不能让他满足。他凭着他的奸诈、贪婪、谄变、无情和不择手段，继续在政治阶梯上攀登。

机会终于来了。

1960 年，韩国政治风云变幻激荡，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场，冲突不断，这就为军人干政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1960 年 4 月 27 日，统治了南朝鲜 12 年之久的李承晚被推翻，成立了“过渡政府”，4 个月后，在野的民主党上台，建立以尹谱善为总统、张勉为总理，并由总统制改为内阁责任制的“第二共和国”。

民主党党内因分赃不均，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张勉虽三次改组内阁，也未能缓和各派争权夺利的斗争。更为严重的是，张勉执政时，韩国政局更为动荡。经济萧条衰退，美援无济于事。通货膨胀，失业折磨着人民。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反对美国干涉，争取民主、实现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软弱无能的张勉政府根本无法驾驭局势。

美国对于它的这块战略要地自然不能再坐视不管，肯尼迪政府决心改变摇摇欲坠的韩国局势。通过中央情报局物色“新的铁腕人物”，策划用军事

政变的办法来取代张勉政府。

朴正熙和他的侄女婿金钟泌（朴东熙的女婿）以及出身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的一批少壮派军人早已伺机政变。1960年9月10日晚，他们在汉城“忠武壮”饭店秘密策划军事政变，以后又多次密谋，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挂上了勾，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他们以军校校友为骨干，在全军各兵种中扩充自己的势力。

61年5月14日，各政变部队负责人在汉城莱水洞金钟泌哥哥金钟洛家“赴宴”，决定各部队在5月16日零点以“烽火作战”为代号，佯装演习，调动部队，预备3点攻克汉城，宴会的最后，由主人金钟泌举杯宣誓：“不成功便成仁”。

就在政变的前一天，即5月15日，一个预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使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负责突击部队的第30后备师朴常勋和李嘉勇上校临阵变卦，向新任陆军参谋长张都瑛泄露了全部的政变计划，闻之大惊的张勉下令立即拘捕集结在汉城第六军区的政变领导人，严密监视朴正熙的行动。

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软弱的政府没能采取断然有效的措施阻止政变，尽管也派宪兵前去镇压，但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人数众多的常规军面前一战即溃。

政变仍按原计划进行。

凌晨3时，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划破了汉城的夜空。由朴正熙、金钟泌率领的6000多名“敢死队”冲破宪兵的防线，强行渡过汉江桥，进入市中心，先后占领了中央广播电台、国民大会大厦、陆军总部。6点，通过广播电台宣告政变成功。当天，颁布“紧急戒严令”：冻结财政金融，封锁汉城机场和车站，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社团的政治活动，逮捕所有内阁成员。第二天，40万前线部队发表声明支持军事政变。张勉内阁辞职。短命的“第二共和国”宣告灭亡。

对于这场政变，朴正熙在他所著的《国家革命与我》一书中描述了这场在他看来是伟大的壮举：

天已黎明！这一时刻是这场革命的象征，是我们国家黎明的象征！一个不同以往的崭新的早晨！踏在金浦的革命道路上，我永远也不忘记出现在我的那些年轻的革命者脸上的神情——那些走在我的前面和随我而行的人们，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追寻着国家的命运，他们的身后是深情的妻子，幼小的子女还有年迈的父母。他们还很年轻，尚未品尝到生活之果的全部滋味。我眼前的是一群多么崇高的人类形象！

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俯视着汉江，霎时感到，它的波浪是新的，水是新的，一切一切都与昨日不同。旧的事物都将一去不返，历史潮流就是这样，接受的永远是新的事物。这就是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自然界的伟大启示！”

政变后，由清一色的军人组成了最高权力机构“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朴正熙则用“挟天子以命诸侯”的策略让原总统尹谱善作有名无实的总统，军、政界元老张都瑛兼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国务总理和国防部长。他自己则是“垂帘听政”。政局稳定后，朴正熙借口“政务净化”把张都瑛一脚踢开，免其军职，关进大牢，并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朴正熙自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完全控制了军政大权，开始了他两年半的军事统治时期。

1963年10月，朴正熙通过总统大选获胜。12月17日，他脱下军装换上西服，宣誓就任总统。1972年10月17日，又通过“国民投票”，修改宪法，朴正熙被“选”为终身总统，西方国家称之为“维新政变”。

一个农家子弟从田埂走来，登上了韩国总统的宝座。

高压下的反抗

朴正熙执政期间，虽然韩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在政治上实行了专制、独裁，践踏人权，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国内人民的反抗。

早在60年代初的军管时期，朴正熙就违反基本的人权，解散国会以及所有政党和社团，实行一党独裁，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封闭言论出版机构，剥夺人民参政的权力；建立中央情报部特务机构，对革新势力、进步学生和其他民主人士进行法西斯大屠杀。朴正熙自己则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一身，并控制特务和武装力量，成了大权独揽、至高无上的独裁者。

就在朴正熙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有人称之为“朝鲜式的民主”的同时，一场民主运动的暴风骤雨席卷而来。

“维新政变”以后，屡遭打击的新民党顽强地生存下来，在1978年12月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奇迹般地得到了32.8%的选票，超过了执政党朴正熙的民主共和党。从此后新民党在新总裁——一位民主斗士金泳三和有“美男子”之称的反朴勇士金大中的领导下，为反抗朴正熙的暴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1971年，金大中作为在野的新民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与大权独揽的朴正熙决一雌雄，他仅以90万张选票之差败给了朴正熙，轰动了韩国内外。有评论家认为“当时如果有公正的选举机构监督，正确计算选票，金大中肯定会当选总统”。对于金大中这样的“头号政敌”，朴正熙是恨之入骨，他先后三次以违背“反共法”、“选举法”等莫须有罪名对金大中提出起诉，甚至派特务威胁，逼他退出政界。金大中被迫离开祖国，流亡在外，但他在美国、日本继续抨击朴正熙反人民反民主的独裁行径。

朴正熙决心置他于死地而后快，派特工人员在日本“大皇宫饭店”绑架金大中，准备把他投海淹死，金大中大难不死，被美国中央情况局发现才幸免于难。

押送回国的金大中被扣以“叛国”、“颠覆政府”等罪名判刑5年。提前释放后，金大中对在纪念“三·一独立运动”57周年祈祷会上发表了有名的“民主救国宣言”，猛烈抨击独裁政府，要求朴正熙下台。为此被判处10年徒刑，后被“特赦”，软禁在家，要他“谨慎、抑制、不要抨击政府”。

金泳三得到金大中等人的协助后，新民党声势大振，他在汉城国际记者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开辟一个民众成为社会主人翁的新时代》为题发表了长篇演说。他说：“在蹂躏基本人权的现行体制下，新民党以争取人民的自由和生存权利为最大的政治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新民党主张修改宪法，立即废除第九号‘总统紧急措施’，让现政权抛弃长期执政的幻想，和平地移交政权。在南北统一问题上要打破政府一手包办的现状，要采取积极的方针，如有必要，愿意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会谈。”

金泳三讲话，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朴正熙狗急跳墙，派遣大批警察袭击新民党总部大楼，没收新民党机关报《民主战线》，逮捕该报编辑部负责人文富植。

独裁者的暴行，激起了全社会的反抗。

新民党为了反朴，利用“YH 贸易公司”解雇女工事件，制造了广泛的社会舆论。

“YH 贸易公司”原为一家生产假发的出口企业，由张龙虎于 1966 年创办，60 年代后半期，产品销售旺盛，年年获取巨额利润，工人达 4000 多名，成为韩国名列前茅的贸易公司。但到 1979 年，公司受世界经济和第二次能源危机的猛烈冲击，于 4 月 30 日宣布破产。该公司的 200 多名女工开始了反对解雇、要求保障生存权利的斗争。女工的斗争得到了宗教界、文化界、在野党以及一切反朴势力的声援。8 月 9 日，金泳三让女工们搬到新民党总部大厦，举行无限期的静坐示威，并鼓动说：“全国不少企业处于破产的前夕，新民党同情你们的遭遇，我们支持你们的斗争，希望你们拿出勇气坚持斗争，斗争就是胜利。”

朴正熙当然无视这场经济斗争后的政治目的，派遣 1000 多名武装警察冲击现场，对手无寸铁的女工和新民党党员残酷镇压，30 多名新民党党员、12 名前来采访的记者被打伤，女工被拘留，一名女工跳楼自杀。朴正熙还发表“特别谈话”，表示要严惩煽动女工闹事的后台势力。

镇压愈残酷，反抗愈激烈，韩国各阶层人民——工人、学生、记者协会、宗教团体相继举行集会、示威、散发传单，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朴正熙的法西斯暴行。

朴正熙一不做、二不休，竟指使汉城地方法院无理判决停止新民党总裁金泳三和其他 4 名副总裁履行该党总裁权的职务，这在韩国政党史上还是第一次。金泳三立即表示强烈抗议，“要为恢复民主和保卫党而献身斗争”，指出“这一政治镇压是对渴望恢复民主的所有国民的挑战，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要求朴正熙“和平地移交政权”。

朴正熙集团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调动数百名警察，在只准执政党民主共和党和维政会议员参加的情况下，国会强行通过对金泳三的“惩戒动议案”，悍然剥夺了金泳三的议员资格。新民党奋起反抗，愤怒谴责朴正熙“扼杀在野党”的暴行，并决定新民党 69 名国会议员集体向国会辞职，并声明“如不接受广大群众对独裁体制的严重警告，朴正熙的悲剧将是不可避免的”。

釜山素来是在野党的地盘，民主运动的中心。10 月 16 日至 19 日，学生、工人和市民在新民党的直接领导下掀起了气吞山河的反朴风暴，震撼了韩国全境。示威群众与警察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朴正熙宣布在釜山实施戒严。并出动大批军队、坦克镇压，逮捕了近 5000 名示威群众。

朴正熙的丧钟敲响了。

前仆后继，汹涌澎湃的反朴斗争加速了朴正熙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失去了美国的支持。

朴正熙的独裁统治、践踏民权的暴行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

朴正熙对于美国一厢情愿地把美国式的民主自由硬要套在韩国头上十分反感，他曾形象地比喻：“这就象一个 100 磅重的人借了一件 250 磅大汉穿的西服，竭力使自己穿得文雅老道。而韩国就是以 1948 年时的条件，套上了美国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还指望它能深深扎根。这种想法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就发育成熟地生出来了。”因此，他坚持认为，在韩国，应该有它自己特色的“民主”，这就不免与美国发生冲突。

同时，朴正熙的独裁统治已经引起了韩国的政治动荡，危及了美国在韩国的利益，成为美国推行东北亚战略方针和朝鲜半岛政策的绊脚石，加上朴

正熙标榜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军事上“自卫”同美国闹“独立”的做法，使美国更感到不好驾驭，必须找寻新的代理人。

早在军管时期，美国就几次逼朴“还政于民”，恢复民主政治，对于朴正熙的暴行公开谴责，支持新民党的反朴活动。美国总统卡特亲自会见金泳三，给新民党撑腰打气。

不仅如此，美国还要求朴正熙尊重人权，卡特总统在同朴正熙的会谈时，一再强调韩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保障在政治权利和人权方面也有所进步”。美国国务卿万斯则把被关押的 100 多名“政治犯”名单交给朴正熙，要求立即释放。

但是，素来固执的朴正熙根本不买美国的帐，对于万斯提出的人权问题，蛮横地说：“有关韩国半岛的问题是我们的内政”，甚至反唇相讥地说：“美国不必关心韩国的人权问题，还是管管你们自己的人权吧。”

与此同时，支撑朴正熙独裁统治的四大支柱——中央情报部、陆军参谋部、青瓦台秘书室和总统警卫室——由于内部的倾轧开始倾斜。

中央情报部是朴正熙的耳目机关，维持法西斯特务统治的工具；陆军参谋部是他起家的大本营，命根子；青瓦台秘书室是他的智囊中心，为他出谋划策；总统警卫室保卫总统及家人的安全。

作为一个首脑，应该努力使这几个部门保持平衡，搞平衡术。唯有如此才能相互牵制，为我所用。然而，朴正熙的失误就在于他太宠信警卫室，使它权力膨胀，导致内部倾轧、不满，以至于自己成为牺牲品。

按常理，警卫室只是一个安全保卫部门，无权干预国家大事，更不能凌驾于另外三个部门之上。但朴正熙却视警卫室为“护身符”，尤其是 1974 年他的妻子被谋杀后，更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与警卫室连在一起，有一荣俱荣、一毁俱毁之感，于是他对警卫室另眼相看，让它享有种种特权。

毫无疑问，侍卫长车智澈自然就是总统的贴心人。车智澈斗大的字识不到一升，原是一个职业军人，头脑简单，服从命令，绝对忠诚，典型的军人作风，而且他还有一手好枪法，朴正熙看中了他，任命他为侍卫长。车智澈为报知遇之恩，使尽浑身解数尽效犬马之劳。不管在公开或秘密的场合，他总是紧紧地跟在朴正熙的屁股后面，在有关朴正熙的新闻图片中，你只要稍加留意就会看到一个光头的高个子，横眉竖眼地站在朴正熙的背后，用凌厉、警惕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人，这个人就是车智澈。

别小看这个大老粗，为讨得朴正熙的欢心，朴正熙吃喝玩乐、衣食住行，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称心如意，乐得朴正熙常常喜笑颜开。

四年的效忠，换来了主子的格外宠爱和绝对信任，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也许，对权力的追求是人类的本性，车智澈现在已不满足当一条“看家狗”，而要插手政治，除掉“三大金刚”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

1978 年冬，车智澈几次向主子进言，硬把当了 8 年秘书长的金正濂赶出青瓦台，打发到日本任驻日大使，接任的是四平八稳、优柔寡断的文人金桂元。对于车智澈的胡作非为他敢怒而不敢言，忍气吞声。

陆军参谋长郑升和笃信佛教，博览群书，精通兵法，有“儒将”之称，他与朴正熙同乡，因而关系十分密切。

车智澈依仗朴正熙的宠爱，竟然在率领 60 万大军的参谋长郑升和头上动土。他把本来由郑升和直接指挥和控制的空降特种作战部队和汉城的城防部

队的指挥大权夺了过来，削弱了郑升和的兵权，引起了郑升和和其他高级将领的极大不满。

现在，只剩下一个对手，那就是韩国的第二号人物、朴正熙的同学加同乡、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

金载圭在韩国被认为是情报专家。但他比较开明，尽量限制特工人员的非法活动，自恃与总统是老同乡、老同学、老战友的情谊，坦率直言，力劝朴正熙顺应历史潮流，改善人权实行民主，同时他尽自己的能力，适度地抵制朴正熙的政策。他哪里想到，“陈情”的结果，引起了朴正熙的猜忌和不满，从此，自己的地位逐渐被车智澈这样胸无大志、不学无术的小人所代替，时常遭到总统的无端责骂和训斥，甚至连车智澈也敢对他指手划脚乱骂一通。

首脑权力的延伸原则被车智澈运用得得心应手，他现在成为名符其实的韩国第二号人物，并梦想着有朝一日去接朴正熙的班。他把人事任免大权全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利用特权把朴正熙和他的幕僚隔开，任何人晋见总统，任何向总统呈报的建议，凡是他不高兴的，统统被拒绝、扣压。就连金载圭、金桂元也不例外，飞扬跋扈到了极点，文武官员对他是又恨又怕。

釜山的反朴斗争爆发后，朴正熙、车智澈大骂金载圭无能、领导无方，金载圭的一切辩解和进言都无济于事。在朴正熙的授意下，车智澈起草改组内阁计划，大笔一挥，就把金载圭、金桂元的名字一笔勾销，他还要撤掉卢载铉的国防部长的职务，把参谋总长郑升和调任他职。

总统府秘书长金桂元闻讯改组内阁，便立即告诉了金载圭，希望几股力量联合起来对付车智澈、朴正熙。

当金载圭获悉这个情报后，感到自己同车智澈、朴正熙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除了置对方于死地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这时，他想到他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交谊，想到美国国防部长布朗想“换马”的暗示，想到与郑升和将军的情谊，想到自己平时受的窝囊气，他下了狠心，一定要干掉朴正熙和车智澈。

下定了决心，金载圭就开始着手进行准备工作，他首先动员中央情报部的人马。情报部的各局、处的头子都是他的老部下，交情甚深，当他试探性地发泄对朴正熙、车智澈的不满时，这些人齐声赞同，摩拳擦掌。这给金载圭很大的鼓舞，但他仍十分谨慎，不敢和盘托出。

为了得到军方的支持，他从情报部活动经费中拨出巨款，拉拢、收买一些实权将领，以便到时能顺利地调兵遣将。

在完成了这两项工作后，金载圭就谋划整个举事“腹案”；寻找适当的时机刺杀朴正熙。然后，通过军方宣布“紧急戒严令”、成立革命委员会，清洗朴正熙的亲信，然后再修改宪法，建立民主政权。维持军管3—5个月，在此期间由他自己担任主席，然后，还政于民……

朴正熙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嘀铃铃……”1979年10月26日16时，中央情报部部长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

从沉思中醒过来的金载圭拿起了话筒：“我是车智澈。您是金部长吗？今天晚上总统阁下要在宫井洞餐厅和您共进晚餐，望您准备。”

金载圭放下话筒，心中不由大喜，机会终于来了，“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祭日！”他咬牙切齿地说。

刺杀总统，毕竟是件极冒险的大事。几十年的情报工作的经验告诉他，稍有不慎，就会大祸临头，金载圭显得有些紧张，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伺机由自己直接刺杀最安全、最可靠”，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金载圭回到电话机旁，抓起话筒：“我要陆军总参谋总长。”不一会，电话里传来了讯号。“啊……郑总长，您好！今晚有时间吗？我想请您来宫井洞吃晚饭。”在得到了对方十分肯定的回答后，他才放下话筒，松了一口气。

接着，他又给中央情报部次官金正燮拨了个电话：“今晚我原已约定与郑参谋长在宫井洞办公室共进晚餐，可是不巧，由于总统阁下光临，我不能相陪，望你代我陪一下总长，待总统离去后，我马上前去相陪。”

16时30分，金载圭来到宫井洞。宫井洞从外看并不起眼，仅是一座普通的两层高的建筑物，只不过外面围墙稍高，约有3米。砖墙顶端是带白色锋利箭头的金属栏杆，然而，围墙的里面却是另一番天地。别致的楼房里，第二层设有金载圭的办公室和寝室，底层则设有豪华的餐厅和会客厅。

金载圭仍像往常一样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从保险柜里拿出好久没有用过的手枪。这是一支西德制“尤尔塔”七连发32口径的手枪，瞄准器好，冲撞力强。他将黄灿灿的子弹一颗一颗地压进弹仓后，拉开枪机，推弹上膛，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便把枪藏到书架的后面，然后坐在进口的黑色羊皮沙发上，双眼微闭，思考着行动的步骤和每个细节。

17时10分左右，秘书长金桂元来到了宫井洞。两人寒暄几句后，金桂元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对金载圭诉苦说：“车智澈太狂妄自大，滥用职权，真叫人头痛”。

金载圭略有所思，似乎漫不经心地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金桂元深表同感地点点头。

他们一边闲谈着，一边等待着朴正熙的到来。

18时5分，朴正熙和车智澈携同5名警卫人员抵达宫井洞。

宫井洞是朴正熙寻欢作乐的地方。这里离总统府青瓦台仅咫尺之遥，安全清静，还有他喜欢吃的美味佳肴，风流艳丽的女招待。

朴正熙兴致勃勃地在金载圭的陪同下来到餐厅。餐桌上早已摆满了丰盛的具有韩国风味的食品、几瓶威士忌和两盒高级“船”牌香烟。

金载圭投其所好，还召来了两位年轻美貌的女子陪席。她俩身穿半透明的长裙、丰满、苗条的体态依稀可见，乌黑的披肩发、甜密的脸蛋儿浓妆艳抹，妖媚迷人，侍候在朴正熙的左右。

酒过一巡，朴正熙就开始谈及釜山等地的反朴民主运动，板着脸，用责备的口气质问金载圭：“釜山局势的发生，难道不是因为中央情报部的情报不灵吗？”金载圭只得默默地听着。车智澈也是火上加油，以尖刻的言词历数金载圭的过失，而朴正熙非但不劝解，还不时点头赞同。金载圭显得极为气愤，但他极力克制着。

18时55分，金载圭借口上厕所，第一次离开席位，观察了周围的动静。5分钟后又返回餐厅。

19时10分，金载圭借故第二次离开餐厅，快步来到50米外的办公室，以抱歉的口吻郑重地要求郑升和金正燮稍候。

在返回餐厅的途中，金载圭召见了他的两位助手，即中央情报部礼宾处处长朴善浩和自己的随行秘书朴兴柱。他把他俩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十分

严肃地说：“国家沦亡，我们也无法生存，不知你们是怎么想的？”此时的金载圭顾不得许多，还没等他俩回话，便又接着说“今晚我要干掉他们。你们听见第一声枪响，便立即解决他们的警卫人员。明白吗？”

朴善浩、朴兴柱一听部长的话，颇感突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金载圭只得为二人壮胆打气。“这里有郑参谋总长和情报部次长，你们还怕什么？”二人一听，觉得在理，既然军权在握的总长也参与，我们还怕什么！立即表示愿为部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金载圭对部下的忠诚非常高兴，以命令的口气说：“你们去挑选3名精明能干，绝对忠诚的人来支援我，今晚一定要把他们全部干掉，一个不留！”

“那么，请给我们30分钟的时间准备。”朴善浩要求道。

朴善浩和朴兴柱二人领命，分别找随行警卫李基柱和司机柳成玉布置任务。朴善浩自己亲自负责干掉接待室里的警卫处长郑仁炯和副处长安载松。朴兴柱率领李基柱和柳成玉来到厨房后门，钻进停放在那里的轿车，伺机干掉在厨房里的警卫室特别车辆处长金容太和警卫员金镰燮、朴相范。

金载圭回到餐厅时，席上的情绪已变得轻松。朴正熙、车智澈在娇艳的艺妓的吉他弹奏声中，一边看电视，一边谈笑风生，金载圭强压住心中的怒火，装得若无其事，悠然自得。

19时35分，金载圭再次离开席位，来到餐厅旁一个房间，与朴善浩接头。朴善浩警惕地望了四周，低声地报告说：“一切准备完毕！”金载圭拍了拍他肩膀，满意地点了点头。一再提醒他以厅内的第一声枪响为信号，立即行动。然后他疾步来到二楼办公室，取出手枪插入右腰，并用外衣掩盖好，返身走下楼来，一路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金载圭坐稳后，忽向朴正熙说：“阁下搞政治要顾全大局呀！”接着又指着车智澈的鼻子，以挑衅和讥讽地口气对朴正熙说：“您带着这种废物搞政治，能搞得好吗？”话音未落，便向车智澈打了一枪，又快速站起来向朴正熙打了一枪。

开第一枪时，金载圭是坐着的，也没来得及瞄准，子弹只是打穿了车智澈的右手腕。到底是军人出身，车智澈机灵地就地一滚，乘金载圭向朴正熙开枪的一刹那，逃到室内厕所。

朴正熙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还未反应过来，便被金载圭的第二枪击中胸膛，子弹穿胸而过，强大的冲撞力使他倒向左侧，伏在艺妓的怀里，朴正熙痛苦地呻吟着，鲜血涌流。两名艺妓从未见过如此情景，大惊失色，就势扶起怀中的朴正熙，分别用手掌堵着流血不止的前胸和背后的伤口，不安地问道：“阁下，怎么样？”朴正熙闭着眼、忍着痛，有气无力回答说：“我没关系。”说着便耷拉下了上半身，昏死过去。

同在现场的金桂元早已逃离餐厅。

在接待室里聊天的郑仁炯和安载松听到枪声，惊诧地：“哦？”了一声，本能地去掏手枪，朴善浩闪电般地提着手枪一个箭步跨进来，“放明白点！动就开枪！”不甘束手就擒的郑仁炯、安载松企图反抗，被朴善浩击毙。

听到枪声的朴兴柱和李基柱、柳成玉从轿车里飞奔出来，冲到厨房玻璃下，向室内猛烈扫射，四位警卫员猝不及防，中弹倒地。

金载圭向朴正熙打第二枪后，再次扣动扳击朝逃向厕所的车智澈开枪。不巧，手枪卡壳了。几乎在同一时，餐厅里的电灯全部熄灭。金载圭只得扔掉手枪，跑出餐厅，另找手枪，灯突然又亮了，原是锅炉房的工人听到枪

声，以为是电线串线，把电闸拉开了，马上又合上了。

金载圭跑出外厅，在花园里碰上了朴兴柱，急忙喊道：“快把枪给我！”可是朴兴柱的子弹也打光了，金载圭无奈正要返回餐厅，在走廊上遇到了前来相助的朴善浩。他上前夺过朴善浩手中的左轮手枪，跑回餐厅。

这时，躲在厕所的车智澈，见厅内久无动静，以为金载圭已离去，所以从厕所里跑出来，大喊：“警卫员！警卫员！”真是冤家路窄，他刚跑到餐桌前便与冲进来的金载圭相遇，车智澈一看大事不好，急忙躲在一个柜子后面。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金载圭举枪射击，子弹穿透橱柜击中车智澈的腹部，大声惨叫。金载圭绕过餐桌，发现朴正熙身中两弹还没断气，就把手枪抵住他的太阳穴补了一枪。朴正熙的身体抽搐了一下，就一命呜呼了。一场血腥政变就在倾刻之间发生了。

事态的发展并没有按金载圭所设想的那样，由于国务委员、军中朴正熙的亲信的反抗，关键人物参谋总长郑升和、国防部长卢载铉的动摇，金载圭遭到逮捕，致使全盘计划落空。金载圭被捕后，朴正熙的亲信，陆军保安司令金斗焕上台。他不顾韩国各界人士的压力，在1980年5月20日绞死了金载圭。金载圭在临行前几个月的上诉书中写下了感人肺腑的一页：

我为恢复民主主义而进行的革命已成功。从此有可能清除维新体制，恢复民主主义。遗憾的是我未能完成革命后的任务——清除推行6年之久的维新体制而积压下来的很多垃圾，确立民主主义制度。我向政府请求给我自杀的权利，这样，政府可避免因我的死遭到国民的谴责，也可拿我一个人的生命来承担全部责任，以救助部下的生命，最后，我衷心希望自由民主主义在我国开花结果……历史将会永远记住为民主自由而流血牺牲的人们，同样，历史决不会忘记实行专制、践踏人权的独裁者。

历史是公允的！

以身殉职 (1973年9月11日智利)

激烈的枪声终于停息。一群军人冲击智利总统府，端起自动冲锋枪，朝一位满身血污、气绝身亡的老人疯狂扫射，100多发子弹全部倾泻在这位老人身上，弹孔如蜂窝一般，令人修不忍睹。庄严、神圣的总统府为什么枪声突起？这位老人是谁？又为何遭此毒手？

要了解这一切，必须从头说起。

扔下手术刀坐上总统椅

1908年7月26日，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出生于智利瓦尔帕来索城的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他的父亲是位有名气的律师，母亲是很有教养的家庭妇女。他的长辈几乎都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祖父阿连德·帕迪恩博士是共济会的会员，在智利创办了第一所世俗学校。他为人正直善良，政治观点激进，因此博得了“红色阿连德”的美称。他的父亲和叔伯也都是激进党党员。阿连德就是在这样一个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的家庭教养下成长的，这在他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起了重大影响。

16岁的阿连德中学毕业以后便到军队服役，10年的军旅生活，使年轻的阿连德经受了磨练。1926年阿连德服役期满，决定继续中断的学业。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智利大学医学院。他希望以自己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去解除患者的痛苦，去拯救病人的生命。

在大学时代他以学习成绩优异和动人的演说而闻名。他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担任学生医务中心主席，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和大学评议会的代表。这时候，他就初露头角，显示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和才能。

和他的父辈一样，阿连德也以思想激进而闻名。他博览群书，尤其喜欢阅读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医科学生是传统上最进步的。那时，我们住在一个贫民区，实际上是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们住在同一宿舍的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阅读《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也阅读托洛茨基的著作。”

这些著作对于他的思想变化起了很大作用。他萌发了学习列宁用革命的理论来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

1932年6月，阿连德以学生领袖身份参加法学院学生的集会，并发表了支持格罗维和马特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的演说。他遭到逮捕，两次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他的父亲悲忧而死，出狱后的阿连德站在父亲的坟头，立志要献身于社会斗争。

是的，阿连德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1932年，阿连德大学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本来，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然而，他深切感受到，作为一个医生，即便是最优秀的医生也只能解除少数患者的痛苦，而无法去医治一个社会的弊端——贫穷、饥饿、不平等。他毅然弃医从政，改造社会。

在现代社会，要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就需凭借政党的力量，否则，即使个人有天大的本领也是难以办到的。1933年4月19日，阿连德与其他几位志同道合者把曾经支持社会主义政府的五个党派——统一社会党、马克思主义社会党、共和社会党、国际社会党和劳工党——合并，创建了智利社会党。

和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一样，阿连德的社会党充分地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结社自由、普选——为社会党、为自己创造了将来执政的条件。

阿连德说过：“我的政治生涯是在瓦尔帕来索开始的。”的确如此，他最初参政就是以瓦尔帕来索选出的众议院议员而开始的，在以后的几十年宦海生涯里，他出任过卫生部长、参议院院长，他曾几度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但名落孙山。

既然选定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那么就一定要在宦海中搏击，直到达到目的。1970年，阿连德作为5个党的联盟——人民行动阵线（后改为人民联盟）的共同候选人，再一次参加总统竞选，终于挫败对手，当选为总统。

阿连德执政后十分自豪地说，我们的革命，是按照智利的历史、走智利的道路进行的。我们的道路是通过民主、多党制和自由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他还向全世界宣告：“智利今天是地球上第一个负有使命要树立第二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样式的国家。要树立第一个按民主的、多元性的和自由的样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阿连德的言行和他领导的社会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事实，在全世界、在国际共运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震动。

《世界报》评论说：“在智利，马克思主义有史以来第一次舒舒服服地坐上了以前一直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独享的宝座。”

苏联共产党则称赞阿连德政府是“通过宪法途径取得政权的典型”，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样板。”在社会主义世界史上创建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法国的一家左翼杂志上则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枪炮的革命》的文章，高度评价阿连德执政在国际共运史的地位和影响。

的确，谁也不能否认阿连德上台执政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创造了一个利用资产阶级选举制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的先例。

然而，谁也不会相信，智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异常艰难、曲折的，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便夭折了，喜剧变成了悲剧。

悲剧，从这里开始

一般来说职位不会自动地给他带来职位所规定的权力，他的权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在分掌各种权力的官员所形成的“最高掌权层”中服从他的官员的人数；

第二，“最高掌权层”中服从他的官员对他的服从程度。

如果我们从这两条标准来衡量作为总统的阿连德，那末，其总统权力极为有限。

阿连德当选总统并不意味着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和信任。1970年9月大选的结果，人民联盟候选人阿连德虽然获得的选票位居首位，但只占总票数的36.3%，没有超过半数。右派国民党35%，以基督教民主党为代表的中间派占28%，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势力占据绝对优势。根据智利宪法，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由议会在得票数最多的两名候选人中（另一名是国民党的候选人亚历山德里）推选出总统。

人民联盟为了取得基督教民主党支持阿连德当选为总统，不得不同基督教民主党订立了一个妥协性的协议。协议规定，即将成立的阿连德政府的一切

活动必须严格限制在宪法范围内，不得违反宪法的任何条文，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关于军队问题。协议规定，阿连德政府必须“尊重军队和国家警察的原有体制和等级制度，……不建立同军队和国家警察相平行的武装组织。”

按照上述协议的规定，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阿连德总统不得不去遵循他所反对的资产阶级宪法，作为社会主义的政府，智利国家政权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三权分立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阿连德政府充其量只是掌握了行政权。

11月4日，阿连德总统神采奕奕，在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宣誓就任智利新总统。新内阁中的各部部长、省长、郡长、大使、各重要国家机关的行政领导职务基本上都是由人民联盟中的人士担任，但左派进步力量并没有真正掌握国家大权，实际上是大权旁落。

资产阶级不仅控制了军队，而且还牢牢地掌握了立法、司法大权。1970年9月，智利议会上下两院的力量对比分别是：上院共50个席位，执政党及其支持党拥有23席，在野党27席；下院共有150个席位，执政党占有57席，在野党93席，十分明显，阿连德的社会党及其人民联盟在议会中处于劣势。换句话说，总统的任何提案只要触犯资产者的利益就有极大的可能遭到否决而成为一纸空文，最高法院及地方法院也都由反对派控制。新闻媒介方面，反对派的势力也大大超过政府控制的宣传力量。反对派控制了全国广播网的2/3和1/2的电视网，其报刊发行量则为2.5倍，朝野的抨击、漫骂之声淹没了阿连德政府改革的号角。

阿连德就职不久，右派分子就导演了一幕蔑视总统权威的挑衅闹剧：

支持、同情阿连德政府的智利陆军总司令雷尔·施奈德将军被暗杀，而最高法院却不顾法律尊严“彻底取消”对这起有预谋的暗杀事件的全部审讯，让凶手公然逍遥法外；纺织业的巨头为了抵制国有化政策，竟然用炸弹炸毁工厂，但智利的检察长对此都置若罔闻，说是“不感兴趣”；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军官公开怂恿庄园主打死土改官员，非但没有受到国法军纪的处分，反而被提升为将军；电台、广播、报刊可以大张旗鼓地同政府的政策唱对台戏，尽情发挥“新闻自由”；阿连德总统及其家属的生命甚至也得不到国家机器的保护。阿连德说：“在一次袭击我家的时候，只有一名警察在门口警卫，他也没有得到可以开枪的命令，那批进行袭击的暴徒人数又很多，所以我不得不出来开枪把他们吓跑。”

一个得不到司法、立法支持、配合的政府，一个得不到大多数人拥护的政治体制、一个处于动荡不安的社会，一个连自身安全都难以保证的总统，很难想象会存在多久，更不用说大有作为可悲的是，阿连德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所处环境的险恶，在没有真正地、完全地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去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革。

走向社会主义

“我们斗争的目标是改变政权，改变制度。我们设法组成一个政府是为了夺取权力来实现智利所需要的革命改造，摆脱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工会等方面的依赖性。”这是阿连德在竞选总统期间向广大选民许下的诺言。

为了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为了实现自己青年时代的伟大理想，为了在智利建成世界上“第一个以民主、多元化和自由为样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阿连德一上台，就开展了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国有化和土改运动。

阿连德把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看成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道和首要手段。他说：“一旦铜矿、钢铁、硝石矿都真正在我们控制之下，一旦我们实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土地措施，一旦我们通过国家控制了全国进出口，一旦我们把国民生产大部分集体化了，那时候，我们手中就有了真正的政权。……确认我们的国家主权，拿回我们的基本财富和向垄断进攻——假如说这些事不能导向社会主义，那么，我真不知道哪些才算是导向社会主义的了。”

阿连德决心依靠总统的权力来实现这些目标。

在国有化方面，他在现行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接管了一些“管理不当”的企业，把包括智利最大的纺织厂在内的纺织、煤炭、钢铁、硝石等工业以及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家装备工厂，收归国有。1970年12月，执政才个把月的阿连德就提出了关于把铜矿等基本矿藏实行国有化的宪法修改草案。规定对收归国有的铜矿，在扣除折旧费和1955年以来所得的超额利润以后给予赔偿费，在30年内付清。随后，阿连德总统宣布接管控制了智利经济命脉的塞罗、安那康达、肯奈科特三家外资铜矿公司。这一行动被认为是智利的“第二次独立”。此外，还通过收购的办法买下美国财团安格洛——劳塔罗硝石公司在智利化学和矿业股份公司中的全部股份，把智利最大的洛塔——施瓦格煤矿等本国私营矿业改为国营。

在土地改革上加速进程。阿连德政府把征收土地的最高限额从前任政府规定的80公顷压到40公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征收了1100多个大庄园，建立了众多的国营或集体农场。他在1971年的拉美农民会议上自豪地宣称，1972年智利将不存在一个大地主。

阿连德在1971年11月4日的庆祝人民联盟执政一周年大会上，十分自豪地总结了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的伟大成绩：“国家已经控制了90%的私人银行，70多个垄断企业或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已被征收、接管、征用或实行国有化。国家征收了共240万公顷的1300个庄园。”

为了改变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现实，为了实现真正平等的社会，阿连德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工的收入分配政策和其他福利措施。他把工人的最低工资提高50%，职工薪金提高30%，实行免费医疗，免费供应300万儿童和孕妇每天半公升牛奶；充分吸收工人就业，就业率达到5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扩建住宅，建房面积1971年是1970年20倍。

对这些卓著的成绩，阿连德有点飘飘然。真不愧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把上述措施和取得的成绩概括为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他说：

我认为我们采用了开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那些改革，我们宣称，我这样说绝非自夸，我们正在闯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而且我们正在证明，实行基本变革、从而铺平通向革命的道路，这办法是行得通的。……人们显然可以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些改革而已，但是，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意味着我们要实现革命，那就是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又进一步意味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闯出的一条不同道路的社会主义，是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但是，社会主义的建成和发展并不像阿连德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阿连德驾驶的具有智利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巨轮将会而且一定会遭受惊涛骇浪的冲击，遇到数不清的暗礁险滩。稍有不慎，就会船沉人亡，无法到达胜利的彼岸。

危机已来临

谁也不能否认阿连德政府改革的成就和他本人对社会和人民的真诚；同样，谁也不能否认阿连德政府的失误和他本人的幼稚。正当阿连德还陶醉在改革的成就与“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之中时，一场席卷全国、针对政府的深刻危机已经来临。

事情往往是这样：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阿连德的改革也不例外。由于政府改革政策的失误，由于国内反对派的抵制，由于智利国情的制约，阿连德政府的改革导致了阿连德本人作梦也料想不到的后果。

——国有化使经济效益愈加低下。阿连德为加强对国有化企业的控制，向这些企业派驻了政治代表和政工人员。这些人缺乏专业知识，不善企业管理。而外国公司和原企业主则暗中破坏，抵制国有化。有的抽走资金，有的怂恿工程技术人员外流，有的破坏机器设备。于是国有化企业生产秩序混乱，经济效益低下。阿连德执政后的1973年，智利的工业产量已经下降了50%，只及1970年的一半。

——土地改革操之过急，许多中小农场主对土改的对抗情绪日益增强，农业生产连年下降，农产品异常匮乏。那时，在智利的一些大城市，你可以每天看见男女老少排起长队等待购买农副产品的现象。这时候的阿连德以及社会党还迷信政治宣传的作用，试图用“丰富的精神”来取代——至少是补充“贫乏的物质”。阿连德呼吁人民要有信心度过难关从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社会党的妇女委员会甚至号召该党所有妇女停止吃牛肉以节省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阿连德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让人民群众一时得到实惠，感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受到了他们的普遍欢迎。但是，这是一种短期行为。通俗地说，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社会福利下的生活改善，是以压缩生产投资为代价、靠举借和通货膨胀进行再分配的。市场繁荣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成为一团五彩的泡沫，不用几时便化为乌有。到阿连德执政的第三个年头，通货膨胀率高达508.1%，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人们把起先得到的实惠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而把一切的不满都发泄在阿连德政府以及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上。

——智利的社会主义“主人”也不同程度地加入到抗议政府的行列。1973年4月在反对派的煽动下，铜矿工人罢工达两个半月之久。7月，卡车司机举行罢工，全国70%的运输停顿，工业生产中断，使国家蒙受了一亿多美元的巨大损失。他们还向首都进军，修筑工事，冲击总统府，向政府施加压力。大中小学生因不满政府一再推迟开学日期也上街游行。素来温驯、贤良的家庭主妇敲着空锅上街游行，随后不久农民、商人、医护人员、教师也举行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与此同时，恐怖活动猖獗。

罢工、罢市、罢课与恐怖活动使智利全国陷入一片混乱。

反对派兴风作浪，利用政府的困难和失误，煽动、组织罢工、示威、策划军人政变。

在此危急的时刻，政府内阁和人民联盟内部不是团结一心，共度难关，而是相互指责，争吵不休。左派将阿连德对罢工的适度抑制说成是右倾，右派认为是左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内阁部长全体辞职。

面对如此混乱的秩序，如此危急的政府。阿连德心急如焚，染上重病，

卧床不起近半个月。他此时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智利的社会主义道路能走到底吗？

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反对派的进攻、内阁的辞职并未能使处于危机四伏的阿连德政府彻底崩溃。给他致命一击的是奉行“中立”的军队。

中立与仲裁

在动荡多变、政变频繁的拉美，唯有智利是以民主传统著称的。其中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智利的军队保持了 30 多年来不干预政治的传统。

当阿连德这位社会主义者合法地当选为智利总统时，军队、警察这支 6 万多人的队伍宣誓效忠宪法和政府，一如既往地保持中立。正是因为有了这支强有力的力量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人民联盟和阿连德才得以顺利地、和平地获得了政权，开辟了阿连德引以为自豪的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的成功的尝试。也正因为这一点，阿连德迷信智利军队是“忠于宪法”的，是“忠于公民投票意志”的，他们是“穿军装的人民”。在他看来，“始终不渝”坚持“中立”立场的军队是社会的安全阀，社会主义政治的保护神，总统的忠实卫兵。不知是对军人的感激还是笼络军队，阿连德在政治上和物质上给予军人优厚待遇，亲自访问兵营。他从第一天起，不论做什么，必须用一只眼睛盯住军队，猜测乃至迎合它的意向，尽量不触犯它，不使它疏远自己，更不用说在军队中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的洗脑工作和必要人事调动。

的确，在智利，军人有着不干预政治的传统，它仅仅只是作为防止内讧、混乱和保证国家安全的职能。同时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社会秩序保卫者的第一个职能，军队又获得了第二个职能——仲裁者。在政治党派、政府无法稳定和控制混乱局势的时刻，他们就要站出来有责任也有力量干预政治，平息“内乱”。

然而，军队不过问政治、不干涉政治和保卫宪法的传统，只有在资产阶级制度的“规则玩弄把戏”时才会得以遵守。智利军队当然不会去推翻弗雷或亚历山大的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只要出现了取代资产阶级统治的苗头，所谓不会干涉政治的传统就会被抛弃，毫不犹豫地将社会主义的幼苗连根拔掉，智利的军队也不例外。

由于智利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合作交流关系，智利军官基本上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思想和价值观念。他们把阿连德看成是外来异端思想——马克思主义在智利的再现。因此，无论是从思想意识、感情或利益上，军人与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政府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不仅如此，发动这次军事政变的将领一方面与智利国内的右翼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 1972 年 9 月，极右派组织“祖国与自由”的成员伙同军队中的一批军人一起企图以武力推翻阿连德而代之的一个由在押犯、前陆军领导人维奥为首的军政府；另一方面，又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保持密切联系。作为美国，当然决不愿看到它的后院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阿连德的悲剧就在于他未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十分严重后果。

持续不断的罢工狂潮和军人的骚动，阿连德政府已无力控制混乱的局势。此时他只能求助军队，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来维持现政府。8 月上旬，阿连德邀请陆、海、空三军司令参加内阁分管内政、矿业及交通这三个不安定的部，号称“国家安全内阁”。但这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相反，军队作为中立的却又是一支最有势力的政治力量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而成为智利

的仲裁者。

由于阿连德与“国家安全内阁”意见相左，由于激进的陆军司令、内政部长普拉茨在军队中处于孤立地位，“国家安全内阁”仅存在十几天就宣布总辞职。这表明，阿连德已经失去了军队的支持。

以后，智利的经济混乱和政治危机犹如脱缰的野马而愈加难以控制，食品奇缺、交通中断、工厂停工……都交织在一起。反对派在全国发起了一个要求阿连德辞职的签名运动。可以说阿连德此时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处境。

作为仲裁者的军队决定以武力收拾残局。一位高级军官表示，“一旦政党人士办法用尽，军队将发挥它的力量”。军队内部开始清洗同情、支持阿连德的军官。极右分子、原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皮诺切特取代普拉茨这位正直的老将军成为陆军总司令。反动军官完全控制了整个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反对党的头面人物频繁地与高级军官接触，秘密制订推翻阿连德的军事政变计划，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取得进一步联系，这正中美国人的下怀。中央情报局在征得五角大楼的同意后，开始执行代号为“肯塔夫尔”的行动计划，1880多名智利军官在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国军事训练中心利克堡接受特别训练，积极配合。美国大使也在政变前两天飞回华盛顿，在得到白宫的明确指示后又迅速返回圣地亚哥。”

经过高级军官和美国制造政变的专家的反复论证、策划，一致认为军队完全有能力推翻阿连德并可以通过武力控制局势。他们把发动军事政变攻打总统府拉莫内达的日期定在9月11日。

军队迅速向圣地亚哥集结待命，反政府的传单和军队即将接管政权的宣传品到处可见，一场蓄谋已久的推翻阿连德政府的军事政变即将开始。

以身殉职，血洒总统府

1973年9月11日，这一悲壮的日子终于来临。

这天清晨，政变部队首先进攻与首都邻近的海港城市瓦尔帕来索——这里是阿连德的故乡及政治生涯的起点。6点20分，阿连德总统在他的私人寓所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当他惊悉叛乱的海军已攻占瓦尔帕来索，就立即要通了国防部的电话，命令国防部长莱特列尔立即通知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加强首都的警备力量，派兵前去镇压叛乱。然而，此时，这位总司令不是去执行宣誓效忠的总统的命令，而是正在指挥部队向首都圣地亚哥推进，包围总统府。

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为慎重起见，阿连德总统带着他的私人卫队23人，携带23支自动步枪、2挺机关枪、3门火箭筒，乘坐4辆汽车于7时30分赶到总统府。他拿起电话，朝焦急万分、为他的命运担忧的妻子说道：“亲爱的，形势是严峻的，但并不绝望。虽然海军背叛了我，但我相信仍有足够的部队来控制局势。我们会很快在一起的。”

接着，阿连德就海军叛乱向全国发表了第一次广播讲话。他希望人们保持冷静，提醒他们采取各种必要的手段保卫工厂、商店和农场。

8时15分，他又通过电台重申了上述声明。刚刚离开麦克风，身边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我奉命通知您，总统先生，由三军司令和警察局长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要求您辞职。空军参谋长冯·朔文将军已经为您准备了一架飞机，为您和您的家人去愿意去的任何国家提供一切方便。”

这是总统空军侍从武官的声音。

阿连德对着暗红色的话筒愤怒地喊道：“你去转告冯·朔文将军，智利总统决不会逃跑。他知道怎样履行一个战士的职责，坚守总统岗位。”

8时30分，军事政府委员会向全国发布公告，勒令阿连德总统立即辞职，把政权交给军队和警察。

阿连德再次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谴责政变。

“公民们，政变和要求我辞职是非法的，我对智利和它未来充满信心！人们将会克服叛乱带来的阴谋和痛苦。你们知道，很快将会开辟出一条道路，自由的人将通过它去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我决心用一切能用的手段进行抵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留下一个教训，使那些只使用武力而没有道理的人遗臭万年！”

阿连德站在他熟悉的麦克风前，最后高呼，“智利万岁！人民万岁！劳动者万岁！”

生死的考验已经来临，阿连德讲话完毕后，立即召集了一次会议。

他头戴钢盔、身穿便装，右手提着一挺轻机枪对决定留下保卫总统的20多人说：“现在，拉莫内达宫的保卫战就要开始了，但这仅仅是开端，历史的第二页应当由智利人民和所有的拉美人来书写。女士们，反法西斯的战斗不需要无谓的牺牲，外面将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你们应该离开总统府。这是命令。”

有几位妇女和没有战斗经历的人要求留下来，与总统府共存亡，决不逃跑。正当他们争执的时候，战斗打响了，叛军用轻武器对总统府进行了20分钟的警告性扫射。

皮诺切特通过电话再次要求阿连德辞职、投降。阿连德坚决地回答说：“我决不投降，不离开总统府一步。你们从这里搬出去的只能是我的尸体，叛徒，来吧！”

利用停战的间隙，阿连德立即、强迫性地把一切妇女——包括他的两个女儿送出了总统府，并对他女儿说：“转告你们的母亲，我已抱着必死的决心。为了智利人民，为了社会主义。你们要生存下去，不管遇多大的困难继承我未尽的事业。”

皮诺切特向阿连德发出最后通牒：如不立即投降，就轰炸拉莫内达宫，回答叛军的是愤怒的子弹。

10时30分，叛军开始向总统府发动猛烈进攻。两架霍克——猎人式飞机开始对总统府狂轰滥炸。坦克炮像雨点般倾泻在这幢古老而神圣的大楼。顿时，总统府成了一片火海。

面对叛军穷凶极恶的进攻，阿连德不愧有过军人的生活，不愧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毫不惊慌失措，指挥狙击，并亲自扛起火箭筒朝坦克射击。

在阿连德总统私人卫队的殊死狙击下，叛军未能前进一步。

无计可施的皮诺切特只得呼吁停火，与阿连德谈判。条件仍然是投降，让一条生路，阿连德断然拒绝。很快，战斗又打响了。

保卫总统府的战士已牺牲过半。下午1时45分，叛军在猛烈的炮火和坦克掩护下终于攻占了总统府一楼，并封锁了所有的出口。

政变军官要阿连德在10分钟内缴械投降。时间快到时，阿连德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你们还年轻，放下武器，向军队投降。”在大家沉默不语，不愿离开时，阿连德又说：“执行命令，我最后一个出去。”

当叛军士兵狂叫着冲上二楼时，他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阿连德总统

身佩总统绶带，端坐在他曾在此日理万机的办公椅上。殷红的鲜血已染遍了全身。

原来，这位宁死不屈的总统，用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古巴总统卡斯特罗赠送给他的手枪朝自己的前额开枪自杀了。阿连德至死也不离开他的战斗岗位。

举世哀悼

智利政变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对于阿连德总统的不幸遇难深表哀悼。

对于这样一位宁死不屈的政治家，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这样一位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情感并访问过中国的老朋友，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对他的遇难深感悲痛，在给阿连德夫人及家属的信中说：

“ 遥悉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至深悲愤。谨向你们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慰问。

伟大的阿连德总统生前为了智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以及促进中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团结反帝事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他的高尚愿望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相信智利人民将从这一沉痛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继续前进。”

流亡在中国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则发表声明说：

“ 对智利民族的伟大领袖、为社会正义、自由和进步而斗争的智利人民的坚强不屈的英雄，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三世界人民的英雄战友萨·阿连德总统的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波多黎各独立党主席贝里斯奥说：

“ 在阿连德总统死后，我们西半球失去了一位伟人和一位争取波多黎各独立的最坚定和不屈不挠的朋友。” 古巴总统卡斯特罗高度赞扬了阿连德及其战友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

“ 40个人在7小时内抗击了炮兵主力、坦克、飞机和法西斯步兵。历史上很少写过这样的英雄主义的篇章。……阿连德总统集中体现了智利人民的爱国主义、勇敢精神和战斗性的精华。”

拉美、欧洲的国家人民自发地走上街头，强烈谴责政变者的卑鄙和法西斯行径，悼念阿连德总统。

随着阿连德总统的遇难，智利的社会主义被政变者的屠刀划上了一个带血的圆圆的句号。

政变中夺权，政变中失权 (1973—1979年阿富汗)

历史上，阿富汗的政局就像它的气候一样，变幻莫测、云谲波诡。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短短的6年里，政变迭起，内讧不断，终于引狼入室，狼烟遍地。

总统全家葬身地下室

1973年7月，国王查希尔丢下繁忙的国事，忙里偷闲，飞到欧洲度假。

正当国王陪着王妃们饱览名胜古迹，游兴未尽之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不知从哪冒了出来，给他送来一个不好的消息：苏联的一位制造政变的专家，克格勃少将已秘密抵达喀布尔。据分析，他们正在与首相达乌德策划一起政变，推翻国王查希尔的统治。

国王查希尔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信息半信半疑。

“达乌德乃皇亲国戚，我的表兄弟，还不至于到不顾手足之情、相互残杀的地步。美国人也不是好东西。这是否是美国佬设下的离间之计呢？”

躺在席梦思上的国王反复推敲着，一点睡意也没有。

“总是自家人，况且谁敢在这个有着250年历史的皇帝统治传统的国家废黜国王呢？”查希尔国王此时给了自己的安慰，宁肯信其无不肯信其有。

可怜的查希尔国王，您太天真了，政治是残酷无情的，为了权力，父子都可以相互残杀，何况兄弟呢？

7月17日，达乌德在一批少壮军官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忠于国王的人被杀了个片甲不留，查希尔国王被废黜，成立阿富汗共和国，自任国家主席兼总理。1977年正式就任阿富汗第一任总统。

在苏联支持下发动政变上台的达乌德如何对待苏联的“援助”？是否进一步加深阿苏的“友谊”？这是决定达乌德命运的大事。

早在20年代，阿富汗在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就得到了苏俄的支持。独立后，苏联通过“援助”，基本上控制了阿富汗的经济，为了维护这种既得利益，为了抢占这个战略要地，苏联力图培养一个与它“紧密合作”、“相互信任”的政府。

达乌德上台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苏联人看来简直是忘恩负义，在军队和情报系统中进行大清洗，竟然把那些亲苏的党、政、军的官员换得一个不剩，然后与伊朗、巴斯坦、美国、西欧打得火热。阿苏“友谊”非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在削弱。

这还了得！俄国人对此大为恼火。最高领导层责怪克格勃没有鉴别“朋友”与“敌人”的能力，打乱了苏联的全球争霸计划。克格勃更是火冒三丈，大骂达乌德不识抬举。

“既然能帮你搞政变，同样也能帮别人搞你的政变？克格勃的核心人物开始向行动小组发布指令。

达乌德注定要成为第二个查希尔。

为了加强控制，达乌德在国内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打击在政变上台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民民主党，最后终于下令把它解散。

人民民主党成立于1965年1月，可以说是苏联支持的产物，党的纲领主张当然是非常马克思主义的，即“通过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该党不仅在思想上与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保持一致，而且在行动和

感情上忠于苏联。1967年因争权夺利而分裂成两大派，一派以卡尔迈勒为首，称“旗帜派”，另一派则以塔拉基为首，称“人民派”。人民派侧重于在军队中活动，而旗帜派则主要在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扩大影响。

当一向把阿富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苏联日益感到达乌德政权的离心倾向时，便决心把人民派和旗帜派撮合起来，共同对付达乌德。1977年10月，在印度新德里，在苏联人的参与下两派会晤，决定抛弃前嫌，实现组织的联合，由人民派首领塔拉基担任政治局主席，成为党的领袖，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则在政治局中占据了一半职位，从此开始了推翻达乌德总统政变密谋。

1978年2月，危机四伏的达乌德政权内开始了又一次大清洗，一些中、左派人士遭到撤职和逮捕。4月17日，在达乌德的指使下，达乌德的待工人员暗杀了旗帜派的重要人物卡比尔。人民民主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达乌德的活动，于19日在首都喀布尔组织了有1.5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抬尸示威游行。达乌德闻讯暴跳如雷，下令镇压，大肆逮捕。26日塔拉基等人民民主党7个主要领导人和200多名参加示威游行的陆军军官相继被捕入狱。

形势紧急，决不可坐以待毙，人民民主党临时决定提前动手。然而，政变的军事指挥官，人民派领袖之一阿明却在家中遭到软禁，无法与部队取得联系。

在这危急关头，军队中的人民民主党党员发挥极大作用。1978年4月27日上午，在人民派军官空军上校卡迪尔、第四装甲旅瓦坦贾尔少将和第十五装甲旅马吉德少校的直接指挥下，率领坦克部队开出驻地，向首都喀布尔进发，从苏联进口的T—59坦克发出的隆隆声震撼了旷野。

这么大的军事行动，达乌德总统难道一无所知？

达乌德立即打电话到情报部，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情报部官员回答说，装甲部队正在举行实战演习。

达乌德放心地放下了电话，又去寻欢作乐。他哪里知道，他的情报部都被苏联克格勃和人民民主党控制，耳目失灵，在他们的蒙蔽之下，达乌德总统和国防部长拉索里直到坦克部队已逼近喀布尔市郊，才得到确切消息，感到大难临头。

拉索里立即离开了正在举行的内阁会议的会议厅，乘车去国防部组织部队进行抵抗，他一路催促司机：“快，再快点！”欲速则不达。忙乱之中汽车撞倒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拉索里受了重伤，动弹不得。

中午，坦克先头部队抢占了电台、国防部、内政部等要害部门，随后包围了总统府。

达乌德亲自指挥1800多名总统府卫队士兵，凭借精良的装备和有利地形拚死抵抗，双方相持不下。

正在胜败难分之时，喀布尔市郊的巴格拉姆机场的空军中队赶到，支援政变军队，由于总统府高炮电子设备早已被克格勃和人民民主党的特工破坏而失灵，使总统卫队在米格飞机的攻击下迅速失去了主动。米格战斗机低空扫射，卫队无力还击，很快政变部队攻克总统府。

走投无路的达乌德率全家30多口人躲藏在地下室。隐身之地很快被发现。一位政变军官来到地下室门口，劝达乌德缴械投降，已经杀红了眼的达乌德高呼决不投降，并开枪将这名劝降的军官击毙。政变的军人怒不可遏，抬来一挺重机枪，朝地下室内猛烈扫射。结果，达乌德全家除一孙女幸免外，

全部被打死。

政变的硝烟未散，阿富汗各地卫戍部队相继宣布效忠新政权，政变成功。由苏联支持的塔拉基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总理，卡尔迈勒任副主席兼副总理，阿明任第二副总理兼外长，卡迪尔上校任国防部长，改国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四月政变后，塔拉基按照苏联的指示和人民民主党的纲领开始在阿富汗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整个阿富汗都处在象征着革命的红色海洋之中。从此以后，苏联也更进一步地深深地卷入阿富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泥坑之中而不能自拔。

5月9日，塔拉基发表30点施政纲领，声称要在阿富汗进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包括社会生活和国家机构的民主化，进行土地改革，鼓励和指导工业和中小企业的私人投资，发展同各友好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争取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外援等等。

塔拉基并没有诚心去兑现他所许下的诺言和实现党的纲领，而是陷入了党内的派别斗争之中，重蹈达乌德的覆辙，死于非命。

画虎不成反类犬

共同的敌人达乌德被打倒了，人民民主党内两派之间的激烈的权力斗争也就开始了。

用卑鄙的手段夺得政权，必定是用更加卑鄙、残酷的手段来维护政权，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和权力学的常识。

塔拉基也毫不例外。

夺得政权仅3个月以后，塔拉基就开始进行大清洗。7月他伙同阿明把“旗帜派的领袖卡尔迈勒——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副总理打发到国外，担任大使。8月，又把在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国防部部长卡迪尔和陆军参谋长沙普尔少将逮捕起来，自己兼任国防部长。其他一些旗帜派头面人物或被关押，或被逼往国外。

塔拉基还嫌不够，总感到还有人与他作对，他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国内人民的反抗，大肆镇压前政府高级官员、王室家族、宗教部族势力，取缔在野的一切政党，甚至连中下级官员和工厂车间主任也大批加以撤换，他为了表示自己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甚至毫无人性地当着教徒的面枪杀宗教人士。在塔拉基统治一年多的时间，有40万人遭到屠杀，50万难民流入巴斯坦和伊朗，7万名政治犯被关押，其中2.2万人被处决。塔拉基对外追随苏联，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执政后不到8个月，便访问苏联，同勃列日涅夫签订了《阿苏友好睦邻合作条约》，规定：“双方将为保障两国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磋商，并经双方同意后采取相应措施”，“为了加强缔约双方的防御能力，双方将在他们缔结的相应的协定的基础上发展军事领域内的合作。”条约签订后，大批苏联顾问、专家和军事人员涌入阿富汗，控制了塔拉基政府和军队。

曾于1975年至1979年11月领导驻阿富汗苏联军事顾问工作的尼古拉耶维奇中将回忆说：

根据1978年苏联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两国政府签定的协议，在阿军队中有相当数量的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他们分布在军队所有的部门，包括团一级，这些人忠实勇敢地履行自己的军人职责。但在步兵团中只有2至3名苏联顾问，因此当阿军官内部意见不一致，而又有许多人公开反对人民政权，反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时候，我们的顾问必须马上设立团级进修班，培养

来自人民的专家及下级军官，同时还要扩充2至3个步兵师。有了苏联的保护伞，塔拉基以为高枕无忧。实际上，死神正在向他招手。

旗帜派被清除了，人民派内部的窝里斗开始了。

塔拉基最强劲的对手就是他的学生阿明。阿明出身于普什图即帕坦族的一个官宦之家，两次留学美国，博学多闻，是一个十分阴险、毒辣的政客。一介武夫塔拉基根本不是他这位“高足”的对手，阿明利用塔拉基强烈的多疑心理，把旗帜派一个个从军队、政府中赶走，又利用他容易上当的弱点和“师生情谊”的特殊关系，又夺得了政府总理和国防部长的职位，控制了军政大权，塔拉基虽然仍是党的领袖、第一把手，而实际上阿明已成了手握实权的“铁腕人物”。

大权在握的阿明开始打击和削弱其昔日“伟大导师”塔拉基，两人矛盾日趋激化，一场新的政变不可避免。

苏联此时对阿富汗局势焦急万分，它最后决定要发挥“友好国家”和“顾问”的作用，帮助塔拉基这位苏联的“亲密朋友”和“合作者”除掉阿明以稳定政局。

1979年9月10日，塔拉基应邀“访问”苏联，勃列日涅夫同他密谈，告诉他说：“有人企图把他推下台”。暗示塔拉基要先下手。塔拉基回国后，要求内阁辞职，要阿明交出兵权，这无疑是打草惊蛇。阿明不得不更加提高警惕。

明的不行，就来暗的，9月14日，塔拉斯一反过去的骄横语气，很温和、亲切地打电话，说要召见阿明共商大事。阿明感到这是一个“鸿门宴”，凶多吉少。他借口身体欠佳。不愿前往。在塔拉基办公室的苏联大使普扎诺夫抓过塔拉基电话说：“总理阁下不必多虑，我以一个大和共产党员的身份保证，你的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阿明想，既然俄国人也在，塔拉基还不至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外国人面前对我怎么样，为了以防不测，他带了8个卫兵乘防弹轿车来到总统府。

与往常不一样，阿明故意走在卫兵的后边。他们刚跨进大门便遭到伏击。8名卫兵当场被击毙。阿明一看大事不妙，就地一滚，躲进车内，只身驾车急速逃回国防部。

逃回大本营，阿明惊魂未定，大骂塔拉基、俄国佬翻脸不认人，竟然合伙暗算。你不仁我不义，阿明迅速调集了所有的亲信嫡系部队向总统府发起猛烈攻击，同时切断总统府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塔拉基在战斗中被乱枪打死。

9月16日，喀布尔电台宣布塔拉基由于健康原因辞职。阿明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人民民主党总书记。

随即，阿明开始在军队、政府中逮捕塔拉基的亲信，其中包括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瓦坦扎尔、邮电部长古良布单伊、边境事务部长马兹杜里雅尔、安全事务部长谢尔瓦里、第八空降兵团、炮团、第八空降兵独立坦克营的指挥官以及第四、第十五坦克旅参谋长。

10月10日，阿富汗通讯社报道：据清晨广播和电视消息，塔拉基总统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0月9日不幸逝世，根据他生前的要求，其遗体被葬在他家族墓地之中。

阿富汗的动荡还未停止，血腥的斗争还在后头。

外来的“手术”

阿明上台使苏联大为吃惊，莫斯科在政变两天后才报道了塔拉基“辞职”

和新政府上台的消息。苏联领导人尽管不喜欢阿明，但是木已成舟，无可奈何，还是发了贺电予以“支持”，苏联电视台称呼阿明是“苏联的一个忠实的朋友”。但实际上，双方的矛盾开始激化了。

阿明对苏联支持塔拉基谋杀自己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上台后决心要报复一下俄国佬，他坚决要求莫斯科召回苏联驻阿大使普萨诺夫，让他们撤回驻在阿富汗的几千名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他还亲飞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里大发雷霆，向苏联摊牌。

苏联对阿明的作法感到非常不满，而阿富汗国内的政局更令俄国佬不安。阿富汗东部地区的库纳尔的一些武装穆斯林组织认为喀布尔政权是苏联的傀儡。他们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纷纷揭竿而起，袭击政府军和苏联的军事顾问，阿明上台后，反政府武装组织更为活跃，得到进一步壮大，在哈查拉贾德地区建立了“伊斯兰统一革命委员会”，反苏的烈火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到处燃烧。

苏联为了进一步控制阿富汗，推行南下政策，遂决心除掉桀骜不驯的阿明，重新换人替它看守这块战略要地。

为了稳住阿明，苏联满足了阿明的要求，派去新大使，签署了几项“互不干涉内政”、“相互援助”的协定。苏联内务部长访问阿富汗也受到了“热烈欢迎”。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苏联麻痹阿明、作换马准备的把戏而已。在一片“热烈”“亲善”的背后则潜伏着杀机。

12月上中旬。苏联在苏阿边境一带调兵遣将，在靠近伏龙芝、塔什干、撒马尔罕，费尔干纳等地集结了5个现代化师的兵力，同时利用夜幕向喀布尔市郊悄悄运进便衣苏军1万多人和价值10亿美元的作战武器。这一偷偷摸摸的军事行动被美国情报局的特工发现，并在西方报刊上予以披露。苏联人立即指天发誓，《真理报》在12月23日奉命辟谣，声称关于苏联派作战部队到阿富汗的说法是“不折不扣的臆造”。是在苏阿人民关系中“播下不信任的有毒种子”，是帝国主义“离间”他们的“朋友关系”，希望阿富汗人民保持警惕，决不能上当受骗。真是说得斩钉截铁，一点也不含糊。

时隔一天，从12月25日开始，突然间莫斯科在苏联、阿富汗之间搭起了“一座巨大的空中桥梁”，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进行紧急“大规模空运”。苏联大型运输机以每分钟两架次的速度，两天之内至少作了150—200次穿梭空运，飞机在卸货时引擎保持转动，卸完货立即起飞。运进喀布尔机场的是穿着厚卡其布大衣的几千名与阿富汗人肤色和长相类似的来自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的苏联士兵，以及大批重型和轻型坦克、装甲运兵车、重炮、武装直升飞机、多管火箭筒、卡车和各种武器弹药。

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寻找借口，当然最好是“光明正大”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正像23年前出兵匈牙利帮助镇压“反革命暴乱”一样。

这个“神圣”的使命交给了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维克多·帕普金中将。

帕普金是个老牌秘密警察。据报道，在70年代掌管苏联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国的间谍网。在制造政变和获取情报中，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政绩”突出。在他52岁时就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苏联老年人统治的标准说来，他是年轻得志。

不愧为情报老手，帕普金一来到喀布尔，就秘密地把八九十名情报和军事人员安插在阿富汗的各个关键部门。接着又借口“安全上的原因”以更好地保护阿明，把阿明的住所、办公室及家人从座落在市中心的“人民之家”

搬到了郊外离苏联大使馆只有一英里的达鲁拉曼宫，完全处在苏联的“保护”之下。

一切安排就绪。

12月26日晚上，帕普金带着十几名卫兵来到王宫，会见“老朋友”阿明。

刚一落座，帕普金就劝说阿明“正式邀请”“伟大的战无不胜”的苏联红军前往阿富汗“剿匪”，发扬苏联国际共产主义的“光荣传统”。

不知哪来的勇气，阿明不仅对帕普金的劝说置之不理，而且反唇相讥，他要苏联履行诺言，把军事顾问全部撤走。他说，至于阿富汗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则是阿富汗的内部事务，阿富汗政府军有足够的力量剿灭他们。毋须苏联红军的援助。

帕普金一听，大为恼火，大骂阿明治国无为，忘恩负义，并威胁说，敬酒不吃吃罚酒。

正当他们争吵之时，帕普金的助手似乎在腰间掏什么。站在阿明背后的卫兵飞快地从宽大的长衬衣下抽出瑞典造的“欣达”微型冲锋枪，对准帕普金和他的三名助手就是一梭子，把他们全部撂倒在地。

在楼下等候帕普金的几位卫兵一听见枪声便与阿明的警卫交上了火。刚在还是平静的王宫，突然间枪声骤起。帕普金的大部分卫兵被打死，只有一两个人带伤逃回在喀布尔的苏联总部。

如梦初醒的阿明，方知闯下大祸，苏联人肯定会报复。

出乎阿明意料之外的是，事情刚过，苏联大使主动来见他，一开口便深表歉意，说帕普金的所为纯属个人所为，绝不代表苏联政府和本大使的意思，他死有余辜，并恳请阿明不必多虑。苏阿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阿明被弄糊涂了。

第二天，即12月27日晚7时，夜幕刚刚降临，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惊慌了正在达鲁拉曼宫开会的阿明。阿富汗中央电报局大楼被炸，一切通讯中断。

与此同时，贝洛诺夫上校亲自带领12辆T—62型坦克、10辆步兵战车、5辆装甲运输车、120名训练有素的士兵朝达鲁拉曼宫奔袭过来。

达鲁拉曼宫高高的混凝土围墙被坦克滑膛炮的炮弹击中，炸开了一个大洞。120名突击队员迅速包围了王宫。坐在坦克里的贝洛诺夫对阿明下了最后通牒，限阿明3小时内投降。

阿明严正拒绝，表示决不投降，战斗到底。他和卫队长指挥警卫人员凭借有利的地形和工事，顽强地打败了苏联红军的进攻。

贝洛诺夫眼看久攻不下，发疯般地命令用全部重型武器实施炸射，他还调来轰炸机，成吨的炸药倾泻在王宫，大约半个小时后，这座华丽的黄色宫殿转眼间已是一片瓦砾。到处都是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和残破的枪械。

一切都沉寂下来。

贝洛诺夫率领士兵冲进王宫，在一片废墟中，发现了阿明的尸体。据报道，阿明的4个妻子、24个子女和政府的一些重要官员也在袭击中被打死，约有250名士兵战死。

在进攻王宫的同时，其他两支苏联红军经过激战也占领了内政部、电视台和陆军司令部。随后的大部队控制了喀布尔其他战略要地。

12月28日，苏联中亚的塔什干电台，用一个接近喀布尔电台的频率播

送了卡尔迈勒的讲话，宣布成立阿富汗最高革命委员会，卡尔迈勒本人在政变以后多天由苏联用飞机送回阿富汗。

从此以后，苏联军队大规模入侵阿富汗，开始了阿富汗历史上最动荡、最惨烈的时期。

总理走向绞刑架 (1977年7月5日巴基斯坦)

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杰拉尔德·A·希格曾这样评价说：“布托是巴基斯坦政治史上一个无与伦比的领袖。”

谁也不会相信，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却惨死在绞刑架下。

临危受命

1928年元月5日，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出生在信德省拉卡纳地区塔尔扎公馆，父亲是位有名的政治家、开明地主。1950年，22岁的布托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系毕业，1952年获得英国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同年通过权威的伦敦林肯法学院的考试，取得高级律师资格，被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聘任为国际法学讲师。回国后，在卡拉奇穆斯林法学院任宪法讲师，并从事律师业。1957年，年方28岁的布托就作为巴基斯坦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大会。1958年，他作为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率领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国际海洋法会议，他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为他才独立10年的祖国赢得了尊严，同时也成为巴基斯坦政坛最年轻有为的人物。1958年10月，刚过而立之年的布托任阿尤布·汗政府的商业部长。以后他先后担任过少数民族事务部长、国家建设部长、新闻部长、燃料、电力和天然资源部长、克什米尔事务部长，尤其在60年代第二次印巴战争期间出任外交部长，显示了杰出的才华，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为和平解决印巴纷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60年代后期，巴基斯坦内忧外患，动荡不安。

1969年3月25日，无法控制局势的阿尤布·汗宣布把权力和平地移交陆军司令叶海亚·汗。叶海亚接任总统后，宣布废除宪法，解散国民会议，实行军事管制。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叶海亚只得恢复政党活动。1970年12月7日举行全国大选，以穆吉布为主席的人民同盟（1949年成立）和布托创建的人民党（1967年12月成立）获胜。

然而，这两大党未能就召开国民议会和组织联邦政府等重大问题达成协议。人民同盟决定与政府分道扬镳，1971年3月6日，穆吉布宣布接管东巴全部行政权。在印度政府支持下，3月26日，东巴宣布独立。对于这种分裂国家的行为，叶海亚采取了严厉的军事镇压手段，逮捕了穆吉布，取缔人民联盟。东巴局势紧张，一部分逃到印度的人民联盟成员宣布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同年11月21日，印度军队在苏联的支持下，借口“难民问题”从西、东、北三面，分十路大规模入侵东巴基斯坦，不久又把战火烧到西巴，承认孟加拉国，并不顾联合国的停火决议占领了达卡。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在联合国安理会干预下，双方停火，同时，巴基斯坦政治发生严重危机。在这强敌压境，国内动荡的危机关头，十分明智的叶海亚把总统和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的职务交给布托，让他来收拾烂摊子，支撑残局。

这真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在既存事实的情况下，布托审时度势，力排众议，释放穆吉布，穆吉布返回达卡，正式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并就任第一任总统。1972年7月3日，印度总理英·甘地和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在西姆拉举行会晤，两位领导人化干戈为玉帛，签订了《西姆拉协定》，正式结束了1971年以来的战争状态。

1974年4月，印度政府遣返巴基斯坦最后一批战俘，解决了第三次印巴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

布托终于为年轻的巴基斯坦赢得了和平。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信徒”

早在1968年9月21日，布托在海德拉巴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让我的人民去判断》的热情洋溢的讲话：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信徒，这就是我为什么舍弃我的阶级和政府而回到工人、农民、学生和穷人中来的原因。除了爱，我还能从我那被剥夺的人民那里得到什么呢？我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因为我知道只有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才能使人民得救、获得进步和幸福。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在巴基斯坦建立起这种提倡真理、正义、平等和人类尊严的制度。

这位留学英美、受西方文明教育的硕士决心在一个宗教的国度实行社会主义。

60年代后期，他作为阿尤布政府的外交部长一方面恪尽职守，为阿尤布政府的外交困境打开局面；另一方也毫不妥协地猛烈抨击阿尤布政府的经济政策，明确提出全面经济改革的主张，并发动一场反阿尤布的运动。

布托认为，阿尤布政府是通过奖励私营企业家大量掠夺经济的办法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本家们把公款作为其冒险事业的资金，他们利用了大量的外汇分配，利用税收低，利用政府对于舞弊行为的容忍态度，利用对工会的镇压，等等。他分析说，其结果，这是一种虚伪的进步；国民经济仍然虚弱不堪，缺乏重工业，没有发展先进的技术。更糟的是，已经取得的发展，使巴基斯坦社会上的不平等加剧到了如此地步，以致巴基斯坦人的生活水准普遍下降，贪污盛行。

布托坚信，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救巴基斯坦。他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发展工业所需要的一切基本手段收归国有，但并不反对私营企业合理的存在与发展，他还许诺进行劳动改革，实现公费医疗、教育改革和消灭“封建制度”和“地主所有制”。

布托还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同伊斯兰教有机地统一起来，即“伊斯兰教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一定是同巴基斯坦的文化准则和宗教传统相对立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社会主义应该有也可能有多种模式。他相信社会主义就是能够适应巴基斯坦文化传统的。他解释说，主要的社会主义准则——平等主义和禁止剥削——同样也是伊斯兰教的准则。他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形势》一文中写道：

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原则不是互不相容的。伊斯兰教讲平等，而社会主义是达到平等的新方法。……没有伊斯兰教的最高权力，巴基斯坦就维持不下去。社会主义的政府并不对抗这个最高权力。相反地，社会主义将会使全体居民都成为伊斯兰教准则的守护人。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杰出的领袖，正是因为具有引吸力的社会主义纲领——尽管它不是我们所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成立才仅仅3年的人民党在1970年的大选中成为巴基斯坦第二大党。

1971年，当他在叶海亚手中接过国家大权时，布托决心运用权力在巴基斯坦实行社会主义，进行经济改革。

上台仅仅几天后，布托就颁布经济改革法令，把22个家族的22家公司收归国有，其中包括钢铁、重型机器制造、水泥、电力、石油、化工、采矿、

船舶、公共运输和公用事业等。1974年1月，宣布把银行、保险和航运等企业实行国有化。1976年7月，又把轧花、碾米和面粉三大农产品加工工业国有化，外贸也由国家垄断，从而使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为实行计划经济创造了条件。

1972年3月11日，布托宣布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和地主所有制。他进一步发展阿尤布执政时期土地改革的成果。新土地法规定地主拥有土地面积的限额，水浇地从500英亩减少到150英亩，旱地从1000英亩减至300英亩；超过限额的土地一律没收，无偿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农民分得的土地免缴地价；禁止地主驱赶佃农。

布托的土地改革遭到了封建势力的抵制，人民党内部一部分人也对土改不满，土地改革没有达到“消灭地主所有制”的目的。

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布托也进行了旨在巩固政权的政治改革，1973年4月10日，巴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改行议会制，结束了军管，布托由总统改任总理。他大量撤换了高级军事部门和高级行政部门的官员，代之以人民党的骨干，布托还通过党组织有效地控制各省和地方基层政权。于是乎，在巴基斯坦，党的作用无处不在，成为真正的执政党。

到1977年，布托首届任期已满。他宣布他仍接受人民对他的选择。

山雨欲来风满楼

依照宪法，布托宣布，1977年3月7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3月10日举行省议会选举，竞选国民议会216个席位和460个省议席。

在国民议会的竞选角逐中，同人民党竞争的有9个反对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伊斯兰促进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巴基斯坦伊斯兰教神学者协会、团结运动党、巴基斯坦民主党、民族民主党、贱民运动党和查谟克什米尔穆斯林会议，它们联合组成“巴基斯坦全国联盟”推选马哈茂德为主席、巴杰瓦为总书记、与人民党决一雌雄。

布托在民族危机中表现出来了非凡能力和捍卫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在执政5年期间所实行的改革，作为执政党的某些有利条件，人民党在国民议会的竞选中，获得216席中的179席，布托再次出任总理。

人民党胜利了！

然而，这是一次引向死亡的胜利。

大选结果一公布，立即引起反对党“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的抗议，它们不承认选举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指责人民党在选举中舞弊，并宣布抵制3月10日的省议会选举，在全国举行总罢工。3月12日，布托总理向全国发表电视广播讲话，宣布国民议会选举问题已经解决，他同反对党只能讨论其他问题。全国联盟则针锋相对，号召支持者在全国开展抗议运动。

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动荡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4月9日，旁遮普省议员举行宣誓仪式，全国联盟组织了向省议会大厦的抗议示威，警察与示威群众发生了流血冲突。以后，抗议运动迅速波及其他城市。

为了稳定政局，布托让步了，他表示可以考虑重新省议会选举，并答应如果反对党在40个省议会获得多数就重新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反对党寸步不让，坚持首先要求布托辞职，而后重新举行国民议会和省议会选举，主张由军队监督选举，并拒绝同布托进行谈判。

简直是得寸进尺、欺人太甚。

4月21日，布托以总理身份，下令对动乱最剧烈的卡拉奇、海德拉巴和拉合尔实行军事管制。并拘留反对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

4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三军参谋长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政府。

在实行强硬措施的同时，布托也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4月的最后一周，布托政府把被拘留的全国联盟领导人集中在距拉瓦尔品第不远的西哈拉招待所。允许在外的反对党领导人前来商讨。

为了打破僵局，促进问题的解决，布托亲自会见马哈茂德，主张以国家利益为重，相互谦让。两大党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和沙特阿拉伯国的斡旋，6月3日开始举行谈判，就重新选举等问题初步达成了协议：政府原则上同意举行新的选举，巴盟则放弃要布托总理辞职的要求，为了表示诚意，政府方面释放了在押的巴盟领导人及其支持者、取消军事管制；巴盟方面则呼吁其支持者停止举行公众集会和游行示威，放弃成立看守政府的要求。双方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

7月3日，总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和各军司令到总理官邸，表示军队坚持支持布托，军队忠诚政府。这对于已焦头烂额的布托来说，无异是一针兴奋剂。

7月4日，精神焕发的布托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人民党同巴盟已于7月2日就重新选举、选举日期和成立选举机构等11点内容达成协议，只是尚未最后签字生效。

连续几个月来的紧张局势终于缓和下来。

风云突变

1977年7月5日零晨1点多，刚刚主持完内阁会议的布托疲倦地回到家，几个月的示威、游行、冲突已搞得他精疲力尽。真该好好地睡一觉，布托想。

就在刚上床还未入睡时，一场在夜幕掩盖下的卑鄙的军事政变正在悄悄地进行着。

拉瓦尔品第的大街上，军车正一辆辆地急驶而过，电台、机场、主要道路被封锁，戒备森严。与此同时，军队开始包围总理官邸。

一位忠于布托的警察冒死来到总理官邸报警。

“快告诉布托先生，军队正前来捕杀他！快藏起来，快！”这位警察急促地对布托的贴身男仆说。

男仆一听惊呆了，不顾礼义赶忙敲门叫醒了布托，把这一凶讯告诉了主人。并催促布托赶快逃走或藏起来。

布托显得十分地平静，说：“我的生命掌握在真主手中。如果军队要杀我，那么，让他们杀吧！躲藏与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让他们来吧！”接着，他朝这位忠心耿耿的男仆挥了挥手，“去吧，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过来。”说完，布托整理好衣服，等待着厄运的降临。

凌晨2时整，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闯进总理官邸，为首的军官走到布托面前，说道：“布托先生，我们奉命逮捕您。”

半小时后，巴基斯坦电台报道：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接管了政府，解散了国民议会，并对巴基斯坦人民党全部领导人包括布托总理实行拘留。电台同时宣布：军方成立了由三军司令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齐亚·哈克为军政府的首脑。

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政变的领导人正是前两天向布托表忠心的齐亚·哈克将军。

对于发动这次政变，齐亚·哈克解释说，他原先“并未打算介入布托总理和反对派长达4个月的纠纷，但作为最后的手段，采取了行动。”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他重甲，他本人决没有篡权的野心，“就我来说，这是90天的事情，”军事管制只保持3个月，目的是要在今后3个月里为选举奠定应有的基础，希望10月举行的大选不会导致布托的支持者和反对派之间的冲突。

军人政权显示了其强硬的力量，释放被布托拘押的反对党领导人，在动荡的两个省实行军管，禁止公众集会、罢工、工会活动、任何性质的政治活动和展示政党的党旗。齐亚·哈克说，所有这一切非常措施都是为了10月份的正常选举得以顺利、公正地举行。“我们都是穆斯林，人人都应该努力工作，我们的责任是拯救巴基斯坦，为巴基斯坦而努力工作。”

人们相信了齐亚·哈克所许下的在10月份举行“公正和自由的选举”的诺言。因为哈克将军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不喝酒不吸烟，一天祈祷5次。

被捕后，布托被拘留在距首都以北60公里的避暑胜地穆里山的总统别墅里，在被拘押的23天里，他被允许会见其他人民党的领导人，为参加10月重新大选做准备。他表示要重新参加竞选，“解决民族危机的钥匙仍然在我的手里”。同时他又强调“不论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都是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解决巴基斯坦危机要依靠巴基斯坦的千百万劳苦大众”。

7月24日，乔杜里总统发布正式命令，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来安排将在10月份举行的新的全国选举。齐亚·哈克也在一次全国广播中说，被禁止的政治活动从8月1日到9月中旬将在有限的基础上恢复，在这期间仍允许政界领导人讨论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党，讨论党的宣言以及他们的选举计划。从9月中旬到选举时为止，他们将可以进行充分的竞选活动。齐亚还宣布，被拘留的前总理布托、他的7个前内阁同事和反对党巴盟的8个领导人将于一两天后释放，不再受军事拘留。

7月28日，布托和其他15位政治家获释出狱。

三进牢房

沉闷了个把月的巴基斯坦，随着大选的临近又热闹起来。

出狱后的布托立即投入了准备竞选的繁忙工作。

他在回到家乡拉卡纳的沿途，受到成千上万人的热烈欢迎。他的父老乡亲更是欣喜甚至是狂热地迎接这位游子的平安归来。

8月19日，布托在人民党的支持下决定正式报名参加10月18日的大选。

近一月的监禁并没有使布托失去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相反，人民比以往更加坚定地支持、拥护他。据观察家分析，他有极大的可能再次竞选获胜。有一位西方记者曾访问齐亚·哈克说，如果布托参加竞选并且获胜，对他会怎么样？齐亚·哈克十分诙谐地回答：“他就当总理，我当陆军参谋长。我将比以前更利索地向他敬礼”。

政治的最大秘诀就是欺骗。

正当布托满怀信心地进行竞选的准备工作时，一场对布托和其他人民党党员的“人格暗杀”已经展开。

布托被反对党指控犯有以下罪行。

谋杀、绑架反对党主要领导人；接受国外军火商贿赂达200万美元，叛国……

齐亚·哈克以公正的面目出现，表示，尽管他个人十分欢迎布托参加竞选，但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他必须放弃感情。

9月3日上午，布托在海滨克利夫顿郊区的家中再次被捕，被关押在一所特别的监狱。与此同时，其他几位主要的人民党领袖也被以各种罪名逮捕。

布托的再次被捕，激起了他的支持者的抗议，但遭到了镇压。

与此相反的，巴盟及其支持者们则在卡拉奇散发糖果，以示庆祝布托被捕。

人民党决定营救自己的领袖。扎曼这位誉满全巴基斯坦的律师，决定为布托辩护，并代表他向拉合尔高等法院提出了保释申请。前财政部长皮尔扎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人民党已经安排好了要为所有被起诉的人民党党员进行法律辩护。

布托也希望到法庭去为自己昭雪。他说，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名誉和尊严比当选或落选更重要。

扎曼以其雄辩的口才、铁的事实；在交付了一大笔保释金后，布托终于在9月13日获得保释出狱，期限为10天。

布托暂时的自由，对于他参加即将来到的大选竞选是至关重要的，布托自己也抱有胜利的信心，但有人透露，齐亚·哈克曾私下对一名记者说，尽管他保证给予人民党和巴盟双方以平等的机会，但是他不希望布托和他的党重新掌权。因此，有分析家认为，尽管布托现在被保释出狱，但很可能不久又要重进监狱，只要他和他的政党在竞选中处于优势。

果然不出所料，9月17日，距开始竞选只有两天的时候，军方根据军管条例第三次逮捕了布托和坚持支持他的10名前政府的重要官员和人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并交军事法庭审理。对于这种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行为，齐亚·哈克将军解释说：“可以让这些领导人在面对选民之前，先弄清是有罪还是清白的人，以期毫不拖延地进行审讯，在选举以前对他们的案子作出判决。”并声称，唯这样才能对选民负责、对民主负责、对国家负责。

布托的这次被逮捕，使他和他的党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蒙受重大损失。在领袖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人民党不屈不挠、坚持斗争，选出新的领导机构，他的夫人努斯拉特·布托当选为人民党代理主席，不久，人民党宣布布托为该党终身主席。

9月19日，巴基斯坦人民党在拉瓦尔品第举行了第一次竞选集会，数10万人聚集在雅卡特公园。主席台上悬挂着布托的画像，人们群情激昂，高呼“布托万岁”、“布托是我们的领袖”、“布托必胜”、“释放布托”等口号。

人民党在许多竞选集会上猛烈抨击齐亚·哈克的卑鄙行径和罪恶阴谋。布托的首席律师前检察总长叶海亚·巴赫蒂亚尔指责齐亚·哈克是为了不让布托进行竞选而把他逮捕的。巴赫蒂亚尔认为，在巴基斯坦第一大党的主席和一些主要领导人被监禁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的，他尖锐地指出：“现在很明显，由于这位将军没有做到使舆论反对人民党和它的主席，他无论如何也不打算实现他说过的把权力移交给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的诺言了。”

布托夫人则更加明确地指出，逮捕布托是一个阴谋，目的是不让他参加10月份的大选。她对支持者们说：“关闭选举大门就会打开革命的大门”。

尽管布托身陷囹圄，但他和他的人民党在刚刚开始竞选运动中明显处于优势。

黔驴技穷的齐亚·哈克终于原形毕露了：

——齐亚·哈克宣布，禁止定了罪的候选人参加竞选。这在巴基斯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按照以往法律，一个政治活动家即使关在监狱也有资格参加竞选。这项决定就意味着布托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也被剥夺了竞选的资格，在政治上给他判了死刑。

——军管当局警告布托夫人，要她停止“煽动人民进行暴力活动”，并对她及女儿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实行软禁。——借口制止内乱、稳定团结，宣布不定期推迟大选，解散所有政党，禁止一切政治性的集会和游行，实行新闻检查，加强军事管制。

一个独夫民贼的凶恶嘴脸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布托不除，心无宁日。齐亚·哈克不顾社会压力和法律的尊严、神圣，决心置布托于死地。1978年3月18日，巴基斯坦拉合尔高等法院以“政治谋杀”罪判处布托绞刑。次年2月6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驳回布托的申诉，以法官投票裁决的奇异方式维持了对布托判处死刑的原判。

与此同时，军管当局还逮捕了数千名布托追随者。其中包括他的夫人和女儿。

布托这位留学欧美的法学硕士、高级律师在强权和暴力面前，在被曲解的法律面前，也无法挽救自己的生命。

巴基斯坦处在一片恐怖之中。

SOS

当一个人处于生命极端危险的时刻，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向人们发出求救的信号SOS(SalveOurSouls)。布托只得向国际社会主持正义的人们求救。他写了封情感真挚的信给他的朋友、法国总统德斯坦，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亲爱的总统：

在死牢里，我无法把手伸出坚实的铁栏之外，否则，我早已向您致意，并表示热烈的祝贺了，对于您的关心，在我死生未卜的情况下，我的血将滋补次大陆上的男女青年，如同肥料养育着春日里无比秀丽的法国玫瑰一样。

从15岁起，我就为自由而斗争，不屈不挠。我曾和尼赫鲁与真纳并肩行动。我见过戴高乐，他仪表非凡。毛泽东以其对我表示的敬重给予我荣誉。在我的身上，政治、诗歌和浪漫的幻想揉为一体了。我纯真的爱情之中，

最为炫丽者乃是我与人民的爱情。对我来说，人民的力量并非一句政治口号，而是永不枯竭的信仰。即使西方自私的短视与东方盲目的野心——如同超级大国所体现的那样——将人类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人民将在大屠杀的灰烬中再生，且益加强大。美丽的世界是如此宏大，致使它不会在一场败者丧生，胜者奄奄的格斗中灰飞烟灭，总会留下点东西，这足够了。有朝一日，它将重放光彩，如花似锦。

所以说，总统先生，倘若我得以生存，我将继续战斗，犹如沙场中央的斗牛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在我蒙难期间，我的家人经受了令人不可容忍的痛苦。这是我受迫害给我带来的唯一真正悲伤。我希望，我儿子米尔·古兰姆·穆尔塔扎并没因其过重的孝心而过多地占用了您宝贵的时间。对于监狱深有了解的我的女儿不久前曾在一班飞机上与您的特使不期而遇。对他提出的关于本地区所发生之变化的问题，我想回答说，首先应使巴基斯坦免于国内的动乱，然后再去考虑对付外来的威胁，不管是久已存在的威胁，还是新近出现的威胁，或者新旧汇合的威胁。

您了解我对贵国的热爱和对您本人的欣赏。人类在呼吁更大的公正，如果我活下来了，无疑我们将分享这一呼吁得到满足的荣誉。如果我不免一死，我在此向您道别，同时祈祷比我强大的人去完成解救我国人民于可怕的贫困与苦难之中的战斗。我，一个“杀人犯”，对您，不敢以“朋友”相称。虽如此，我仍请您向尊夫人转达我的敬意以及我对令郎亨利的钟爱。

谨致深厚的友爱之情。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

1978年7月30日于拉瓦尔品第狱中当布托被判处绞刑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国家首脑或政界人士，纷纷致电或发表声明，呼吁巴基斯坦当局重新考虑对布托的判决。

从巴基斯坦分裂出去的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主席拉齐博士在一项声明中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和世界各国领导人阻止巴基斯坦对布托执行死刑。他说：“这样的处罚不容于文明人类的良心”。该国的其他一些政界著名人士联合发表声明，对于把这位在1971年拯救了巴基斯坦的前总理判处死刑表示不安。

斯里兰卡前总统班达拉奈夫人以个人的名义和以斯里兰卡自由党主席的身份打电报给巴基斯坦总统说，我们斯里兰卡人获悉布托先生被判处绞刑的消息深感震惊，布托先生在促进巴基斯坦同斯里兰卡的友谊方面一向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呼吁取消布托的死刑。

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致函巴基斯坦总统和齐亚·哈克将军，呼吁停止执行对布托的判处并予以减刑。

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也对布托伸出救援的双手，多次呼吁赦免布托先生，认为布托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为中巴友谊做出过贡献。

加拿大众议院一致通过一项提案，呼吁对布托实行减刑，同时也应对被处以死刑的布托先生的同事“采取宽恕的办法”。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打电报给乔杜里总统，表示关心布托的命运，呼吁对布托的案件“以人道主义”理由予以宽大。同时，上百名示威者聚集在联合国总部对面，希望让美国总统卡特这位人权外交的领导人 and 瓦尔德海姆秘书长采取行动，以拯救布托的生命。

大赦国际从伦敦发生呼吁，要求巴基斯坦军管当局允许外国观察员参加布托对死刑的上诉。

还有不少国家的首脑如美国总统卡特、法国总统德斯坦、英国首相卡拉汉、瑞典首相乌尔斯滕、挪威首相努尔等分别致电致函巴基斯坦元首或军管当局，要求实行宽恕，保全布托生命，免于一死。

一个小国的领袖的命运引起各国首脑的关注和担心，这在人权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人类的良知对于卑鄙的人来说一文不值。齐亚·哈克面对这么多国家首脑为人道主义而发出的布托减刑宽大的呼吁，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他说：“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劝告，我们最好下台。”在良心与权力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1979年4月3日，被关押的努斯拉特·布托母女被送到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同布托见最后一面。

人间最悲惨的莫过于生离死别。布托的爱女贝·布托在《东方女儿》一书中，动情地描写了这一永别的情景：

“你们俩怎么都来了？”父亲从他地狱般的牢房里问我们。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他问。我母亲不忍心回答。

“我想是。”我说。

他把站在旁边的监狱长叫过来。“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吗？”父亲问他。

“是的。”监狱长回答。

“日子定了吗？”

“明天早上。”狱长说。

“几点？”

“按照监狱的规矩是5点。”

“你什么时候得到通知的？”

“昨天晚上。”他迟缓地说。我父亲看看他。“我可以跟家属在一起多长时间？”

“半小时。”

“按照监狱的规定，我们可以有一小时。”父亲说。“半个小时。”狱长又重复了一遍，“这是我的命令。”

“安排一下，要让我有时间洗个澡，刮刮胡子。”父亲告诉他，“世界是美好的，我要干干净净地离开。”他坐在铺在地上的席子上，这席子是牢房里唯一的陈设。牢房里的桌子、椅子、床都被搬走了。“把这些都拿去吧。”“我的书不想让他们来沾手。”父亲说。

死牢里灯光昏暗，我看不清他。过去每次见面，他们都是让我们到他的牢里面去，一起坐着，今天却不让了。母亲和我一起挤在车门的栏杆上悄悄地跟他说话。“把我的爱带给其他几个孩子吧。”他对妈妈说。“告诉米尔、胜尼和沙阿，我曾努力要做一个好爸爸，并且希望能够向他们说一声再见。”母亲说不出话来，只是不住地点头。“你们俩都受了很多苦。”他说，“今晚他们就要把我杀了。我想你们也能得到自由了。如果你们愿意。在宪法终止和军法管制的情况下，你们可以离开巴基斯坦。如果你们想得到思想上的安宁，你们也许会要到欧洲去。我允许你们去，可以去。”

我们的心碎了，“不，不！”

妈妈说：“我们不能走，永远也不走”。

“到时间了，到时间了！”狱长喊道。

我紧紧地抓住栏杆，我要求他，“请把牢门打开，我要跟爸爸告别！”狱长拒绝了我的要求。“行行好”！我说，“我父亲是选出来的巴基斯坦总理，我是他的女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了，我要拥抱他。”狱长还是拒绝我的要求。我把手伸到栏杆里去够我父亲。他瘦极了，疟疾、痢疾和饥饿耗尽了他的身体。但是他抓住栏杆站了起来，抚摸着我的头。

“今晚我就自由了。”父亲说，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我就要跟父亲、母亲在一起了。我就要回到我的先辈在拉卡纳的那个地方去，变成它的泥土、芳香和空气的一部分。我的周围将有歌声。我将成为它的传奇的一部分。”父亲哭了，并说，“只是在拉卡纳很热。”我抑制自己说，“我会给你搭个凉棚的。”

“再见了，爸爸！”我对着爸爸喊着，妈妈又抓着栏杆去够爸爸。我们走了，走到满地尘土的院子里。我真想再回头来看一眼，但是不能了，因为我也不能控制自己了。

4月4日凌晨，死神终于降临了。布托双手反缚，在警察的押送下，走出牢门，伴随着《古兰经》的诵读声，步往绞刑台。当罪恶无情的绞索套在

他的脖子上时，他抬头望了望这黎明前黑暗的天空，大声喊道：“天哪！救救我吧，因为我是无罪的人！”

遇难时，他才 51 岁。世人无不为之感到震惊、遗憾和痛惜。

布托的爱女贝·布托在他遇难不久被释放。出狱后她继承父亲的未竟的事业，继续领导人民党为民主和正义而斗争。1981 年再度被捕入狱。直到 84 年 1 月因病保外就医，流亡英国。1985 年 12 月齐亚·哈克被迫取消军管法，贝·布托旋即于 86 年 4 月回到祖国。

1988 年 5 月，齐亚·哈克宣布举行 11 年来的首次大选。多行不义必自毙。8 月齐亚·哈克死于飞机爆炸，死无葬身之地。

人民把对前总理布托的崇敬与怀念寄托在他的女儿身上。在 11 月的大选中。人民党获胜。12 月 2 日，贝·布托正式宣誓就任巴基斯坦总理。那年，她年仅 35 岁，成为有史以来伊斯兰国家中的第一位女首脑。92 年，她东山再起再度出任总理。

布托在天之灵有知，当该含笑九泉。

太子港不太平 (1991年9月30日海地)

楔子

清凉的海风吹拂着夜色朦朦的海地首都太子港。时至深夜，万籁俱寂，挣扎了一天的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突然，刺耳的枪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从睡梦中惊醒的人们习惯而又本能地警觉到这个被动荡折磨得筋疲力尽的西半球上贫困的岛国又发生了政变。

1991年9月29日，星期天深夜，太子港东郊兵营。

身着戎装的阿利克斯·席尔瓦上校满脸杀气，凶狠的目光扫视着列队整齐、全副武装的50名士兵。他正进行政变前的鼓动：“士兵们！决定我们命运的伟大时刻来到了。半年多来，我们的将军被撤换，我们的地位在降低，我们的要求遭拒绝，我们的荣誉受践踏。这是何人所为？戴着蛤蟆镜的神父阿里斯蒂德。他猜疑、分化我们，组建了一支曾压迫我们的法国人卫队来对付我们。士可杀不可辱！我们怎么办？”

说到这，席尔瓦举起手枪，狂然一吼：

“拿起武器，送他去见上帝”。

席尔瓦上校的鼓动，使本来早已怨气冲天的士兵顿时群情激昂，一个个挥动着粗黑的手臂，低沉叫喊：“战斗！战斗！”战斗！上校发出狞狰、得意的狂笑，威严地下达了命令：

目标：总统官邸。出发。

这位神父是谁？军人为何发动政变？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神父理想的破灭

这位神父总统便是1991年2月7日宣誓就职的民选文人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

1953年7月15日，阿里斯蒂德出生于贫穷落后而又动荡不安的海地。他在海地大学攻读心理学，勤奋刻苦，天资聪颖，获得了硕士学位。在这个文盲率高达90%的国家里，阿里斯蒂德算是出类拔萃之辈了。他目睹海地人民在杜瓦利埃的残暴统治下的悲惨生活，真希望有一个救民于水火的万能上帝。他决定去寻找主，去寻找上帝。1979年他远涉重洋，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来到了耶和华的诞生地以色列攻读《圣经》学。流年似水，阿里斯蒂德在以色列度过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1982年他学成归来，献身神学，把上帝的博爱和仁慈洒向苦难的人间，唤起恶者的良知，激起百姓的觉悟。阿里斯蒂德深入穷乡僻壤和城镇的贫民窟传教布道。渊博的知识、生动的布道、正义的品德和深切的同情心，他赢得了广大城市贫民和农村穷苦农民的爱戴和拥护。1982年6月，阿里斯蒂德担任了神父之职。在传教期间他深深地体验到了人民的苦难、政治的黑暗。他从理想的天国回到了残酷的现实。

人间地狱

海地，你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啊！

海地，在历史上曾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最初登陆的所在地和在拉美民族解放运动中建立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而闻名于世。这个美丽、富饶的岛国并没有给予她的子民们安宁和幸福。她历遭劫难，先后沦为西班牙、法国的殖民地，经过300多年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1804年获得独立。整整1个世纪之后又被新崛起的美国武装占领了19年，倍遭蹂躏。1957

年在美国的扶持下，弗朗索瓦·杜瓦利埃这位受过美国现代教育的医学博士建立了中世纪的野蛮的家族独裁统治，海地又陷入了另一个深渊，变成了人间地狱。者杜瓦利埃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组织了一支由信奉伏都教的教民组成的卫队“通顿马库特”，意为“吃人魔王”，将触角伸展到每个角落，残害无辜。1971年老杜瓦利埃竟然修改宪法，要把终身总统之位传给他尚未成年的儿子让-克洛德·杜瓦利埃。几个月之后，者杜瓦利埃一命呜呼，未及弱冠之年的小杜瓦利埃父死子袭，“合法”地成为杜瓦利埃家族第二代海地统治者。

小杜瓦利埃虽然乳臭未干，但统治的手段比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残暴、更狡猾。他为了终身执政，竟然打着“民主选举”的幌子，派出一批又一批大卡车满载着雇佣来的文盲愚昧的“选民”循环多次到各地投票站进行口头投票。结果可想而知，小杜瓦利埃以 99.98% 的几乎全票“合法”地当选连任“终身总统”。这真是对“民主政治”的莫大践踏和玷污。

在杜瓦利埃家族统治下，海地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通顿马库特”这支名义上叫做“民兵”的看家狗，多达 14000 余人，比正规军还多 1 倍。几十年来在海地无恶不作、草菅人命，连正规军也怕它三分。杜瓦利埃还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学习文化知识，不准群众集会结社议论国事，甚至三五成群散步走路都会遭到怀疑和迫害。据说有一次，“通顿马库特”发现几个人在一家咖啡馆所谓“聚会”，并查抄出所谓“共产党宣传品”，当场就把这几个人活活打死，并吊到电线杆上示众。他们镇压反对派，残害民主进步人士。在杜瓦利埃家族的残暴统治下，有 40000 多人因莫须有的罪名横遭迫害，被投入阴暗潮湿的牢房。如果加上贫病交迫而死，以及逃离本国而葬身鱼腹者，死于暴政的则有几十万人之多，接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伴随着暴政的便是贫穷。这个美丽富饶的岛国现在沦为拉美最贫穷的国家。在海地，每 100 个劳动者就有 75 个失业和半失业；每 10 个应该受教育的人就有 9 个目不识丁；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年均收入不到 150 美元，已是贫困中的贫困了。在城市，贫民窟遍布；在农村，背井离乡的人流不断。一位外国记者曾十分形象地描述说：“大多数海地人每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充饥之物和饮水”。

暴政和腐败总是对孪生。杜瓦利埃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纵情挥霍，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据披露，小杜瓦利埃结婚的费用高达 300 万美元，仅燃放花炮一项就耗费了 10 万美元，这令全世界的亿万富翁也目叹弗如。他的妻子密歇莉更是奢侈之极。她经常到美国和欧洲旅游，就像去庭院散步一样。每次又必购数不尽的时装、珠宝和艺术品。尽管海地鸿季高温，她竟为了赶时髦，不惜重金买了不少名贵的皮大衣，真不知这位贵妇如何向人炫耀。

仁慈的上帝也决不会宽容杜瓦利埃这个万恶不赦的魔鬼。

杜氏王朝的覆灭

人民在呻吟，在流血、在受难；阿里斯蒂德在沉思，在同情、在愤恨。既然万能的上帝不能把芸芸众生救出苦海，那末自己就做普罗米修斯，把光明和幸福带给人间，让加勒比海岛国走向民主与昌盛。

坚定的信念化成了无畏的行动。阿里斯蒂德通过传教布道向广大的民众揭露杜瓦利埃的残暴，抨击政府的黑暗，号召人民觉悟起来，推翻暴政。他被海地人民誉为“反独裁英雄”。

多行不义必自毙。杜瓦利埃的末日已经来到。

青年学生历来被人们看成是社会的良心、民主的先锋。1985年11月28日，位于西海岸的戈纳伊夫市发生学生示威游行，警察开枪镇压。3名学生中弹身亡。学生的鲜血、当局的残暴激怒了早已仇恨满腔的人民。各地学生罢课游行，抗议当局的暴行。在西南部的一些城市，示威群众高呼反政府口号，封锁道路，烧毁政府大楼。在首都太子港，反饥饿、反贫困的传单像雪片一样抛散。

杜瓦利埃惊慌了。他一面下令要军队“严厉镇压全国各种形式的示威”，颁布戒严令；另一方面为了平息众怒，释放了一些政治犯。他还玩弄“牺牲车卒、保护主帅”的把戏，解散为人痛恨的政治警察。然而更大规模的示威在全国展开。太子港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罢课。在海地第二大城市海地角，全城60%以上的居民参加了反暴斗争。在其他一些中小城市，人们也自发地走上街头。愤怒的示威群众高举着画有空棺材的标语牌，上面写着：“让一克洛德·杜瓦利埃，这就是你的归宿”。

在戒严令发布后，阿里斯蒂德冒着生命危险奔波于各地教堂，利用星期日布道和做弥撒的机会，呼吁人民不畏强暴，坚持斗争。与此同时，其他反对派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要求废除总统终身制，立即举行大选，恢复立法机构，总统辞职。墨西哥报纸评论说，这在杜瓦利埃家族统治海地28年的历史上从未见过。

杜瓦利埃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喊打声中，自知罪不容诛，大势已去，只得向希腊、瑞士、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提出避难要求，均遭拒绝，以致于在诺大的地球上竟无立足之地。谁还会收养这只凶恶的丧家之犬？2月7日凌晨46分，杜瓦利埃和他的家人乘坐美国为他提供的一架空军C-141号运输机仓惶逃离他统治了15年的国家，到达法国位于阿尔卑斯山冰雪覆盖、风景如画的塔罗伊雷小镇，度过了流亡生活的第一天。法国外交部说：“为了帮助实现海地人民所期望的向民主的过渡，为了避免出现严重的麻烦，法国同美国合作，决定允许杜瓦利埃在前往另一个国家之前先来法国”。

杜氏王朝覆灭了。

独裁的幽灵仍在游荡

许多善良、正义的人们希望海地人民从此获得自由并逐步走向民主、幸福。然而，海地的前途未卜，坎坷曲折。一位旅墨海地教授佩雷先生预言，专制、独裁并没有随杜氏王朝的垮台而消失。海地离民主、自由还远着呢。以后局势的发展，为这位教授不幸而言中。

杜瓦利埃独裁统治瓦解后，政权落到了杜氏政权武装部队参谋长亨利·南菲将军手里，独裁政体，人民生活，一切照旧。近5年来，海地政局持续动荡不安，政变频繁。

南菲政权曾信誓旦旦地保证，海地将自由选举立宪议会和直接选举总统，制定宪法，保证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尊重人权，以实现国家的民主化。但是，他对何时举行大选闭口不谈。在已经觉悟了的海地人民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压力下，南菲政权被迫同意在1987年11月29日举行大选，人们期望已久的选举日来到了。不料数百名前杜瓦利埃的私人卫队的恐怖分子在南菲的授意指使下，在太子港对选民进行武装袭击，狠扫滥射，34人当场身亡，数百人倒在血泊中，选民们惊慌逃遁，哪敢再去投票选举？第一次大选就这样被暴徒蓄意破坏了。

1988年1月，南菲处心积虑地组织了一次没有反对派参加竞选的假选

举，把无党派人士马尼加扶上总统宝座，自己则幕后操纵，垂帘听政，把“民主”玩弄于股掌之上。马尼加当然不愿当一个仰人鼻息、毫无实权的傀儡总统，于是在6月17日冒然解除了南菲将军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并把他软禁起来。这还了得，岂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果然，两天之后，南菲发动政变，推翻了自己一手扶持的马尼加政府。这场假选举闹剧总算降下了帷幕。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3个月之后的9月17日，总统卫队司令，曾任杜瓦利埃顾问的阿弗里尔上校发动政变，又把南菲赶下台，并驱逐出境。这次阿弗里尔倒也“坦率”，连一块遮羞布也不要，自任总统。

阿弗里尔上台后，继续实行独裁统治，残酷镇压反对党。但此时的海地人民已充分认识到自己力量的伟大，岂能容忍独夫民贼的无道？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宣布1990年4月举行地方选举，10月举行大选。可是，阿弗里尔却出尔反尔，在选举前夕借口条件不成熟，宣布推迟地方选举。阿弗里尔的倒行逆施、言而无信再次激起反对党的抗议，声称要发动全国大罢工。3月9日下午，阿弗里尔被迫把政权交给他的密友、武装部队司令亚伯拉罕将军并离开了海地。3月13日，亚伯拉罕自知此时接管政权自己无疑会成为众矢之的，且不可能维持政局，于是他明智地再把政权交给了海地最高法院院长奥古斯汀。同日，最高法院女法官埃尔塔·帕斯卡尔·特鲁洛被任命为临时总统并宣誓就职。这位女中豪杰倒能顺乎民意。她就职不久便宣布年内举行大选，保证完全尊重人民的意志，并要求联合国派观察员监督大选以防止舞弊，保证海地民主化进程的正常进行。

神父总统在硝烟中就职

在这动荡的岁月，阿里斯蒂德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反对派领袖。在1990年12月的总统大选中，他作为左派政党组成的选举联盟和全国改革和民主阵线的候选人参加海地独立187年以来的第一次民主的总统竞选。阿里斯蒂德在竞选中多次表示，他的政党的行动纲领是扼制任何复活前杜瓦利埃政府的活动，并决心“根除腐败、暴力和犯罪活动”，把海地人民引向民主、自由和幸福之路。这个竞选纲领深得人心。极右分子恨之入骨，对阿里斯蒂德进行袭击、恐吓和暗杀。卑劣的行径，没有使他屈服、退让，阿里斯蒂德以更大的热情和勇气去迎接挑战，接受人民的选择。

人民把国家的最高职位和民主化的重担赋予了这位“反独裁英雄”。37岁的阿里斯蒂德神父以70%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总统。

左翼的阿里斯蒂德的当选，引起了右翼分子、杜瓦利埃余党和部分军人的极度恐慌和不满。以什么方式来改变这已成定局的局势？他们还是故伎重演：发动政变，以枪治天下。在离新总统宣誓就职还有1个月零1天的1月6日深夜，曾任杜瓦利埃政府国防部长的罗歇·拉丰唐率领数10名军人攻占了总统府国民宫，将临时总统特鲁洛女士扣为人质，逼迫她辞去临时总统职务。拉丰唐宣称自任海地共和国“临时总统”。政变暂时得手。拉丰唐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国民的反抗。又是亚伯拉罕这位具有正义感和民主意识的将军，支持文人政府，率部包围总统府，逮捕了拉丰唐及其追随者。海地终于暂时平静下来。

总算熬到了1991年2月7日，阿里斯蒂德正式宣誓就职。

总统宝座，在旋涡之中沉浮

然而总统职位并非是把安乐椅。对这位新当选的神父总统来说，面临的将是一道又一道难题。有分析家认为，阿里斯蒂德上台后将面临四大难题：

其一，能否得到军队的支持是海地政局能否稳定，政权能否维持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从当时看，时任武装部队司令的亚伯拉罕将军没有野心，不贪求权力，在过去几次政变中都是坚定支持民选政府的。他曾明确表示，军队不应干涉政治，应做职业军人，即军队国家化。但是，素有参政传统的海地军队会俯首贴耳、改弦更张听命于他吗？他们会不会再次向文人政府发难？这恐怕连亚伯拉罕本人也难以肯定。至于总统，更是为此焦虑不安。其二，杜瓦利埃的残余势力和既得利益者一定会与新政府继续为敌，顽抗到底，决不可能坐以待毙。1月6日的政变虽然被粉碎，但足以证明杜氏势力根深蒂固、阴魂不散。海地的民主进程随时会有中断的可能。其三，经济问题难解决。海地在长期的独裁统治下，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近年来又政局动荡，经济严重衰退。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失业严重，人民生活困难。新政府如无恢复经济的良策，社会动荡就难以避免。其四，海地反对党林立，虽然在反对杜瓦利埃独裁统治上取得一致，但他们能否在新政府中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而不为了争权夺利发生内讧呢？同时，阿里斯蒂德是从一名神父一跃而为总统的，无从政治国的经验。在海地这样一个政局动荡的国家里，没有一个铁腕人物恐怕是难以驾驭的。神父总统是否具有雄才大略治理国家，人们还在拭目以待。

从历史到现实，阿里斯蒂德深深懂得海地稳定的关键首先在于军队。

“军队会忠诚于我这个文职总统吗？”

阿里斯蒂德在想。

“前几次政变，亚伯拉罕将军不是支持文人政府吗？也许大多数军人是支持的，至少会采取中立立场”。

阿里斯蒂德又在宽慰自己。

“如果这样，自己岂不成了仰人鼻息、为人左右的傀儡了吗？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他人身上太危险”。

他又在警告自己。

阿里斯蒂德的分析不无道理。他一直是一个神职人员，连枪都没有摸过。上至司令下至士兵他都没有任何特殊关系，没有老上司、老部下、老战友。更为重要的是，在海地这个素有军人于政传统而又缺乏民主意识的国家里，军人是不会轻易服从文人政府的。

怎么办？既要稳定政局防止军人干政，又要利用军队，唯一的选择只有一个：改组军队。

从政治学角度来讲，一位新上任的首脑其权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在分管各种权力的官员所形成的最高掌权层中服从他的官员的人数；二是最高掌权层中服从他的官员对他的服从程度。鉴于这一点，阿里斯蒂德决心改组军队。因为杜瓦利埃人虽逃走，但余党犹在，并且部分掌握了兵权。于是，他辞退了8名高级将领中的6名，同时又提拔重用了一些主张民主的年轻军官取而代之。其中之一便有42岁的塞德拉斯，他被委任为海地武装部队临时司令。阿里斯蒂德希望这些年轻一代的军人支持文人政府的民主改革，成为民主政治和新政府的保护神。

海地动荡不安，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总统的安全事关重大。尽管他已对军队进行了改组，但仍存戒心。如果让完全听命于他人的武装部队来安排警卫，负责总统及家人的安全，这岂不是等于在自己的身边安了颗定时炸弹？他不得不防。为此，阿里斯蒂德不惜重金聘请一位瑞士人为教官组建和训练

总统私人卫队。这支卫队由曾作为殖民者压迫海地人民的法国人所组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受总统直接指挥，在危急时刻以防不测，确保总统安全。

海地军人于政已成传统。政府各部部长几乎是清一色的军人，人们不知道这是政府还是军营。阿里斯蒂德决心要克服这个顽症，让军人返回营房，废除过去军人担任政府部长的制度。1991年9月，阿里斯蒂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慷慨陈词，发表了要在海地巩固民主的讲话，并坚决表示，回国后将更进一步对军队进行改造。

亲信在密谋政变

费尔斯特在《枪杆子》一书中说道：“如果要是军队不热情支持国家政权的目標，那末与其说是防备措施，不如说反而刺激了军队”。也许阿里斯蒂德没有想到他在联合国的那番讲话进一步刺激了军人本来就已紧张、敏感的神经。正当他踌躇满志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推进海地民主化进程时，一场新的军事政变正在酝酿。政变的主谋和领导人正是塞德拉斯。

塞德拉斯是杜瓦利埃的死党，军中的极端右翼分子，虽然一介武夫，却狡诈奸猾。杜氏王朝垮台后，他把自己包裹起来，不像南菲、阿里费里尔在条件没有成熟、军人大都采取观望立场的情况下贸然行动，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成了阶下囚。况且，他自己资历不深，仅仅是一个少校，重兵未握、羽毛未丰。他不断地告诫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时机一到，海地还是军人的天下。

90年总统大选时，他伪装拥护民主，支持阿里斯蒂德，一时成为军中鲜有的进步、民主的少壮军人。而此时，阿里斯蒂德也正在物色年轻有为的将领，试图依靠他们稳定军队，支持文人政府、忠于总统。塞德拉斯正是摸准了阿里斯蒂德的这一心理，果然骗得阿里斯蒂德的赏识和信任，7月3日被总统任命为武装部队临时司令，军衔也由上校晋升为少将。然而对于一个野心家来说，一个临时司令是远远不过瘾的。他又在觊觎总统的宝座，成为海地新的独裁者。为了满足权欲，他决定伺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

塞德拉斯开始行动了。

一辆呼啸的军用吉普车经常出现在一座座兵营。这是塞德拉斯以武装部队司令的名义巡视、检阅部队。然而其真实的目的是观察军人对阿里斯蒂德改组军队和民主化改革的反响，同时物色人选、网罗党羽、拼凑势力。塞德拉斯不愧是个狡诈之徒，他敏感地嗅到了军人对新政府的普遍不满和敌视，只是他们群龙无首，大事难成。塞德拉斯断定，如果此时兵变，可谓顺乎“民意”而一呼百应。看来时机成熟了。

单靠个人的努力，当然是一事无成。塞德拉斯认为，政变成败的关键在于军中的追随者及其统领部队的战斗力。他把网罗的目标投向了具有较强战斗力的装甲兵。要知道，在海地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里陆军装甲营的力量是举足轻重的。装甲营成了塞德拉斯时常“关心”的重点，该营上校席尔瓦自然也就成了他的死党。

几个月来的准备和策划，政变已日趋逼近。在一间宽敞的地下室，塞德拉斯与席尔瓦正在制定作战计划。

塞德拉斯首先说：“时间，我看就定在9月29日，因为这是个星期天，包括阿里斯蒂德在内的多数官员都离开首都去休假，各权力部门群龙无首，难以组织力量对抗。这样便于采取突然袭击，取得政权”。

席尔瓦全神贯注，听了塞得拉斯的分析，不断点头：“司令英明。我想，

行动的时间以星期天深夜为好。此时街上行人稀少，有利于部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占领重要的部门和据点。要是我们的装甲车在街上受阻，那就麻烦了。行动很可能失败”。

塞德拉斯：“很有道理。就这样定了：行动时间为9月29日深夜。我们再来考虑具体的行动方案”。

塞德拉斯拿出一幅太子港地图，用手中的笔指着国民宫和总统官邸，狠狠地在两地画了个大圆圈，然后说：

“你率装甲营从营地直扑总统官邸，最好要生擒阿里斯蒂德，死的也行。如果他逃掉要穷追到底，不能让他与其他部队联系上。我自己率部分人马坐守总统府，一可控制权力中心；二可防止阿里斯蒂德从你那突围后占据国民宫。这样我们就万无一失。我料定他肯定会来。国民宫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是指挥的中心。到那时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

塞德拉斯在布置了作战计划后，站了起来，十分威严地说：“刚才所说，仅你、我两知晓，要绝对保持秘密。至于士兵，你可在行动前做战前动员。回营后，立即让部队处于一级战斗状态，时间一到，按计划行动”。

席尔瓦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回答说：“坚决忠于司令，保证完成任务”。

这时，塞德拉斯递给席尔瓦一杯白兰地，说：“为我们的伟大行动和成功，干杯！”

于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总统在总统府被俘

按原定计划，席尔瓦上校率领50名士兵，乘坐装甲车，直扑位于首都太子港郊外10多公里的总统官邸，一路未遇到任何阻击，顺利到达指定位置。官邸的卫士奋起还击。此时，官邸还是灯火通明，阿里斯蒂德尚未入睡，他正与几名助手商讨着明天的工作、制定新的改革方案。激烈的枪声，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他顺手拿起活筒，但话筒里什么声音也没有。通讯被切断了。

阿里斯蒂德虽不曾驰骋疆场，但在自己被叛军包围之时倒也镇定自若。他扶了一下眼镜，一面指挥卫队进行抵抗，一面率余部驱车急速驶往10公里以外的总统府国民宫。他想，只要到了国民宫，就可调兵遣将，组织反击，然后发表电话讲话，颁布戒严令，叛乱就会平息。他冒着枪林弹雨冲进了国民宫。就发现了他委以重任的“亲信”塞德拉斯正在此等候。

“上帝，有救了！”他深深地舒了口气。

阿里斯蒂德做梦也不会想到，他这是自投罗网。他插翅难逃了。

激战持续了近10个小时。总统卫队毕竟不是正规军的对手。30日上午，总统府被攻克，阿里斯蒂德被擒，总统府周围尸体遍地，500多人被打死，千余人受伤。

沮丧而又愤怒的阿里斯蒂德只得深深地哀叹。面对朝自己走来的塞德拉斯，他骂了句：“我被你这个狡猾的家伙欺骗了！你会受到人民的惩罚的！”

“别说得太难听！总统先生”。塞德拉斯看着手中的猎物，得意地说：“押下去，严加看管”。

一石激起千层浪

阿里斯蒂德生死难料

9月30日上午，硝烟未散。身着戎装，腰挂手枪的塞德拉斯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我们已掌握了政权。我们将尊重宪法，保障民主。一俟局势稳定，便返

回军营。

为确保政局的稳定，人民的安宁，实行全国戒严。违抗者，将严惩不贷。

海地政变的消息震惊全国。太子港的市民不顾戒严令自发上街游行示威，高举着阿里斯蒂德的画像，抗议军人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在街上巡逻的军队和警察与游行群众发生冲突。

海地政变的消息在国际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无论是邻近的美国、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国，还是遥远的法国、苏联和日本，各国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海地军人“中断海地民主进程”，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恢复合法政府。

蕞尔之国海地的此次军事政变引起许多国家的强烈谴责确实异乎寻常，但推敲起来又是在情理之中。

50年代，拉美国家几乎都是文官执政。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文官政府纷纷垮台，拉美的12个国家先后发生政变，除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外，几乎都是军人执掌国家政权。到了80年代，拉美国家出现高度通货膨胀，爆发了债务危机，经济日益恶化。对此军政府束手无策。社会各界要求恢复文官执政的呼声日益强烈。在国际社会上，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也向军人政府施加压力，支持拉美国家恢复文官政府，推行“民主化”。在国外压力之下，拉美国家的军政府不得不还政于文官。到1990年拉美所有国家都完成了军政府向文官交权的过渡，整个拉美大陆纳入了“民主化”的版图，“民主化进程”在拉美全面展开。在此形势下，海地政变必然引起强烈震荡。拉美国家的文官政府普遍认为，此次海地政变是对拉美“民主化”的挑战。他们担心，海地政变后军人重新执政会在整个拉美刮起一股军人夺权的飓风，产生“多米诺”现象。委内瑞拉总统指出，反对海地政变，不仅是一个感情和道义问题，更重要的是保卫拉美国家的“民主”问题。

国际社会行动起来了。

9月30日，美洲国家组织召开了理事会会议，强烈要求海地政变当局立即恢复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的权力，并采取有效措施营救被俘的阿里斯蒂德。

10月1日，阿里斯蒂德总统在美国、法国和委内瑞拉等国的干预、斡旋之下，乘坐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派来的专机抵达加拉加斯。

10月2日，阿里斯蒂德前往美国会晤布什总统，参加了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特别会议。他在会上揭露了海地政变当局践踏民主和破坏宪法的丑恶行径，呼吁美洲国家组织派代表团去海地，敦促政变分子立即交出权力，他相信，他定将返回海地，为海地的民主事业而斗争。同日，在阿里斯蒂德的要求下，美洲国家组织决定一个由该组织秘书长巴埃纳·苏亚雷率领的由阿根廷、玻利维亚、加拿大、哥斯达黎加、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和美国8国部长组成的外交代表团赴海地谈判。

4—7日，代表团与政变当局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代表团明确指出，如军队不重返军营，将会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并考虑使用武力。塞德拉拉斯对此表示，可以考虑让阿里斯蒂德回国，但需全国各方达成一致，并有各方担保。但是，军方却坚持不让。为了使问题圆满解决，代表团作出让步，同意考虑组成由加拿大、委内瑞拉、阿根廷部队支持的一个“担保委员会”，以保障阿里斯蒂德恢复权力，同时也不一定非要免去政变领导人塞德拉拉斯武装部队司令的职务。但是，双方未达成协议。7日，代表团重返海地举行第三轮谈

判，不料在太子港机场同塞德拉斯谈判过程中，100多名政变军人冲进会场，把外国代表团驱逐出境。这在世界外交史上绝无仅有。在斡旋失败后，美洲国家组织于8日作出决议，重申对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支持，要求各成员国对海地实行贸易和金融封锁，决定组建一个由文官组成的使团，参与海地的重建和加强法制民主。

联合国大会在海地政变后通过决议，谴责海地的军事政变，呼吁恢复被推翻的阿里斯蒂德总统的职权，号召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采取行动，支持美洲国家组织作出的制裁措施；委内瑞拉宣布不再按《圣约瑟条约》向海地提供石油；欧共体宣布中断对海地的经济援助；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不承认塞德拉斯政府，中断对海地的经济援助，实行贸易封锁，冻结海地在美国的资产。

为了对抗国际压力、稳定国内政局，政变部队7日出动150名士兵包围了议会大厦，并向大厦开火扫射。在枪弹的威逼下，议会“同意”任命67岁的最高法院法官内雷特为海地临时总统，并宣布解除原内阁所有成员的职务。8日，内雷特宣誓就职。

10月16日，海地临时政府内阁成员在政变军人的“保护”下，由临时总理和外交部长奥诺拉特主持在太子港举行了就职仪式。站在宣誓就职席上的是：内政国际部长让·加西亚，财政和经济事务部长夏尔·博利瓦、贸易和工业部长弗朗索瓦·布齐、公共卫生部长格雷热尔·让·路易以及农业部长、新闻部长、教育部长、交通部长、司法部长和社会部长。

塞德拉斯仍然军权在握，主宰着海地的命运。

鹿死谁手

有观察认为，海地政变与整个拉美乃至世界民主潮流相悖，刺刀下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短命的。国际社会的压力、国内人民的反抗、将使塞德拉斯和“临时政府”陷入困境。

阿里斯蒂德总统何时返回海地、恢复职权，海地的民主之舟能否驶向胜利的彼岸？试看今日之海地，竟是谁家之天下，世界正注视着海地局势的发展和变化。

后 记

今天，人类社会的航船在经历无数次狂风暴雨，绕过种种暗礁险滩之后，正劈波斩浪，驶向 20 世纪的终点，即将开始 21 世纪的航程。20 世纪只不过是人类漫长历史的短暂瞬间。然而，20 世纪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引起的革命性变化，是以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它标志着人类在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漫长探索中，取得了新的巨大的进展。

20 世纪是人类进行伟大社会变革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之初，资本主义制度主宰着全球，它已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科学社会主义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思考，而后付诸于实践。无疑，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 20 世纪人类社会的最显著的政治现象。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遇到空前严峻的挑战，这不仅来自于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它自身的弊端和矛盾。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各国多次进行各种改革，确立和发展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契机，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但是，本世纪中仍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强权政治、经济丑闻和政变风云。

20 世纪又是人类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世纪，人类创造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生产力。各种新兴产业层出不穷，无数新产品仿佛被魔咒呼唤出来，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事提供自然原料产品的第一产业世代代曾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主体，但在 20 世纪已日渐萎缩；从事原料加工、制造业的第二产业在经历 19 世纪和 20 世纪前期的迅猛发展后，到 20 世纪后期发展速度放慢；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却如日中天，处于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中已经或正在占据统治地位。

20 世纪是人类进行伟大科技革命并取得累累硕果的世纪。20 世纪初，爱因斯坦相继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证实了空间与时间、质量和物质运动之间的本质统一性；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等一批科学家经过不懈努力，建立了量子力学，使人类对物体的认识从宏观世界深入到原子世界的微观世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吹响了 20 世纪物理学革命的号角，并引起涉及各学科的自然科学革命。现代科学的发展，还导致了一些新型综合性的基础理论的产生，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三论的出现不仅扩大了科学门类，而且为人类探索自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武器，转而又推动自然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最终促成了 20 世纪中叶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原子能的开发和利用，开辟了原子能时代；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成功和不断改进，标志着人类在探索人工智能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和人类首次登上月球，宣告人类正在跨出地球的摇篮，开始进入宇宙的无限空间。进入六七十年代以后，以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取得巨大进展，并对人类的日常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另外，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也极大地改变了 20 世纪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是，广泛持久的政治与社会改革，经济的巨大增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虽然改变了 20 世纪的人类生活，但是并没有消除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没有给人类带来普遍、持久的和平。以反对殖

民统治、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运动持续高涨，并在 20 世纪中期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在亚洲、非洲等地区建立起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20 世纪大国之间的冲突依然如故。这个世纪，围绕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导致了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40 年代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导致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出现。80 年代之后，国际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在 20 世纪，国际矛盾的尖锐和激化，给 20 世纪的人类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尤其是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宣告核武器时代的开始。从此，核武器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在人类的头顶之上，人类一直生活在核战争和世界毁灭的恐怖阴云之下。

除此之外，20 世纪的人类还面临着其他的威胁和挑战：自然资源遭到极大浪费和破坏，大片森林被滥砍滥伐，动、植物的种类迅速减少，大片土地沙漠化，淡水资源贫乏，大气、河流和土地遭到了严重的污染……

人类即将走过 20 世纪，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应该为人类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同时，更应该为人类所经历的灾难及面临的挑战而感到颤慄，并由此而振作、而奋争。

我们期待着，人类将拥有一个更加文明、更加进步、更加和平、更加美好的新的 21 世纪……

周 乾
1994 年 10 月

